修订版出版说明

本书写的是蒙古族西支——卫拉特蒙古的历史。这是蒙古族仅次于成吉思汗时代的又一次崛起，尤其是15到18世纪期间它作为西蒙古的新兴势力，活动的领域曾从杭爱山西部，扩张到中亚两河流域一带，包括中亚和中国西北边疆的广大地域，因此它的历史不仅曾影响过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史、边疆史，也是研究蒙古、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等民族历史的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特别是由于作者伊·亚·兹拉特金精通蒙、藏、汉、俄等多种文字，写作中利用了多种文字的原始资料，包括档案，所以该书1964年出版后立即在世界各发达国家传播开来。由于该书中引有不少古俄文和蒙文等多种资料，翻译难度较大，所以我国到1980年才由本人艰难地首次翻译出版。此后随即在我国被中俄关系学界、边疆学者和民族学家们，甚至研究军事战略的军区研究家们广泛利用。应该说，这本译著曾使有关学界的一批新人才脱颖而出，现在一些著名的研究西北民族史、边疆史、清史、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大都曾受益于这本译著的史料或受到其启发，并推动了我国当时约10年的有关领域的研究热潮。有些院校则以此书做教材，开出了“西蒙古史”的课程。正因此，当时出版的2500册著作较快被购买一空。上世纪90年代起，学界就呼吁再版，包括南京军区也有人向我索要，商务印书馆也希望重版。但由于本人新的科研任务不断，至今才得以抽空修订，回报学界。

当年翻译本书，正值外交部调集西北5省区有关专家学者编写《沙俄侵华史》之际，而本人也为此刚从一个口语翻译转入史学界承担笔译本书的任务，对历史，特别是蒙古史可以说只是个小学生，一无所知，但因编写《沙俄侵华史》工作的急需，日夜笔耕，仅用半年时间赶译而成，因此粗糙错误在所难免，我一直觉得有必要修订一下。没想到日

月如梭，本书修订竟一拖30余年。现在的我已经有过一段研究西蒙古卫拉特人的学术生涯，所以本书修订版的主要目标，除了要修正人名、地名的不规范译法之处外，还就自己研究的肤浅心得，加了一篇导读，并补充了一些新的注释，与大家分享，期望进一步提高译本的质量和学术性，使之能与这本名著的国际地位相称地流传后世。

马曼丽

2012年6月

修订版译者导读

一、一部超越各国同类著作的、最完整的卫拉特蒙古族的全史

这本《准噶尔汗国史》是苏联著名蒙古学家伊·亚·兹拉特金的代表作。本书的目标，正如他自己在导言中所期望的："叙述准噶尔汗国存在时期的历史……编纂出一部内容广博、翔实可靠、基本上可以解决这项任务的史料学基础资料。"实际上，作者不仅完成了他的目标，而且从这本著作的影响来说，其所说史料学的价值，实事求是地说，甚至超过了以往被世界公认的一些汉文史籍。所以本书在出版后被各国迅速翻译传播。在它问世前，各国都认为，研究卫拉特蒙古的历史，中国的《明实录》、《清实录》、《藩部世系表》、《钦定准噶尔方略》等许多汉文史籍才是最主要、最可靠的史料依据。写过《卫拉特概述》的俄国著名东方学家比丘林也认为，在这方面"中国作者的著作是真相的标尺"。"讲述明（1368—1644 年）、清（1644—1912 年）的中国历史著作和王朝实录，长期以来成了论述卫拉特问题的唯一的资料来源……其中大部分在欧洲还未为人所知。"[1]

但自从《准噶尔汗国史》出版后，各国纷纷翻译传播，迅速取代了中国史籍的权威地位。连我国学界读到此译著后，也被其丰富全面的新史料所吸引，随即掀起了研究卫拉特蒙古史新问题的热潮，因为发现了兹拉特金这本书中有许多过去汉文史籍中完全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全新的资料。

史学界周知，由于卫拉特蒙古与中国交往主要是在元亡以后的北元时期，但交往刚刚开始时期记载寥寥。汉文资料主要集中在明代妥懽、也先时期。而且也先去世（1453 年）后，即 15 世纪中叶到 17 世纪

[1]见本书导言第 24－25 页。

初，哈喇忽拉崛起，期间约150年的卫拉特蒙古人的活动，因不知其所向，在中国史籍中几乎销声匿迹。唯在兹拉特金的笔下，却挖掘出了卫拉特人向西扩张的历史，证明了他们生机勃勃地开发着中亚两河流域和蒙兀尔斯坦一带，填补了中国史料的空白。

这有赖于兹拉特金具有阅读多种文字的能力，他不仅能够利用蒙文原著《蒙古源流》、《黄金史》、《黄册》等这些卫拉特贵族记录他们祖辈的家谱性质的历史故事，还利用了突厥文、藏文和英文等史料。于是我们中国史学界也得以因《准噶尔汗国史》的这些原始资料而耳目一新，弄清楚了汉文史籍中鲜有记载的四卫拉特联盟及卫拉特初期发展史等一系列史实；研究出了也先死后，卫拉特人并非真的销声匿迹无所作为了，而是向西寻求到更大的发展，中国学者于是根据这一启示，并刻意发掘记载较少的汉文史料做旁证，写出了《试论准噶尔分布地域的变迁》（杜荣坤）、《明代瓦剌与西域》（马曼丽）等这类至今还在被不断转载的论文[1]，主要还在于这方面的研究更丰富和补充了历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包括卫拉特蒙古族，开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这块被沙俄侵占的中国西北历史疆域的史实。

尽管兹拉特金在论述中、俄与卫拉特蒙古的关系时，有意把中国与俄国同列为侵占卫拉特领土的帝国，而回避卫拉特蒙古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史实，但作为一位寻求史料翔实可靠的学者，他在摆出各种史实时，也“漏出”了不少能真实反映原貌的史料，如他如实记录了巴图尔珲台吉对沙俄的抗议，即“吉尔吉斯人是他的属民，即使现在沙皇陛下要收吉尔吉斯人的实物税……他珲台吉也仍要收他自己该收的实物税”[2]，这才形成了双重缴纳实物税的真相。特别是他所发掘的俄文原始档案，也违背他的原意而成为中国史学界揭露沙俄侵略的武器。比如，他公布了沙俄政府命令托博尔斯克扩张领土，寻找“没有向我们缴纳实物税的新州，迫使那些牧民臣服于沙皇陛下，若他们不臣服，不

〔1〕这类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论文，现在仍在被转载，如《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2008年版均刊有此两文。

〔2〕见本书第135页。

交税，就用武力胁迫”，并记录了后来，托博尔斯克在马杜、吐托什、凯捷盖比等一批地区执行这项命令的情况，还有引起了巴图尔珲台吉抗议等论述。[1] 从而客观、真实地揭露了沙俄的本质，反映了我国古代西域在清初由边疆民族地方政权管辖的分裂时期被沙俄逐步蚕食的真相。

另外，关于喇嘛教在卫拉特人中的传播、蒙古民族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等其他许多内容都是过去有关研究没有涉及的。总之，仅以这些例子就可以说明《准噶尔汗国史》的确是一部超越前人的、该领域前所未有的、史料翔实可靠而且研究深入独到的著作。

二、重读《准噶尔汗国史》对进行更深入的新课题研究的价值

虽然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1980 年代曾被学界热切关注过，也被广泛引用过，但是，本人重读之后，发现其实它的价值还远没有被发掘完毕。我以为，我们过去对他的研究的深度还是理解不够的，今年我重读此书时，觉得若深入体会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可以帮助我们挖掘更多新的研究论题和科研课题。

（1）循着作者的创新思路再创新。可以剖析一下作者的一项填补空白的创新，即他考察研究了那段中国史籍几乎没有记载的 150 年（15 世纪到 16 世纪末）的历史时期卫拉特人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迅速变迁。这里，他从考察“斡孛黑”、“兀鲁思”、“乌木奇和鄂托克”等社会组织的性质及其演进入手，研究了蒙古帝国时代土地“斡孛黑”反映血缘关系，并属于军事帝国统治者的世袭财产，到卫拉特崛起后日益独立地向西发展时期，达延汗的一个孙子必里克墨尔根（1506—1550 年）有 9 个儿子，就把自己的“兀鲁思”分成 9 部分给 9 个儿子，并使用了“兀鲁思”、“乌木奇”这类词。这类现象说明，土地已经转为领主们可以自己分送的私人财产。他的研究证实，这种封建关系的跳跃式加速发展是与元帝国骤然灭亡、东西蒙古分裂、领主们各自为政的背景密不可分的，土地因而变为由分别游牧的领主来私人管辖。

[1] 见本书第 136 - 137 页。

而一般从血缘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需要上千年历史的过程，在卫拉特人那里，却出现了不到100年便从农奴制跳到了封建私有财产制度的跳跃进程，即由带有血缘关系的“斡孛黑”迅速演化成了“兀鲁思”、“乌木奇”、“鄂托克”这类封建制度。

这也使本人近年来顺着他的思路扩大思索，重新审视沙俄侵占中国西北边疆的历史，发现，正是因为沙俄掌握了卫拉特西蒙古社会迅速进入封建社会初期，以及他们的土地随游牧领主成为私人掌控的所有制的特点，所以采用了逐个悄悄收买卫拉特蒙古民族领主和宗教人士的手段，威逼利诱这些实际掌控土地的领主，避过宗主国清政府而搞什么让单个游牧领主“臣服沙皇”的把戏，而进行对一块块“兀鲁思”的交往和蚕食，到实际控制后，才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正式认可。因为那时，清政府就无法赶走已经实际控制了那些“兀鲁思”领主及其土地的沙俄侵略者了。

具体地说，沙俄就是利用这种特点再物质利益引诱、加上显示他们先进的枪炮武器进行威逼的手段，使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宣誓臣服”的。这类记载在档案中比比皆是，也是它分别与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各部都直接交往，并派出仅几位军人组成的使团就能达到目的的最有效手段。而当时沙俄的所谓“宣誓臣服”之所以会被中国边境民族接受，也是因为沙俄了解，在游牧民族看来，那既可以是一种争取和平贸易与和平交往的协定，又可以拿到所谓的皇赏，即游牧民族方面是被需要卖牲畜和取得生活用品等那个时期的核心利益所驱动的。比如，1620年10月6日卡尔梅克台吉和鄂尔勒克、楚库尔和伊希姆王子派使节到俄国边城乌法来贸易时，乌法当局给沙皇汇报说：“陛下，他们卡尔梅克台吉们……来请您恩准时，您可要他们接受您的庇护，但同时要让我们到乌法城跟他们贸易，台吉们和伊希姆王子叫我们对您说，若这样，他们可以让其使节代表他们台吉们和兀鲁思属民宣誓。……陛下，10月9日您的臣仆我，就让卡尔梅克使节来我处，并让其进行了

宣誓仪式。"[1]

再看看这最初宣誓的内容:"陛下,他们代表其各自的台吉们和伊希姆王子宣了誓,保证他们不派人攻打乌法城镇和巴什基尔地区,不杀掠巴什基尔狩猎人,愿意接受您的庇护并向您全俄伟大的沙皇陛下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大公叩首请求让他们赶200匹马来卖,让他们免关税卖这些马。并请陛下您赏赐他们皇赏。于是,您的臣仆我,吩咐当地人和外地来人买下了这些马,应付地换给了卡尔梅克人一些破旧东西。"[2]

综上可见,清代西北边疆民族由于大多是游牧民族,他们民族传统的核心利益是兀鲁思游牧地和实物税,他们最缺乏的是生活用品和与农耕民族进行贸易。这些特点也是决定他们与谁可以和睦,与谁则征战不休以及决定各种民族关系的关键因素。

本人现在看来,兹拉特金在写本书时,已经认识到沙俄利用这些非军事手段的意义。他在书中说:"借助这些措施,不使用武力就可以在这一地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领地。"[3]而这些本人却是最近重读《准噶尔汗国史》才领悟到的。所以,我觉得,此书多读一次,就会有一次新的收获,建议不妨尝试重读,一定会发现还有值得我们再深入研究的内容。

(2)扩大古为今用的研究领域,寻找新课题。如本书涉及的噶尔丹和清廷的军事战略、处理国家安全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等,都是可以寻找和再深入研究的。

国家安全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是南京军区一位同志向我索取本书给我的启发。的确,本书中作战的噶尔丹和康熙、乾隆皇帝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都有军事才能。还有像乌尔会战役这样精彩的战役,噶尔丹战胜大兵压境的清军,其中就有很值得研究的军事战略战术,如他使用过计诱清军越过戈壁来追击他的疲劳战术,而乾隆最终能平定准

[1]《俄蒙关系史档案文献集(1607—1036年)》第48号,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59年版。
[2]《俄蒙关系史档案文献集(1607—1036年)》第48号,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59年版。
[3]见本书第113页。

噶尔，也很值得研究。试想，清廷在外有沙俄支持噶尔丹的强大势力，在内有噶尔丹和西藏民族宗教人士的分裂势力，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不能说不严峻，但最终他孤立了主张分裂的军事势力，主要依靠蒙古本民族，还是在群众一路欢迎下统一了新疆，这对今天研究其中运用的战略战术，尤其是民族群众路线和民心战略，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3）关注的启示和研究线索。如有关民族关系方面，其实有一些是兹拉特金的研究给我们提了醒，或开了头的问题，特别是兹拉特金不像他的前人那样，认为游牧民族的民族关系充满矛盾，无非是穷兵黩武的游牧民族本性造成的。兹拉特金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方法，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去找寻原委，剖析了卫拉特由于封建经济初期牲畜、人口都得到大发展，因而土地大为缺乏，所以与临近的哈萨克、东蒙古以及中、俄各方的关系，都以土地与交换牲畜的贸易这类核心利益作为准绳。这对我们现代学者研究民族关系与其不同时代的核心利益之间的原委，应该有所启发；也可以从卫拉特和哈萨克的关系，或者是卫拉特自己内部各大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验证。而且，兹拉特金在书中对这些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只给我们提示了一点线索，他只断断续续写到过哈萨克民族形成过程中卫拉特的介入，写到过后来巴图尔珲台吉时期甚至动员全卫拉特各部声讨哈萨克杨吉尔，还有要对没有参战的昆都仑等台吉严惩不贷等等事件，却并没有彻底阐述清楚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即是言犹未尽的，或者说给我们研究西北民族关系留下了很大空间。

我们既可以在吸收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研究当代民族关系，因为即使在现代，民族关系问题仍然是多民族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最影响民族之间的和谐与交恶？民族的核心利益与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又有何关联？我们都可以通过本书的事件来验古思今；也可以配合其他史料的挖掘，来解决兹拉特金那些言犹未尽的问题。比如，卫拉特内部也有几次重大的遗产之争，像关于卡尔梅克楚库尔之死和有关的卫拉特大内讧问题，也是《准噶尔汗国史》为我们提到过的。但兹拉特金只写到这是一场争夺遗产的大内讧，哈

喇忽啦不得不出面调解，其他首尾详情概不清楚。而现在笔者发现《俄蒙关系档案（1607—1636）文献》中有关于这场延续数年的大内讧的新记载，应该可以联系起来研究其原委、影响等等。再如，从《准噶尔汗国史》这本书中可以发现研究民族宗教间的复杂关系的线索。兹拉特金论述了喇嘛教在东蒙古和卫拉特的传播，进而深入人心的历史，从而对噶尔丹、藏传佛教和清政府等的相互关系，对蒙古民族社会政教间的利益关系和相互的经济社会根源等都有一定的分析和观察。如果我们能抓住当时的这些素材做线索，深入地研究宗教是如何在卫拉特社会中逐渐实现其社会控制和文化传播的，深刻了解其政教之间、民族与宗教之间各种微妙的维系作用与互动的深层次内涵，更将是十分有新意的课题。因为一部真实反映历史、研究历史的好著作，能为后人留下可供参考的历史经验，并体现其珍贵价值。所以如果能深入研究《准噶尔汗国史》这样的珍贵资料，我们一定会受益匪浅。

三、本书的观点与争论问题

虽然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相当权威的好书，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学术界周知，兹拉特金把准噶尔，或者说把我们中国的卫拉特蒙古的准噶尔部称作“汗国”，甚至把土尔扈特部等等也叫汗国，这是不符合史实的。这方面的争论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史学界就已经通过论文著作，特别是中国版的《准噶尔史略》这类专著，公布了清准关系的宗主与藩属的无数史料，证实了准噶尔是中国分裂时期的地方政权这个史实，公正的学者应该会尊重史实。兹拉特金的“汗国论”无非是想把沙俄侵占准噶尔的领地，说成是与侵略中国无关的事而已。这里似已无需重复。

但是与此相关，兹拉特金把俄准关系说成是交往频繁、友好和睦的朋友，而把清准关系说成是敌对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却还没有得到有力的批判。这个问题应该在此书新版后，列为学术论战的争论内容。这里本人先抛砖引玉说一点。

的确，沙俄与准噶尔有频繁的交往，这是游牧民族需要交换生活用品的游牧经济特性决定的。问题在于沙俄与准噶尔交往的目的和他们的所作所为的本质是敌还是友，其目的是不是侵略掠夺。限于篇幅，这

里仅略提一下其目的和侵略史实：

俄国史书也承认："俄罗斯的扩张运动在西伯利亚迅猛推进，在西西伯利亚，……1604 年俄国建立托木斯克堡之后，次年，游牧在鄂毕河流域、离托木斯克不到 5 日程的捷列乌特人（从属于准噶尔）就表示愿臣服俄国，并于 1609 年正式臣服。……最初对其天然资源给予极大关注的是毛皮产品，因为 17 世纪时，毛皮在欧洲市场是价格极为昂贵的商品，这就是俄国边境总督们迫切要从西伯利亚那些狩猎、畜牧部落那里获得皮毛实物税的原因。"[1]

可见沙俄与准噶尔等卫拉特蒙古人交往，是利用他们需要贸易的特点，而一步步蚕食其领土。如沙俄在侦察到离托木斯克 10 日程的库兹涅茨克山区有铁矿石和开矿的山民后，就于 1622 年前后在那里悄悄建立了库兹涅茨克堡。当时的俄国档案记载："在喀山省廷盘问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伊万沃洛吉篾列茨一行人时才知道：从托木斯克城走陆路要 10 天的地方。康多木河与博拉什河畔群山峻峭，这些山上栖息着开采矿石以交纳实物税的库兹涅茨克山民；这种矿石经炉火熔炼……可以打造成铠甲、头盔、标枪、长矛和军刀等各种铁器；那些铠甲、头盔一般卖给卡尔梅克人换取马匹和牛羊；他们交给卡尔梅克人的其他实物税也是铁器。库兹涅茨克地区的库兹涅茨克山民都擅长做这种行业。这些库兹涅茨克人中，只有住在靠库兹涅茨克城堡最近的少数人，是给沙皇陛下缴纳实物税的山民，总共只不过 200 来人……而那些住在离库兹涅茨克城堡较远的库兹涅茨克人都被卡尔梅克人统治着，卡尔梅克人从他们那里收取的实物税是貂皮和各种铁器。至于皇上陛下的那些库兹涅茨克属民也还没有任何皇上的人来保护，因为我们库兹涅茨克城堡军队很少，每年从托木斯克派去的军队平均只有 50 人左右。如果在库兹涅茨克城堡能有 200 名军队保护那些库兹涅茨克山民不受卡尔梅克人侵犯，就可以为皇上去收缴那里的实物税。估计那许

---

〔1〕阿·普·波塔波夫：《阿尔泰人历史纲要》（俄文版），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3 年版，莫斯科—列宁格勒，第 166 页。

多卡尔梅克人也会臣服皇上，接受陛下庇护，因为卡尔梅克人除了在库兹涅茨克地区，别无他处可以买到任何武器。所以，特按皇上指令给库兹涅茨克城堡发去一份谕旨，令他们关注：一旦托博尔斯克派军人来到库兹涅茨克城堡，立即……派往库兹涅茨克地区能缴纳实物税、但还没臣服沙皇的库兹涅茨克山民那里去，以温和的方式让他们宣誓臣服沙皇陛下。”[1]由这类记载可见，沙俄是如何依靠仅50人的边堡，仅指派200军人，就侵入了当时处于中国西北边疆的卡拉特卡尔梅克人领土的，其侵略领土的手法以及逐利的目的和原因，一目了然。这样，到1628年其建堡战略已经推进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些地区在清初分裂时期大多由当时中国准噶尔地方政权所管理。

准噶尔一直是坚持为其领土被占领的事与沙俄交涉的，或采取不放弃自己收实物税的权利以示反抗。如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清朝派图理琛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探望土尔扈特时，途经托姆斯科（今托木斯克），他在《异域录》中记载道：“此处所居塔塔拉并巴尔巴忒人与鄂罗斯、策旺阿拉布坦两国皆纳税。”这说明直到策旺阿拉布坦时期，准噶尔人民对被沙俄侵占的地区，仍一直在坚持行使自己传统的主权，但沙俄已经侵入而形成双重纳税的情况，这也说明他们长期对沙俄进行着针锋相对的主权斗争。直到1667年5月，僧格还率领4000余人组成的军队，包围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据俄国文献材料记载，1713年策旺阿喇布坦就沙俄在他的领地上建立了比斯克和比卡图斯克两个要塞提出抗议。翌年，策旺阿拉布坦公开声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直到库茨涅茨克和托木斯克都是俄国人在他的土地上建立的城市，必须拆除。1719年他又指出：“近百年前（即17世纪20年代），由于多次谈判，确定了准噶尔和沙俄的领土以鄂木河和鄂毕河上的黑岬沿线为边界线，但俄国方面越过上述国界而修建了托木斯克、库茨涅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城堡和额尔齐斯河沿岸的要塞，还在库茨涅茨克县建

〔1〕引自《俄蒙关系史档案集（1607—1636年）》第58号。

立了杰米多夫铜矿，准噶尔要求将这些城堡和矿厂，必须拆除。”[1]可见确实是沙俄侵占了准噶尔的这些领土。这点连伊·费·巴布科夫于《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俄国与准噶尔之间的国界是曾经定在沿额尔齐斯河至鄂木河河口，然后沿鄂木河向上至鄂毕河的。

本人相信，本书修订版的问世，会帮助有关学界发掘出更多新的研究内容，从而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也会通过更有理有据的批判，纠正兹拉特金的一些错误观点。让我们利用本书的修订版，共同努力开创有关研究领域的新局面！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1729—1730年，第1卷，第33页；1737年，第2卷，第5-6页；1742年，第3卷，第178-182页。均转引自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见本书第290页。

中译本序言

准噶尔是中国厄鲁特蒙古的一个游牧部落。17 世纪上半叶，准噶尔部崛起，其首领逐渐成为厄鲁特各部的统治者。在准噶尔部统治时期，我国厄鲁特蒙古的势力更加强大，厄鲁特各部的领地进一步扩展，其活动遍及苏联的南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中亚和我国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以及当时的喀尔喀蒙古，并直接影响着这些地区的历史。由于准噶尔统治的年代是厄鲁特蒙古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其影响又远及中外，所以，厄鲁特蒙古就以准噶尔的名称著称于世，他们的历史引起了中外历史学者的注意，到现在，已在世界历史学领域中，形成了以研究厄鲁特蒙古的历史及其在亚洲中部地区历史上的作用为主要对象的“准噶尔学”。

《准噶尔汗国史》的作者伊·亚·兹拉特金，是苏联的蒙古史学者，他的主要著作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蒙古人民共和国史（论文集）》、《蒙古近现代史概要》、《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概论》，编辑有《俄蒙关系档案（1607—1636）文件集》、《俄蒙关系档案（1636—1654）文件集》，参与编写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世界通史》、《东方各国近代史》，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条目，等等。他的《准噶尔汗国史》于 1964 年出版。

此书分 6 章，还有一篇很长的导言。导言评述了俄国和西方学者对准噶尔历史的研究和他们的主要著作，介绍了汉文、蒙文、俄文和其他文种有关准噶尔的史料。对汉文史料，作者特意采取了很大的保留态度，并认为只有对汉文史料给予“客观的批判”之后，才能加以利用。

作者在第一章中用很大篇幅探讨了厄鲁特四部的起源，叙述了明代瓦剌[1]（即厄鲁特）的情况及其与东蒙古（明史称鞑靼）、蒙兀儿斯坦（即察哈台诸后王）、明朝政府的关系。这一章还探讨了厄鲁特游牧社会宗法制度的性质、演变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二章分析了16世纪后半叶厄鲁特各部的矛盾斗争和一些部落的西迁及其原因，叙述了这一时期厄鲁特各部与喀尔喀蒙古和托辉特部（书中称其首领为阿勒坦汗）、哈萨克部、诺盖人、古楚汗国（即西伯利亚汗国）的关系。作者对所谓“准噶尔汗国”形成的各种条件作了分析。这一章还叙述了西藏喇嘛教在厄鲁特各部的传播及其作用。第三章主要是讲巴图尔浑台吉和僧格时期准噶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准噶尔与中亚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关系。作者特别突出了沙俄与准噶尔的所谓友好交往，极力冲淡和贬低准噶尔与中原地区的联系。第四章专门讲噶尔丹及其活动。作者认为噶尔丹是“拉萨喇嘛教一些权威人士的傀儡，这些人受达赖喇嘛和第巴的操纵，力求在喇嘛教领导人控制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神权的独立蒙古国”，噶尔丹的“全部活动都服从于这一目的”。第五章主要写了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策凌时期准噶尔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与俄国、哈萨克和中亚其他民族的关系。作者还特别突出了准噶尔与清政府的冲突和战争。第六章讲了18世纪上半叶准噶尔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阿睦尔撒纳支持达瓦齐夺取汗位和他归属清政府而后又背信弃义掀起叛乱的过程。作者谴责阿睦尔撒纳对清政府的归顺，而极力讴歌他“幡然悔悟”、叛变投俄的行为，并把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统一中国西北边疆说成是对外扩张和侵略。与此相联系，书中所附的一幅《15—18世纪卫拉特封建领地和准噶尔汗国示意图》（见本书第358页），把中国地域画得不超过长城，更是别有用心。

这部书虽然提出并探讨了若干准噶尔学方面的新问题，但是，就其贯穿于全书的思想来看，作者反反复复加以论证的主要是：（1）厄鲁特

---

〔1〕对其称呼，元明清三代的音译略有差异：元代称为斡亦剌惕，明代为瓦剌，清代称厄鲁特，而在国外对厄鲁特蒙古人一般称卫拉特或卡尔梅克。本书各章中的不同称呼即源于此。

的首领也不干为延安王。[1] 但厄鲁特及其活动地区在中国元朝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事实，在这部书中毫无反映。

元朝被推翻后，蒙古贵族逃入大漠南北，建立了割据政权。明初，这种割据集团主要有3个：一个是东部兀良哈部，这个集团于1389年归顺明朝；一个是由元帝室的后裔直接控制的鞑靼部，这个部以后也逐步归顺明朝政府；另一个割据集团就是厄鲁特蒙古——当时称瓦剌。瓦剌和其他蒙古一样，在政治上和明朝也建立了明确的隶属关系。1408年，瓦剌部首领马哈木等向明朝政府“请印信封爵”[2]，要求归顺明朝。次年，明政府赐封瓦剌的3个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分别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派大臣亦剌思到瓦剌亲授印诰等物。[3] 1416年，马哈木死，明政府命其子妥懽袭顺宁王爵；1426年，贤义王太平死，明政府任命其子捏列忽袭爵。妥懽死后，其子也先自称太师，但也没有忘记向明政府上书请袭王爵。明正统帝回信说：“太师继承祖父爵位，恭事朝廷……深表嘉悦”[4]。在这期间，明政府还根据妥懽、也先等人的请求，多次任命瓦剌各级首领为都指挥佥事、指挥佥事、都督等官职，任命瓦剌僧侣为“慈善弘化国师”、“都纲”等僧官，并向各级僧官颁发印册。一直到明末，沙俄派往瓦剌的“使者”还亲眼看到明朝政府的官员在向瓦剌部征收赋税。[5] 而本书的作者对这些反映厄鲁特蒙古与中原政权本质关系的事实轻描淡写，却极力突出明朝政权与瓦剌的战争，并对战争的性质加以严重歪曲。诚然，瓦剌和明朝政府之间曾发生过战争，但这个战争正好说明，瓦剌确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因为自元朝政权被明朝政权取代以来，蒙古贵族，包括瓦剌贵族在内，时怀恢复元朝统治之志。1370年，元朝末代皇帝死于漠北，其子嗣位，仍以元朝自称，与明朝政权继续进行着争夺全国政权的斗争。到15世纪80年代，蒙古贵族伯颜猛可仍自称大元大可汗。明朝屡次出兵蒙古，

〔1〕《元史》卷109《公主表》。

〔2〕《明成祖实录》卷59“永乐六年十月丙子”。

〔3〕《明成祖实录》卷64“永乐七年六月癸丑”。

〔4〕《明英宗实录》卷75“正统六年正月甲子”。

〔5〕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伦敦，1919年版，第37－39页。

蒙古或准噶尔从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和政权;(2)俄国对准噶尔从来都是友好的,俄国的侵略活动对准噶尔历史的发展起着进步作用;(3)准噶尔对清政府的战争,大都是以为自己民族的解放和建立统一的蒙古国为目的的正义战争;(4)清政府对准噶尔始终怀有侵略野心,并最终征服了准噶尔,侵占了准噶尔的领土。一言以蔽之,在兹拉特金的笔下,准噶尔的历史就是准噶尔首领为反对清朝政府的吞并威胁、争取建立统一的蒙古国而斗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清朝政府始终是侵略者,而俄国则是把友谊与进步奉献给准噶尔首领及其人民的天使。

作者的这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兹拉特金在他的书中极力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厄鲁特蒙古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厄鲁特蒙古的基本领地从来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厄鲁特蒙古是中国蒙古族的一支。12 世纪末,他们活动于叶尼塞河河源地区,即所谓"八水灌溉之地"[1],被称为斡亦剌惕。13 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以忽都哈别乞为首的一部分斡亦剌惕部归附成吉思汗,并帮助术赤统一了万斡亦剌和其他 10 余个部落,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和嘉奖,他将自己的女儿扯扯干嫁给忽都哈别乞的儿子脱栾勒,从此,斡亦剌惕部贵族与成吉思汗家族结成了世代的姻亲关系,在蒙古贵族中处于显赫的地位。成吉思汗曾在他们居住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驻兵屯守,建立起重要的后方据点。到窝阔台时,在叶尼塞河地区设有"工匠数局",手工匠人都是来自内地的"汉人"[2]。忽必烈时,厄鲁特游牧的叶尼塞河、谦谦州地区属岑北行省管辖。元朝政府在这里设万户府,派万户率军屯守,命汴梁祥符(今河南开封县)人刘好礼为谦谦州等五部断事官,他在这里"修库廪,置传舍","教为陶冶舟楫"[3],并在斡亦剌惕部与吉利吉思部之间,设置 6 个驿站,[4]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到元代后期,元朝政府还册封斡亦剌惕部

〔1〕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第 1 卷,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64 页。

〔2〕《元史》卷 63《地理志六》。

〔3〕《元史》卷 63《地理志六》。

〔4〕《元史》卷 12《世祖本纪九》。

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元末国内战争的继续。1451 年，瓦剌也先自称大元田盛（即天圣）可汗，他与明朝的战争，也是这一斗争的继续。甚至以后准噶尔首领与清政府的几次斗争，就准噶尔贵族来说，也有恢复大元江山的意思。因此，不论是瓦剌与明朝的战争，或是准噶尔与清政府的一些战争，都具有国内不同民族的统治阶级争夺国内统治权的性质，它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兹拉特金在这部书中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事实，一方面又否认厄鲁特蒙古是中国少数民族，这怎能自圆其说呢？

14 世纪末到 15 世纪初期，厄鲁特蒙古已向西南发展，逐渐越过杭爱山，到达由中国突厥族、回纥族、契丹族和蒙古其他部长期开发、活动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广大地区，西南到达吹河、塔拉斯河流域。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中国满族逐渐强大。漠南、漠北蒙古的首领看到明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遂纷纷归顺满洲。1635 年，漠南蒙古 16 个部、49 个首领正式议决，推满族首领皇太极为蒙古大汗。同年，漠北蒙古（即喀尔喀）车臣汗硕垒向皇太极上书、贡马。此后喀尔喀蒙古各部相继归属清政府。在漠南、漠北蒙古的影响下，厄鲁特各部的共主，即书中所说厄鲁特“丘尔干”拜巴噶斯的弟弟图鲁拜琥，于 1637 年向满洲遣使进贡。次年，他率领一部分和硕特部落进入青海、西藏等地，成为以后清政府直接管辖下的青海厄鲁特蒙古。1643 年，厄鲁特各部共主拜巴噶斯去世，其子鄂齐尔图率部分厄鲁特部落进入河套以西阿拉善地区，成为以后清政府管辖下的西套厄鲁特蒙古。1642 年，图鲁拜琥又偕同五世达赖喇嘛一起，向清政府上表进贡，表示归服。1646 年，清政府任命他为厄鲁特共主，“赐甲胄弓矢，俾辖诸厄鲁特”[1]。1653 年，清政府又册封他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并赐金册、印。[2] 自 17 世纪前期，准噶尔贵族统治厄鲁特各部之后，从巴图尔浑

〔1〕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 9《厄鲁特要略一》。

〔2〕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 9《厄鲁特要略一》。

台吉到阿睦尔撒纳，准噶尔的首领对清政府也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隶属关系。17世纪70年代初，噶尔丹成为准噶尔的首领后，他每年都向清政府派遣大批“贡使”，特别是17世纪80年代左右，准噶尔的“贡使”经常达千余人或数千人。噶尔丹还向清政府“吁请恩赐白金，以育众庶”[1]。1679年，我国西藏五世达赖以黄教首领的名义授给噶尔丹以博硕克图汗号，他立即向清政府报告，请求批准。清政府也不断派遣官员前往准噶尔。在平定吴三桂的叛乱后，康熙曾派大员到边疆各地告捷。康熙在给噶尔丹的谕旨中特意指出：“……自尔父兄历世相承，虔修礼好，敬贡有年，延及尔身，笃尽悃忱，往来不绝，殊为可嘉。……兹海宇升平，惠泽宜溥，特遣大臣侍卫官员等，赍捧重赏。”[2]1688年，噶尔丹发动了叛乱，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还承认准噶尔“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与中华一道同轨”[3]，表示不敢“自外于中华皇帝”[4]。1695年，噶尔丹叛军被清政府击溃后，五世达赖特意请求清政府不要削除噶尔丹的汗号，“仍使留存，且加敕印恩赐”[5]。这些情况都表明，就是在噶尔丹时期，准噶尔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也是十分清楚和明确的。

在噶尔丹发动叛乱率兵进入喀尔喀蒙古后，以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为首的准噶尔贵族，占领了准噶尔地区，他立即向清政府“告捷”，并保证“嗣后大君凡有谕旨，俱愿遵行”[6]。策妄阿喇布坦统治准噶尔时期，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他遵照清政府的指示，在阿尔泰地区切断了噶尔丹的归路，加速了噶尔丹叛乱的彻底失败。1697年，噶尔丹去世，策妄阿喇布坦遵照康熙的指令，将噶尔丹的尸体及其女儿一并送交清政府，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也要奏请清政府批准。如1698年，准噶尔与哈萨克发生了战争，策妄阿喇布坦立即向

〔1〕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康熙二十九年九月癸未”。
〔2〕《清圣祖实录》卷103“康熙二十一年七月”。
〔3〕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7“康熙二十九年七月”。
〔4〕《清圣祖实录》卷137“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
〔5〕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15“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庚子”。
〔6〕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9“康熙三十年二月戊午”。

康熙报告说，哈萨克头克汗杀掠厄鲁特人民，抢劫厄鲁特所属乌梁海部落，“臣是以兴兵而往，恐圣上谓臣喜事好兵，故陈此自白”[1]。对策妄阿喇布坦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当时的俄国人也是承认的。例如，曾经代表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布连斯奇界约》的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津斯基在他给沙皇的报告中曾说：“浑台吉（指策妄阿喇布坦。——引者）……将来可能脱离中国人而成为俄国的藩属和最有益的同盟者，那么对他保持友善关系不是坏事情。”[2]这段话说明，老沙皇对准噶尔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并不隐讳，而兹拉特金却对上述许多体现厄鲁特是中国蒙古族的史实，讳莫如深，不敢触及。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兹拉特金还在清政府武力平定准噶尔问题上大做文章，似乎这就是清政府“征服”、“侵略”准噶尔的铁证。这个观点是苏联某些史学家常持的论点之一。但是，这种渲染手法是蒙蔽不了人的。清政府用什么方式统一自己的国家，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而且事实上，清政府对准噶尔贵族叛乱活动的平定，也并不完全是靠清政府的武装力量，厄鲁特各部广大人民反对准噶尔贵族的叛乱，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起了重大的作用。

广大厄鲁特人民要求祖国统一，反对准噶尔贵族叛乱的斗争，由来已久。早在噶尔丹发动叛乱时期，大批厄鲁特蒙古部落就曾分两路离开准噶尔地区，一路向西，迁移到早已游牧在伏尔加河下游一带的土尔扈特部那里，一部分向东迁到和硕特部游牧的青海一带。[3] 1684 年，以憨都台吉为首的一部分准噶尔部落，也逃入内地，其首领还向清朝政府控告噶尔丹的残暴统治。[4] 在噶尔丹进入喀尔喀蒙古后，厄鲁特各部落大半归附策妄阿喇布坦，跟随噶尔丹的准噶尔牧民也大批逃亡。噶尔丹的叛乱就是在这种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清政府平定的。此后只要准噶尔首领有叛乱活动，总有大批厄鲁特部落摆脱准噶尔贵族的

〔1〕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 48“康熙三十七年四月癸亥”。

〔2〕转引自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彼得堡，1912 年版，第 126 页。

〔3〕见本书第 190 - 191 页。

〔4〕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 3“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子”。

统治向东迁徙。到1726年，迁入阿尔泰地区推河一带的厄鲁特牧民，数量已经很大，清政府把他们编设为6个旗。[1] 到18世纪50年代，即达瓦齐统治时期，厄鲁特各部牧民向东迁徙趋之如归，已是势不可挡。1753年，杜尔伯特6000余户由额尔齐斯河牧地东迁，清政府安置他们在阿尔泰一带游牧。[2] 次年，辉特部与和硕特部4000余户东迁。[3] 其他各部也纷纷“挈数万众屯内汛”[4]。这种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向东迁徙，集中反映了厄鲁特各部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于1755年出兵西北边疆。在进军途中，厄鲁特牧民“持羊酒迎犒者络绎载道，妇孺欢呼，如出水火”[5]。在厄鲁特人民的支持下，清军兵不血刃，不到百日，就进入伊犁。这充分说明，清政府进军准噶尔，反映了厄鲁特各阶层人民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顺应了当时形势的发展，准噶尔割据政权的垮台、祖国西北边疆的统一，绝不仅仅是靠清政府的“武力”所能办到的。

至于沙俄与中国准噶尔的关系，兹拉特金在这部书中却多方粉饰，硬把沙俄的侵略活动说成是“友谊”，是“善意关怀”。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早在17世纪初，沙俄就派遣所谓“使者”对中国厄鲁特蒙古的一些部落进行拉拢、利诱，妄图诱骗他们加入俄籍。到17世纪80年代，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遭到清政府的反击时，他们就公然煽动和支持噶尔丹的叛乱。沙俄全权大使戈洛文在伊尔库茨克专门接见了噶尔丹的“使者”，支持他进攻喀尔喀蒙古。[6] 1690年，戈洛文又致函噶尔丹，通知他俄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与噶尔丹“采取共同行动”，进攻土谢图汗，并就如何共同对付土谢图汗“及其支持者（指清政府。——

〔1〕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1《厄鲁特要略三》。
〔2〕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1《厄鲁特要略三》。
〔3〕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2《厄鲁特要略四》。
〔4〕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2《厄鲁特要略四》。
〔5〕松筠：《钦定新疆识略》卷首。
〔6〕沙斯季娜：《17世纪中俄关系》，第2卷，第18页。

引者)的问题进行谈判"[1]。1691 年,沙俄又派遣马特维·尤金到噶尔丹处,鼓励他继续扩大叛乱。事后噶尔丹即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内侵"。但是,由于当时清朝国力强盛,在康熙亲征下,噶尔丹的叛乱被平定了,沙俄利用噶尔丹实现其侵略的目的并未达到。

18 世纪初,沙俄政府得到中国叶尔羌地区盛产黄金的消息,遂积极策划侵占从我国边界直到叶尔羌的中国广大地区。1713 年,沙皇批准了从额尔齐斯河上游修筑一条直到叶尔羌的堡垒线的计划,妄图侵占中国准噶尔的广大地区。1715 年,以布赫戈利兹为首的沙俄侵略军竟公然侵入额尔齐斯河上游亚梅舍夫湖地区修建堡垒,准备南侵。1716 年,在准噶尔人民抗击下,沙俄侵略军不得不退出亚梅舍夫湖地区,但在撤退途中,仍在准噶尔领地修建堡垒,侵吞了准噶尔大片领地。在阿睦尔撒纳叛乱期间,沙俄多次对他表示支持,西伯利亚总督米雅特列夫还建议沙皇直接出面干涉。只是在清政府迅速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后,沙俄侵略准噶尔的阴谋才破产。兹拉特金虽然极力为沙俄的侵略行径辩护,但是事实是难以掩盖的,这部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沙俄侵略准噶尔的历史事实。而且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俄国当局极力通过和平手段把卫拉特王公和执政者变成俄国的臣民,把从属这些王公和执政者的居民变成替俄国国库提供实物税的属民,并把他们居住的地区变成俄国的领土"[2]。

这部书虽然问题不少,但仍是值得我们参考的,这不仅因为它集中反映了苏联学者在准噶尔历史问题方面的种种观点,透露了不少沙俄侵略准噶尔的罪行,而且还因为它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准噶尔的历史和中亚、南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等地的许多民族、国家以及他们与准噶尔的关系,这对我们研究中国厄鲁特蒙古和这些地区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部书对俄国有关准噶尔历史的著作以及西方学者对准噶尔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作了综合性的评述,观点虽不一定正确,但可以

〔1〕见本书第 210 页。
〔2〕见本书第 119 页。

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俄国和欧洲研究准噶尔的情况。特别是兹拉特金在这部书中引用了大量我们无法见到的俄国档案资料，为研究准噶尔历史提供了一些新线索。因此，翻译出版这部书，对我国研究厄鲁特蒙古的历史和其他有关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书中引用《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和《平定准噶尔方略》的资料，译者都用了该两部书的原文；对兹拉特金引用错了的内容，加了必要的注释。兹拉特金对准噶尔的一些人名，译音不尽准确，译者也尽量以《皇朝藩部要略》和《西域图志》等书的译音为准译出；个别差别较大的，作了必要的注释。

杨建新

1979 年 4 月

导　言

3

准噶尔汗国形成于17世纪30年代，存在到1758年，在当时中亚、中央亚细亚和东亚的国际关系中起过巨大的作用。这个汗国在跟它毗邻的大小国家和民族——包括西藏和喀什地区在内的中国、俄国、蒙古、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和卡拉卡尔帕克——的历史上留下了显著的遗迹。

在许多欧、亚文的书籍和文章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过准噶尔汗国的历史及其内部体制和对外政策问题，也提到过这个汗国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历史命运的影响和所起作用的评价。仅用俄文一种文字，就出版了这类作品150种以上，这反映了准噶尔汗国与俄国之间所存在的联系的特殊性质和紧密程度。虽然目前还很难确定这类中文作品的数量，但是根据现有的全部资料看，数量也颇为可观。在中亚突厥语作者的著作中，提到准噶尔汗国及其民族情况的也不少。至今仍几乎一无所知的是这一论题的藏文著作。我们只能根据蒙古学者比拉[1]的藏文蒙古历史著作中所提供的资料来揣想它的丰富程度和科学价值。许多研究准噶尔汗国史的著作，已经用德文、英文和法文发表。可惜，研究这个问题的蒙文——准噶尔汗国基本居民群众的本民族语——著 4
作却出版得最少。

现有的和不断出现的文献证明，对准噶尔汗国历史的兴趣，过去是不小的，现在也未见减弱。就这个意义上说，准噶尔汗国比起某些汗国，比方说：比起跟准噶尔汗国同期存在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以及中亚和中央亚细亚的许多国家来，要远为“幸运”得多，如果

〔1〕比拉（Ш. Бира）：《藏文蒙古历史文献》（17—19），乌兰巴托1960年版。还可参阅罗埃雷奇（G. N. Roerich）：《蓝皮年鉴》（The Blue Annal's），纳格—库鲁（Naggar-Kulu），喜马拉雅山，1946年版。

可以这么说的话。不过，说准噶尔汗国“幸运”，是对研究它的著作的数量而言，而对这些著作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则无论如何还不能这么说。在现代，论述东方民族历史的篇章不多，而且是资产阶级历史专著所特有的观点继续占着统治地位，大部分研究准噶尔汗国的文献，正是这类著作的明证。这类文献的特点就是对史料不加批判，对历史事件不作客观分析，不能把历史过程的真相搞清楚。上述缺陷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史料根据比较贫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研究人员在方法论上的无能。

用各种语言写的有关准噶尔汗国及其基本居民——西蒙古人，他们自称为人们所知的卫拉特人[1]——的著作所依据的史料是什么呢？可能用来创立一部科学的准噶尔汗国史的新史料又有哪些呢？

讲述明（1338—1644）清（1644—1912）[2]的中国历史著作和历代王朝的官方年鉴，长期以来成了研究有关卫拉特情况唯一的资料来源。著名的俄国蒙古学和西藏学学者施米特院士，在1833年12月科学院学术会议上作了一个《论蒙古部落》的报告，其中说道：“我们至今才知道有关这些部落的命运，有关他们的游牧区、管理条令和管理方式，这一切我们几乎全要特别归功于当前中国朝廷出版的资料，其中大部分在欧洲还未为人所知，因为不论在各种传教士团和外交代表团的游记中，还是在北京布道会教士的著作中，或者狄庚和现代巴黎汉学家所掌握的有关蒙古的资料，都极为零碎、贫乏，而且错误百出，因而不能作为

---

〔1〕科特维奇（В. Л. Котвич）在他写的一部关于卫拉特的著作中写道：“在俄国和外国文献中，常使用3个术语来表示西蒙古人：卫拉特——出自蒙古史料，卡尔梅克人——出自古代俄国史料（其中包括档案资料）所遵循的伊斯兰教史料，厄鲁特——出自中国史料。这里采用了蒙古术语卫拉特，而卡尔梅克人这个术语，专门用来表示那批住在伏尔加河、顿河及乌拉尔河一带的卫拉特人，他们已习惯于卡尔梅克人这个名称，而遗忘了古名——卫拉特”，见科特维奇：《有关17—18世纪对卫拉特人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Русски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сношениям с ойратами В XVII - XVIII В. В.），载《俄罗斯科学院院报》，彼得堡，1919年，12－15期，第791页。

我们赞同科特维奇的观点，也把准噶尔汗国的居民叫卫拉特人，而把17世纪在伏尔加河下游定居的卫拉特人叫卡尔梅克人。

〔2〕这里清朝统治的年代有误，应为1644—1911年。——译者

可靠的史料。"[1]可以看出,施米特认为,只有中国史籍可以作为研究蒙古人历史的可靠史料。

俄国汉学奠基人尼·比丘林(雅金夫)[2]也对中国史料持有同样的评价,甚至更高。比丘林认为中国史料最大的优点是,这些史料的作者"在描述与中国有直接联系的毗邻民族时,都只以官方提供的事实为根据,而这些事实,都是事件发生当时记载下来的。"[3]

有关新疆的中国地理著作,是比丘林所写的那部有关卫拉特人的著作的主要基础。比丘林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写道:"我这本卫拉特历史概述,在说明跟这个民族有关的事件时,是按照事件的真实状况和顺序来反映它们的,这就使读者有可能正确无误地判断作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各种不同见解"。[4] 可以看出,这本卫拉特历史概述的作者认为,中国作者的著作是真相的标尺。按比丘林的意见,有了这个标尺,读者就有可能正确无误地判断其他作者的观点了。

比丘林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从中国封建史籍中吸取来的论述西蒙古人历史的丰富多彩的实际资料。在对他的这种伟大学术功绩给予应有评价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由于他对文献中的史料采取不加批判的态度,所以中华帝国王朝的官方编者和历史编纂家们所提出的那些说法(无论是就一般蒙古人的历史来说,还是特别就卫拉特历史来说),都长期地得到了肯定。

比丘林的研究方向由俄国学者波科季洛夫和普·波波夫继承了下来。他们两人用中国官方编年史和历史著作的新译本、新论述丰富了

---

〔1〕施米特(И. Я. Шмидт):《论蒙古人的民族部落》(О народных племенах монголов)。这是施米特院士 1833 年 12 月 29 日在皇家科学院公开学术会议上所作的专论,载《国民教育杂志》,圣彼得堡,1834 年 3 月,第 307 页。

〔2〕尼·比丘林(Н. Бичурин),僧名雅金夫(Иоакинф)(1777—1853 年),俄国著名东方学家。著有不少论述中国、蒙古、中亚的历史著作、人文地理学著作和经济方面的著作。——译者

〔3〕《纪元前 2282 年到纪元 1227 年的西藏和青海史(附有各时期历史地图)》(История Тибета и Хухунора с 2282 года до Р. Х. до 1227 года по Р. Х. с картю на разные периоды сей истории),雅金夫·比丘林译,1-2 卷,圣彼得堡,1833 年版,第 5 页。

〔4〕雅金夫:《从 15 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的历史概述》(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йратов или калмыков с X V столетия до настоящег о времени),圣彼得堡,1834 年版,第 3 页。

有关蒙古的学术研究。在这些著作中，有不少记述卫拉特的珍贵资料。[1] 可是，他们对历史事件所作的解释证明，作者对史料也抱着不加批判的态度。这就决定了他们两人作品的倾向性。例如，波科季洛夫写道，在两部蒙古编年史——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和《黄金史》中只有"迅速更迭的蒙古领主姓名的罗列，对这些领主安排了几个传奇式的故事，如果按照蒙古史料直接研究这些故事，要揣想出它的历史涵义是太难了，而且有一部分则是完全不可能的。毫无疑问，上述期间所留存的蒙古史著作远不只限于上面所说的两部古代文献，但是，无论已经发现多少新的编年史和传说，它们的特点无疑地都具有同样偶然的、传奇的性质。只有对中国史料中有关这一论题的全部现有资料进行精细研究，才能把所有这类传奇故事联系起来，编写出明朝时期历史事件的或多或少完整的图景，即唯有中国史料能为我们提供坚实的历史基础和一系列可靠事实，而蒙古的故事则只能是这些雄辩事实的例证"[2]。

中国的编年史和某些史籍对于研究东亚和中央亚细亚各民族的历史具有巨大意义，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仍然需要对中国史料持客观的、科学的批判态度，而不能单纯地加以转述，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史料才能得到充分可信的利用。然而，不管是比丘林本人的，还是其继承人的研究蒙古历史的著作，主要的缺点就是对史料不加批判，他们忽视了中国王朝的官方年鉴以及有关中国邻近民族的某些历史著作中有受历史、政治和社会条件制约的情况。[3]

---

〔1〕波科季洛夫（D. Покотилов）：《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Историця восточных монголов в период династий Мин. 1368—1634），圣彼得堡，1839 年版；《蒙古游牧记》，普·波波夫（П. С. Попов）译，圣彼得堡，1895 年版。

〔2〕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的东蒙古人史》，第 11 页。

〔3〕兹举 17 世纪末出版的历史名著《通鉴纲目》的满文译本为例。从 1691 年玄烨皇帝（他 1162—1722 年执政的年号是康熙）所写的出版序言中，我们得知，按皇帝圣旨组织有一个宫廷直属的翻译委员会，译出后，"朕几务之暇，留神披阅，博稽详考，纤悉靡遗"。写序言的这位皇帝，作者认为，对这部作品"详考"是必要的，因为他在《通鉴纲目》的第三部分论述宋、辽、金、元各执政者的言行里，就发现了许多"陋"、"疑"之处。参看：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ЦГАДА），第 181 号档，第 203 卷，第 1－5 张。

弗拉基米尔佐夫有充分根据地指出，比丘林的著作给史学界带来了许多有关蒙古和蒙古人历史的错误概念。他写道："许多对卫拉特完全不正确的观点……肇端于比丘林的……那本名著《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说》，这本书到处是不确切的和错误的说法。"[1]著名的东方学家勃列特史奈德由于同样的原因，也狠狠批判了比丘林论述蒙古和卫拉特的学术著作。勃列特史奈德认为，特别是对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描述最薄弱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转述中国史料《西域同文志》(《中亚史地辞典》，1763 年按弘历皇帝的命令写成并发表的著作)为基础的。[2] 勃列特史奈德对乌斯宾斯基的类似著作《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一书的评价，要比对比丘林的著作的评价高得多，因为乌斯宾斯基不是拿一部，而是拿许多部中国史料作为其学术著作的基础，并且批判地对待了这些中国史料。然而，必须指出，比丘林的著作对于写作西伯利亚、中亚、哈萨克斯坦、卡尔梅克等历史的许多 19 世纪我国学者以及对于研究草原民族法律的法学家，都有过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作者在他们必须提到蒙古人的历史时，总是跟着比丘林，一再讲述中国官方的那些说法。

上述文献中的中国史料及其利用情况就是这样。

闻名欧洲的第一部蒙古史料是《蒙古源流》[3]（或译作《诸汗系谱宝史纲》）。这部著作的作者——蒙古领主萨囊彻辰生于 1604 年，死的时间不会早于 1662 年，蒙古诸汗史他只写到 1652 年。在萨囊彻辰的编年史中，包括许多 15、16 世纪的卫拉特史料。萨囊彻辰把 7 本较

---

〔1〕弗拉基米尔佐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з）：《蒙古的社会制度——蒙古的游牧封建主义》（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монголов，Монгольский коцевой фиодалмзм），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 年版，第 157 页。

〔2〕勃列特史奈德（E. Bretschneider）：《东亚史料中的中古史研究》（Mediaval Resea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第 2 卷，伦敦，1888 年版，第 168 页。弘历（即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于 1736—1795 年执政，年号乾隆。——译者

〔3〕乾隆年间，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将家藏蒙文抄本《蒙古源流》进献乾隆皇帝，乾隆命史馆译为汉文。成书于乾隆五十四年，共 8 卷。——译者

早期的蒙古历史著作(我们见到的只有3本)作为他的著作的根据。[1] 萨囊彻辰的著作最初被译成德文,并于1829年由施米特在彼得堡出版。[2] 后来,又被不止一次地用俄文和西欧文字摘录重版。只是在不久以前,这部作品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由海希斯全文出版,后来又在美国由摩斯塔尔特出版。我们多半引用摩斯塔尔特的译文。[3] 1958年,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所保存的抄本,萨囊彻辰的著作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全文出版。[4]

第二部(按发表时间)论述蒙古和卫拉特历史的蒙古史料,是无名氏的作品《黄金史》,它由喇嘛学者伽尔萨·贡布耶夫译成俄文,1858年第一次发表在《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札记》上。这部作品是一个无名作者在1600年至1625年间写成的,即比萨囊彻辰的著作早20—30年。我们在下面将说到,这两部蒙古著作在有关卫拉特历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说法很不一致。苏联和外国的文献都已经指出,贡布耶夫的译本和他所使用的抄本,同样都不完善。1955年,巴乌登的著作在维司巴登问世。[5] 这本书中有拉丁文拼写的《黄金史》原文和英译文,附有批评意见,并指出了与一系列其他抄本异文的现象。为了力求把可能的错误缩小到最少的程度,我们既利用贡布耶夫的文本,也利用巴乌登的文本。与萨囊彻辰的著作同样,《黄金史》作为准噶尔汗国的史前期的一部史料,[6]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三部蒙古史料以简称《宝贝念珠》(它的全名是《编年史"宝贝念

---

〔1〕普契科夫斯基(Л. С. Пучковский):《蒙古、布里亚特蒙古和卫拉特手稿及木刻家》(Монгольские,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ие и ойра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第1分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版,第25-28页。

〔2〕萨囊彻辰(Ssanang Ssetsen):《鄂尔多斯萨囊彻辰洪台吉撰的东蒙古人及其王家史》(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und ihrer Fürstenhauses verfasst von Ssanang Ssetsen Chungtaid-schi der Ordus),施米特译自蒙文,圣彼得堡—莱比锡,1829年版。

〔3〕萨囊彻辰:《蒙古源流》(Erdeni-gin Tobči)——萨囊彻辰著的蒙古编年史,附有摩斯塔尔特的评序,1-4卷,剑桥—马萨诸塞,1956年版。

〔4〕萨囊彻辰:《蒙古源流》,乌兰巴托,1958年版。

〔5〕巴乌登(Ch. R. Bawden):《蒙古编年史——黄金史》(The Mongol Chronicle Altan Tobči),维司巴登,1955年版。

〔6〕原文如此,此处指准噶尔的早期历史。——译者

珠”》）闻名，由波兹德涅耶夫译出一部分，于1883年在彼得堡出版。 10
1960年，这部编年史在乌兰巴托全文发表。《宝贝念珠》的作者——噶尔丹台吉担任土谢图汗的爱马克中一个旗的协领职务。写成《宝贝念珠》的确切时间还不清楚，但按其内容来看，是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的。这部作品中有一些关于准噶尔汗国史的重要资料。

第四部蒙古史料是《黄册》（《蒙古诸汗的世谱大黄册》），由沙斯季娜翻译并于1957年首次在莫斯科出版。作者是谁不知道，也不能确定这部史料的创作时间。无疑的一点是，它是萨囊彻辰所了解的，因为他曾引用过《黄册》这本史料。[1] 因此，这本书的写成时间不会迟于16世纪中期。《黄册》中有涉及准噶尔汗国形成以前的卫拉特历史资料。

已经发表的，在不同程度上阐述卫拉特和准噶尔汗国历史的蒙古史料只此而已。可见数量不多，并且这些古代文献发表的时间间隔很大：第一部——1829年，第二部——1858年，第三部——1883年，第四部——1957年。[2]

除了这些发表过的以外，还有一系列有待出版的很有价值的蒙古史料。其中许多珍藏在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分所的手稿 11
部。在这些史料中，首先得指出的是《咱雅班第达传》。咱雅班第达是西蒙古驰名的喇嘛教活动家之一，在17世纪前半叶和后半叶初期的喀尔喀和准噶尔社会政治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搞到的《咱雅班第达传》是出自他的一个学生和信奉者——拉特纳勃哈德勒之手笔。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的藏书中，有一个《咱雅班第达传》的卫拉特文影印本，曾交我们使用。1961年我们收到乌兰巴托寄来的这

〔1〕普契科夫斯基：《蒙古、布里亚特蒙古和卫拉特手稿及木刻家》，第26页。

〔2〕我们没有提1866年卡法罗夫（帕拉基）第一次翻译出版和1940年柯津第二次翻译出版的《元朝秘史》，因为这本史料中所提到的有关卫拉特的情况属于12—13世纪。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没有提拉施特的《史集》。没有谈到的还有1912年在彼得堡用蒙文发表过，但没有包含卫拉特历史资料的蒙古编年史《青史》。

译者按：拉施特（1247左右—1318年），原为波斯伊儿汗国宫廷医生，他的著作《史集》是研究古代蒙古史的重要史料。

个传记的蒙文本，它是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的抄本于1959年出版的。[1] 本书中我们一般使用乌兰巴托版本的原文。

上面列举的全部蒙古史料的特点在于，它们都是大封建主或这个阶级出身的人所写的著作，都具有喇嘛教及其思想影响的痕迹。在清朝统治蒙古时期写成的作品，与其说是反映蒙古封建主的利益，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是反映了满、汉封建主的利益。

必须指出，蒙古史料长期以来为专家们所忽视，也没有得到科学界应有的重视。19世纪的东方学家们认为，想借助蒙古著作作为研究蒙古历史的史料是徒劳无益的，这些东西最多只不过是对民族志学者以及考古学家有用的一些材料。例如，19世纪杰出的俄国东方学家萨维利耶夫就是这样认为的。[2]

19世纪末的一位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这一方面如果不是唯一例外的人，也是罕见的人。他的很多有关蒙古和蒙古人历史方面的很有意义的著作，一般是以蒙古史料为依据的，但是波兹德涅耶夫的学术著作却具有不少缺点，这些缺点大大降低了他的著作的科学价值。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待整个蒙古人采取傲慢的、一定程度上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而且不是始终客观地解释历史事件。上述某些缺点早在19世纪时就受到了批判。[3]

只是到了现在，蒙古革命前的历史著作才成了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细致研究的对象。这就为认识蒙古人民的历史，了解其社会制度和文化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许多著作在这方

---

〔1〕拉特纳勃哈德勒（Ratnabhadra）：《咱雅班第达传》（Rabj' amba Caya-bandida-yin tuguǰi saran-u gerel kemekü ene metu bolai），乌兰巴托，1959年版。

〔2〕萨维利耶夫（П. С. Савельев）：《序言》（Предисловие），见《蒙古编年史——黄金史》（原本和译本）所附《卡尔梅克文的乌巴什洪台吉及与卫拉特的战争史》，伽尔萨·贡布耶夫译，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卷4，圣彼得堡，1858年版，第8－9页。

〔3〕米纳耶夫（И. П. Минаев）：《佛教的强辩》［评论，Апология ламства（рец.）］，载《国民教育部杂志》（ЖМНП），1888年6月；波兹德涅耶夫（А. М. Позднеев）：《答米纳耶夫教授的评论》（Ответ на рецензию профессора И. П. Минаева），载《国民教育部杂志》，1888年12月；维谢洛夫斯基（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ий）：《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评论，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Эрдэ нийн Эрихэ》），载《国民教育部杂志》，1864年6月；波兹德涅耶夫：《答维谢洛夫斯基》（Ответ 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ому），载《国民教育部杂志》，1884年12月。

面是令人信服的证明。不过，理所当然地也应该像对待其他任何史料一样，批判地对待蒙古史料。

有些卡尔梅克历史著作跟上述史料描述的范畴很相近。这些著作的作者出身于17世纪定居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封建贵族阶级。我们首先指的是1739年加班沙拉勃医生所写的《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和1819年卡尔梅克领主巴图尔乌巴什丘缅所写的《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第一本《故事》的作者说明，他汲取的资料来自跟主教谷曼喇嘛、喇嘛学者阿尔达加勃士、著名的卫拉特执政者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寡妇多尔士拉卜丹、卡尔梅克执政者阿玉奇汗以及塔朋乌罕大臣等人的交谈。加班沙拉勃向所有这些人详细打听过以往一些事件，把他们的口述记录下来，尽量加以验证。有时还补充一些他自己的评价和注释，根据土尔扈特族系起源的传说，他们的始祖是13世纪时客列亦惕执政者王罕的内侍官。在叙述这个传说时，加班沙拉勃写道，他无法说明这个内侍官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离开了王罕，因为没有确切的资料，但是，也可能在喀尔喀会有这方面可靠的书面资料。[1] 需要指出的是，这位卡尔梅克编年史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出这类保留意见。例如，他一面肯定杜尔伯特和绰罗斯系的卫拉特王公们具有共同的族系，同时又写道，由于缺乏确切的资料，他不能说出究竟是什么时候杜尔伯特和绰罗斯分离了。[2] 根据同样的理由，他拒绝阐明和鄂尔勒克之前土尔扈特部各执政者的活动等等。[3] 加班沙拉勃的保留意见使我们有一定根据得出结论，《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的作者使用过某些文字史料，并且有意识地不谈这类未能得到证明的卫拉特历史事件。这个情况提高了《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这部卫拉特史料的价值。

巴图尔乌巴什丘缅的《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原著，最初

13

〔1〕加班沙拉勃（Габан-Щараб）：《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Сказание об ойратах），卡尔梅克手稿，原本，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国立大学图书馆藏书，木版，325，编号15536，第2页。

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副教授布尔杜科娃曾盛情地将这一手稿的影印本连同译文初稿交给我使用。借此机会，特向布尔杜科娃表示深切的谢意。——译者

〔2〕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3页。

〔3〕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25页。

是由波兹德涅耶夫于1885年以石印本出版的。[1] 更早一些时候，这本故事就被雷特金译成了俄文，并发表在《阿斯特拉罕省报》上。[2] 雷特金精通卡尔梅克文，这决定了译文的高质量，因此可以深信不疑地使用它。

看来，巴图尔乌巴什丘缅手头掌握有某些蒙古史料。不过，这些史料常常使他陷入困境，因为不能解开症结，不能为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提供有条不紊的明确概念。他写道："据说，蒙古的编纂家们叙述过远古时代蒙古游牧区的情况，也许在当时，他们所叙述的那些事件的故事是清楚的，可是，对于距当时事件很远的现代编纂家来说，就很难把其中杂乱无章的东西弄清楚。"[3]

巴图尔乌巴什丘缅也像加班沙拉勃一样，预先说明他没有可能引证权威的史料来充实所记载的资料和看法，因此，按照他的意见，记载可能会有错误。譬如说，在叙述和硕特部的王公世谱时，他在附注中写道："这里和后边，在计算人名和继承情况方面，似乎有错误，可是目前，我们还无法校正它们，因为手头没有为此所必需的史料。"[4]

不过，从巴图尔乌巴什丘缅所写的《故事》中，完全肯定了一本史料，即他在注释里直接引证了一本温柴特阿尔达加勃士的编年史。[5] 这个温柴特阿尔达加勃士和加班沙拉勃提到的阿尔达加勃士可能是同

---

〔1〕巴图尔乌巴什丘缅（Батур-Убаши-Тюмен）：《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Сказание о дэрбэн-ойратах），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астраханских калмыков），圣彼得堡，1885年版，第49－90页。

〔2〕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雷特金（Ю. Лыткин）译，载《阿斯特拉罕省报》（Астраханские губерн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1859年，第43，47，49，50期；1860年，第11、12期。

〔3〕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历史文献》，第52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59年，第47期。

〔4〕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历史文献》，第56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59年，第47期。

〔5〕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历史文献》，第54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59年，第47期。

一个人，即我们还不太清楚，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却使用过的那部编年史的作者。

直到目前为止，在俄国的，尤其是在外国的研究蒙古人和卫拉特人的历史文献中，上述卡尔梅克史料还几乎完全没有被利用。这既由于这类史料太少，也由于许多东方学家对于蒙古史料的意义一般估计不足。我们只知道一个把卡尔梅克人的《故事》用作研究蒙古史史料的尝试，那就是雷特金于1860和1861年在《阿斯特拉罕省报》上发表了一部详细而又很有趣味的史纲，题目是《卫拉特历史资料》。除了已经提到的两本《故事》之外，作者还使用过《咱雅班第达传记》、萨囊彻辰的著作、16世纪末卫拉特击溃喀尔喀的硕垒乌巴什洪台吉所率部众的史诗传说和《江格尔传》，作者也亲自同许多“身孚众望”的卡尔梅克人交谈过。根据这些材料，雷特金才编出了一部极为详尽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叶的卫拉特史纲。史纲的缺点在于，作者没有越出领主生活中的政治、宗教和军事事件的范围，完全忽略了社会经济因素，而且提供的卫拉特对外政策史方面以及他们与邻国经济联系方面的资料很少。

我们对于论述卫拉特历史的突厥语文献还不太了解，研究得更少。然而考虑到卫拉特与东土耳其斯坦和中亚各突厥语系民族自古毗邻并有各方面的联系，可以初步认为，在这些民族的文献中一定会有不少有关卫拉特人的生活、风俗习惯和历史情况的重要资料。我们主要是根

据巴托尔德[1]和瓦利汉诺夫[2]的著作来判断这一点的。不过，无论我们从这种文献中汲取的有关卫拉特人的资料是多么少，它还是对中国和蒙古的史料作了重要补充。特别是对于15世纪后半叶和16世纪前半叶这一时期，无论中国的，还是蒙古的史料都谈得很少。因此，不能不对至今还未研究察哈台兀鲁思的历史表示惋惜，它在这方面比术赤兀鲁思要不顺利得多，其实，揭示察哈台汗国的历史演变情况，会大大有助于填补15、16世纪卫拉特历史上的许多空白点。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考古、民族志研究所不久前公布的材料，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3]

最后，我们谈一谈论述卫拉特人历史的俄国史料，这些史料对17和18世纪意义格外重大。如果没有这些史料，就不可能复现，更不可能了解准噶尔汗国的历史。其中占有极重要地位的是：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和科学院档案馆的有关文件。它们几乎包括所有派往卫拉特王公处的俄国外交代表团的文件资料以及卫拉特派来俄国的外交代表团的材料；俄国边防当局就他们和卫拉特各

---

〔1〕巴托尔德（В. В. Бартольд）：《土耳其斯坦旅行报告》（Отчёт о командировке в Туркестан），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第15卷，圣彼得堡，1904年版，第2、3期；巴托尔德：《吉尔吉斯人》（Киргизы），伏龙芝1927年版；巴托尔德：《突厥人及蒙古人社会风习与经济制度的联系》（Связ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быта с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м укладом у турок и монголов），载《喀山国立大学考古、历史和民族志学会学报》（Извес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при Казан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第34卷，喀山，1929年，第3－4期；巴托尔德：《谢米列契史略》（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Семиречья），伏龙芝1943年版。

〔2〕瓦利汉诺夫（Ч. Валиханов）：《关于1858—1859年南路（小哈布拉）六城的状况》（Остоянии Алтышаара или шести восточных город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Нан-лу/малой бухарии/в 1858—1859гг.），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ЗИРГО），圣彼得堡，1861年版，第3册；瓦利汉诺夫：《准噶尔简史》（Очерки Джунгарии），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1861年，第1、2册。

〔3〕伊勃拉吉莫夫（С. К. Ибрагимов）：《玛苏达·贝·奥斯玛尼、库赫斯坦尼的阿布尔海尔汗史》（Сочинения Масуда Бен Османи Кухистани "Тарихи Абулхаир-хани"），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科学院学报》，阿拉木图，1958年版，第2(7)期；伊勃拉吉莫夫：《卢兹别罕的米赫曼乃蛮和布哈拉——论述15—16世纪哈萨克斯坦历史资料》（"Михман-Намен и Бухара" Рузбехана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XV－XVI вв.），载《哈萨克斯坦古代史和中古史新资料》（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древней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第8卷，阿拉木图，1960年版。

执政者的关系给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报告;因各种事务去准噶尔的俄国官员和其他人员的一些细致盘问性的谈话;准噶尔王公们给俄国当局和俄国政府的信件;莫斯科和彼得堡就与卫拉特各公国的关系给地方当局的命令和文件、外交谈判记录等等。由于多数是原本,就使这些文件具有了特殊的价值。他们数量极大——成千,也可能上万。

俄国档案文件谈到了从 1604 年的事件开始直到 18 世纪 60 年代为止的卫拉特和准噶尔汗国的情况。根据这些文件几乎可以透彻研究这一个半世纪中卫拉特一年一年的历史。这些文件中记录了卫拉特外交活动和经济联系方面一切最重要的东西,记载了卫拉特的内部生活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方面的一系列极为珍贵的资料。某些俄国档案文件曾在 18、19 世纪的各种刊物上登载过,不过这类出版物的数量,比起亟待发表的东西来,是微乎其微的。

除了官方文件之外,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鄂木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地的档案库中,还有专门研究准噶尔汗国和卫拉特问题的未出版过的书籍和文章的手稿,其中某些很有价值。我们尤其要指出一部著作——1761 年五等文官瓦西里·巴库宁撰写的《卡尔梅克族,特别是土尔扈特族及其各汗和领主行为的记述》。[1] 这本书的作者先后在卡尔梅克汗和汗国全权代理人的牙帐里当了多年翻译,此后他长期是俄国管理卡尔梅克事务机关的成员。由于熟悉卡尔梅克人的语言、生活和风俗习惯,巴库宁能把卡尔梅克社会制度和行政体制方面有意义的资料列入他的《记述》,这就为了解整个卫拉特社会的内部结构,尤其是准噶尔汗国的内部结构减少了困难。这本《记述》曾由拉祖莫夫斯卡娅加了一篇短短的前言,略加删减之后,部分刊登在莫斯科 1939 年第 3 期和第 5 期的《红档》杂志上。照原文校对时查明,发表的这篇文章偶有疏忽的错误。

17

不能说过去没有尝试过使用论述蒙古历史的俄国史料。俄国的历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卡尔梅克卷宗(Калмыцкие дела),119/1 号档,1630—1736 年,Ia 卷,第 1 - 141 张。

史研究者们，尤其是西伯利亚、中亚以及卡尔梅克汗国的历史学者，曾经不止一次地采用这类史料。最早为了学术目的而熟悉俄国档案资料的人，是西伯利亚历史学者米勒和费舍尔。自然，他们的著作也是俄蒙关系史，尤其是俄国与卫拉特关系史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后来，西伯利亚、卡尔梅克以及中亚的历史学者，在涉及俄国同准噶尔的相互关系时，都以米勒和费舍尔所利用过的资料和文件为依据。[1] 但米勒和费舍尔不仅没能解决这一论题，而且，甚至没有很充分地以科学的客观态度提出这个论题。正如有部文献所指出的那样[2]，他们两人分类挑出的俄国和蒙古、俄国和卫拉特关系方面的文件，具有信手拈来的性质。此外，他们在阐述一些事件时，持有一种表现得很明显的反蒙古倾

〔1〕例如，阿·波波夫（А. Попов）：《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简评》（Краткие замечания о приволжских калмыках），载《国民教育部杂志》，1839 年 4 月；比尤烈尔（Ф. А. Бюллер）：《游牧和定居于阿斯特拉罕省的非俄罗斯人》（Кочующие и оседложивущие в Астрахан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инородцы），载《祖国丛刊》（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диски），第 47 卷，1846 年；涅费捷耶夫（Н. Нефедьев）：《有关原集居于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详细资料》（Подробные сведения о волжских калмыках，собранные на месте），圣彼得堡，1834 年版；尼·波波夫（Н. Попов）：《塔季谢夫及其时代》（В. Н. татищез И его время），莫斯科，1861 年版；克拉索夫斯基（М. Красовский）：《西伯利亚的吉尔吉斯人地区》（Область сибирских киргизоз），载《俄国历史和统计资料》（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и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ии），第 2 卷，圣彼得堡，1868 年版；库罗帕特金（А. Н. Куропаткин）：《喀什噶尔》（Кашгария），圣彼得堡，1879 年版；谢格洛夫（И. Щеглов）：《西伯利亚史重要资料年表索引》（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еречень важнейших данных по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伊尔库茨克，1883 年版；普·斯洛夫佐夫（П. А. Словцов）：《西伯利亚历史概说》（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Сибири），圣彼得堡，1886 年版；安德利耶维奇（В. К. Андриевнч）：《西伯利亚史》（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圣彼得堡，1889 年版；库罗帕特金：《俄中问题》（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圣彼得堡，1913 年版；卡塔纳耶夫（Г. Е. Катанаев）：《17—18 世纪的吉尔吉斯草原、中亚及中国北部》（Киргизские степи，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в ⅩⅦ и ⅩⅧ столетиях），载《俄国地理学会学报的西西伯利亚部丛刊》（Записки Зап.-сиб. отдела ИРГО），鄂木斯克，1893 年，第 14 册，第 1 期；伊·斯洛夫佐夫（И. Я. Словцов）：《西伯利亚总督们对卡尔梅克邻族的政策》（Кполитике сибирских воевод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оседним калмыкам），载《托博尔斯克省博物馆年鉴》（Ежегодник Тобольского губернского музея），1897 年第 7 期；布钦斯基（П. Н. Будинский）：《西伯利亚移民及其第一批居民的风俗》（Заселение Сибири и Быт первых её насельников），哈尔科夫，1889 年版；奥戈罗德尼科夫（В. И. Огородников）：《19 世纪初以前的西伯利亚史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до начала ⅩⅨ столетия），第Ⅰ部，伊尔库茨克，1920 年版。

〔2〕鲍戈亚夫连斯基（С. К. 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17 世纪前半叶卡尔梅克历史资料》（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алмыков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ⅩⅦ в.），载《历史丛刊》（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1939 年第 5 期。

向，一种故意引人注目的亲俄态度，这对后来整个革命前的俄国文献有相当的影响。

19世纪末，班蒂什·卡缅斯基在出版俄国档案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档案资料是阐述俄国在整个远东的外交史的，特别是俄国与卫拉特和准噶尔汗国的关系史。[1] 多亏这些材料，他才能说明将近200年间俄国同中国、蒙古以及准噶尔汗国的相互关系史，而且能比米勒、费舍尔和其他前辈讲得广泛得多，客观得多。但是他也跟其他人一样，对蒙古内部的历史很少感兴趣。因此，他也就没有对蒙古王公们的生活、风俗习惯、经济、社会关系、对外经济和政治联系等等有关资料加以注意。同时，必须考虑到，班蒂什·卡缅斯基在叙述和解释历史事件时，没有越出俄国档案资料的范围，没有借助于其他史料，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阐明历史材料方面的某种片面性。

著名的蒙古学学者科特维奇进行了大量研究俄国档案材料的工作。在他之前，也可能在他之后，都还没有人像他那样熟悉俄国与卫拉特关系史方面的俄国档案资料的内容。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自己劳动的成果。他的一部专论俄国档案资料问题的著作，主要具有史料学的性质。[2]

论述准噶尔汗国历史的一部重要史料是所谓1640年的蒙古—卫拉特法规，但这部法规的原本没有流传下来。法规是1640年准噶尔代表大会上批准的，参加过这个大会的卡尔梅克领主们，把这部法规的原文带到了伏尔加河。但是保存在卡尔梅克汗牙帐里的原文本，在18世纪初的一次内讧中被毁掉了。后来从伏尔加河保存的副本复制了许多抄本，其中有些已经译成俄文发表。[3] 蒙古—卫拉特法规是一部描写蒙古内部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极其珍贵的古代文献。许多研究者在他们

〔1〕班蒂什·卡缅斯基（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1619到1792年俄中外交文集》（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 г.），喀山，1882年版。

〔2〕科特维奇：《有关17—18世纪对卫拉特人的俄国档案资料》。

〔3〕戈尔曼（М. И. Гольман）：《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规的俄文译本与抄本》（Русские переводы и списки монголо-ойратских законов 1640 г.），载《蒙古文集》，莫斯科，1959年版。

的著作中对这部古代文献进行了专门研究。[1]

但是，所有这些学者在评论1640年代表大会以前，促成批准法规的历史环境方面，都是仿效比丘林的。他们的学术著作远没有揭示出1640年法规之所以制定以及它之所以区别于更古一些的蒙古法学文献的社会经济因素。不过，我们在指出这个重要缺点的同时，也不能不强调上述学者的巨大功勋，他们发表这部古代文献的原文，从而丰富了科学，并为研究这部文献奠定了基础。

在论述蒙古和蒙古人、准噶尔和卫拉特人的俄国历史文献中，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著作占有特殊的地位。[2]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很熟悉关于这些地区的所有俄国和西欧的文献，但是没有使用东方文字的史料，他试图写作一部从远古时代到20世纪初蒙古历史的概括性著作。他对某种历史事实的本质的估价有些地方是颇可玩味的，但整体说来，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蒙古历史著作是一种根据别人的著作精心编纂而成的内容丰富的作品。

专门研究卫拉特人和准噶尔汗国的外国文献并不丰富，值得一提的这类著作的作者大概不超过10个人。按时间算，最早的一个是耶苏

---

〔1〕列昂托维奇（Ф. И. Леонтович）：《古代蒙古—卡尔梅克或卫拉特刑法条例》（察津·必扯克）（Древний монголо-калмыцкий или ойратский устав взысканий/Цааджин-Бичик/），敖德萨，1879年版；戈尔斯童斯基（К. Ф. Голстунский）：《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规》附《噶尔丹洪台吉的补充敕令和卡尔梅克汗顿杜克达什时代为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族编订的法律》（Монголо-ойратские законы 1640 г.，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указы Голданхунтайдж и изаконы，составленные для волжских калмыков при калмыцком хане Лондук-даши），圣彼得堡，1880年版；古尔梁德（И. Я. Гурлянд）：《从远古时期至17世纪的草原法律》（Степн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по 17-ое столетие），喀山，1904年版；梁赞诺夫斯基（В. А. Рязановский）：《蒙古法律，主要是习惯法》（Монгольское право，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обычное），哈尔滨，1931年版。

〔2〕格鲁姆·格尔日麦洛（Г. Е. Грум-Гржимайло）：《中国西部游记》（Описан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в Западный Китай），第2卷，圣彼得堡，1896年版；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安多和青海地区的民族志资料》（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Этнологии Амдо и области Куку-Нора），载《俄国地理学会学报》（ИРГО），圣彼得堡，第39卷，1903年第5期；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与乌梁海边区》（Запад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и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край），第2卷，圣彼得堡，1926年版；第3卷，圣彼得堡，1930年版。

会士张诚[1]，他在玄烨皇帝[2]宫廷中任职多年，并不止一次地完成皇帝委托他考察与记述蒙古的任务。张诚写过一部有关蒙古人和卫拉特人的著作，且部分已经被译成俄文。[3] 目前，这部书只能作为一个目睹者的纪实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位目睹者记录了当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某些重要细节。

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欧洲东方学者，大多数对卫拉特历史本身不感兴趣。他们中那些专门著书研究远东各民族的人，比较起来宁肯写中国，而且只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涉及蒙古人的问题，也就略微地、顺便地提一提卫拉特。霍沃思、库兰、加恩、巴德利、哈斯卢德和海尼施等人的著作是例外。霍沃思写了一本内容广博的蒙古历史著作[4]，就其 21
性质来说，接近于上面提到过的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历史著作。霍沃思论蒙古人的著作不是以他研究过的原始史料为基础，而是以其前辈的历史著作为基础的，他对这些史籍略加分析，就一些争论问题的实质说出自己的意见和初步看法。

库兰的著作专讲17—18世纪的中亚，而又以讲准噶尔汗国为主。[5] 按作者自己的话说，这部著作是以中国大臣王先谦根据别人的著作编纂的巨著《东华录》的部分内容为基础的。库兰也很了解俄、德、法各国作者论述中国和蒙古历史的著作。库兰把中、俄文献中的资料加以对比，他发现，中国史料只把卫拉特人描写成土匪，把他们的汗

---

〔1〕张诚（P. Jean-Francois Gerbillon，音译为"热尔皮昂"），1654年出生于法国凡尔登市，1670年入南锡地区耶稣会香槟省修道士传习所，1688年受法王路易十四派遣与一批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被康熙皇帝留在宫廷任职。自1688年到1698年，曾8次去东北、蒙古诸地，每次都有日记。1689年，他同葡萄牙人徐日升神甫（1673年来华，任康熙的音乐教师，后任钦天监监正）一起参加中俄尼布楚边界谈判，担任译员。1707年死于北京。——译者

〔2〕玄烨皇帝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译者

〔3〕张诚（热尔皮昂，Гербилон）：《鞑靼帝国》（О Великой Татарии），载《选自圣彼得堡各年日历的作品集》（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ыбранных из месяцесловов на разные годы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第1部，圣彼得堡，1785年版。

〔4〕霍沃思（H. Howorth）：《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第1－3卷，伦敦，1876—1888年版。

〔5〕库兰（M. Courant）：《17—18世纪的中亚》（L'Asie Centrale aux XVII et XVIII siécles）——卡尔梅克帝国或满洲帝国（Kalmouk ou Empire Mantchou），里昂—巴黎，1912年版。

国描写成土匪组织，而在俄国作者的记述里，准噶尔汗国却是一个贸易发达、行政制度条理井然的国家。整个说来，库兰的著作没有越出记录和描写政治和军事事件的范围，作者没有试图分析这些事件，对人民的生活也不感兴趣。著作的主题思想就是两种力量——满洲人和卡尔梅克人（卫拉特人）之间的冲突，双方都力求在击溃对方之后，建立自己的帝国。

加恩[1]的著作主要讲17世纪末到1725年间的俄中关系。作者本身对准噶尔汗国及其历史并不感兴趣，而是出于要估价这个汗国在俄国和清帝国的相互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俄国·蒙古·中国》这一原著的作者巴德利[2]，把苏联档案库中的俄国档案资料作为他的著作的基础。其研究包括1602到1676年这个时期。作者在这本书一开头的导言中，试图详细考察17世纪初以前蒙古的历史演变情况。这篇导言并没有独立的学术意义，它依据的是从俄国和英国文献中汲取来的资料。至于资料本身，一般说来，作者翻译得还不错，而且是很认真的。[3]

1935年在伦敦出版了斯文·赫定中亚考察团参加者之一——哈斯卢德所写的一本书：《蒙古的人和神》[4]。1923年，作者曾住在人民蒙古，以后成了中亚考察团的一员，在新疆土尔扈特人中生活了好几年。哈斯卢德对土尔扈特的行政制度的原则阐述得相当详尽，并且援引了有关其社会关系方面的若干资料。他提到过一本手抄的古书，这本书是当地喇嘛学者读给他听，并给他详细讲解的。书中叙述了土尔扈特人的起源和历史，土尔扈特的编者们是在几百年的过程中逐渐写出这本书的。哈斯卢德说，他从这个手抄本中吸取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

〔1〕加恩（G. Cahon）：《1689—1730年中俄关系史》（Histoire de la Relation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a sous Pierre le Grand/1689—1730/），巴黎，1911年版。

〔2〕巴德利（J. Baddeley）：《俄国·蒙古·中国》（Russia, Mongolia and China），第1－2卷，伦敦，1919年版。

〔3〕参看柯津对巴德利的载于《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东方学会学报》（第1卷，列宁格勒，1925年版）中的一本书的评论。

〔4〕哈斯卢德（H. Haslund）：《蒙古的人和神》（Men and Gods in Mongolia），伦敦，1935年版。

他说:“这是一部用蒙文写的,而且论其来历纯粹是蒙古的古代文件汇编,这些文件是土尔扈特汗和土尔扈特族的始祖们过去几百年往事的清晰而离奇的历史。”[1]关于这部历史,除了哈斯卢德的记载外,我们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见过任何提到它的话。

哈斯卢德的书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使人们有可能详细考查某些全蒙古的和卫拉特本身的社会制度的演变情况。这些制度的发祥地是准噶尔,17 世纪初土尔扈特人和杜尔伯特人把它们带到了伏尔加河并在 23
1775 年至 1800 年又重新带回到裕勒都斯山谷一带,20 世纪 30 年代哈斯卢德就是在那里考察这些制度的。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下面将会谈到。

这里我们不准备再谈外国作家的其他著作,因为它们都只讲到卫拉特历史上的个别时期或个别事件。当我们后面研究到这些时期和这些事件时再回过来讲述。

研究准噶尔汗国历史的藏文史料,意义极为重大。

西藏于 16 世纪末、17 到 18 世纪在蒙古和准噶尔的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要研究和正确理解这段历史,不借助说明西藏内部情况及其与卫拉特执政者相互关系的材料,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些问题,在罗克希尔[2]、贝尔[3]、佩特奇[4]等人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谈到过。天主教传教士德西代里[5]也记述过有关西藏和 18 世纪初一些事件的珍贵资料。

作者们用来作为上述学术著作基础的许多事实,十分清楚地揭示了 17 到 18 世纪西藏各封建集团之间尖锐的争权斗争,这些集团打着两个主要喇嘛教派——红教和黄教的旗号。这些事实说明在两藏进行

---

〔1〕哈斯卢德:《蒙古的人和神》,伦敦,1935 年版,第 20 页。

〔2〕罗克希尔(W. Rockhill):《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中国满洲皇帝的关系》(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n Emperors of China),莱登,1910 年版。

〔3〕贝尔(Ch. Bell):《西藏今昔》(Tibet, Past and Present),牛津,1925 年版。

〔4〕佩特奇(L. Petech):《18 世纪初期的中国和西藏》(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莱登,1950 年版。

〔5〕德西代里(I. Desideri):《西藏概况——伊卜利托·德西代里的皮斯托伊阿游记》(An Account of Tibet. 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 of Pistoia)。1721—1727,伦敦,1937 年版。

斗争的势力的利益与蒙古封建主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这最后导致了黄教在西藏和蒙古的胜利),也说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准噶尔汗国意图利用宗教的影响和西藏的资源来反对清帝国。上述著作的价值,
24 也和某些俄国作者论西藏的著作一样,[1]取决于其中所收集的具体实际材料,这些材料才能使当时在中亚形成的历史环境恢复原貌。

苏维埃的有关蒙古、卫拉特和准噶尔汗国的历史文献,坚决摆脱过去的唯心主义观念,纠正对史料的不加批判的态度,以及其他一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学所固有的缺陷。苏维埃历史文献与革命前的不同,它根据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和对史料的精心研究,主要是注意揭示一些决定性的深远过程,这些过程决定着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演变,决定着人民群众的生活及其阶级斗争,决定着统治阶级的内外政策,决定着与毗邻国家和民族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的相互关系。

因此,应该首先注意到蒙古人以及一切游牧民族的社会制度问题,这个问题只有苏维埃历史科学才充分地提了出来,并且加以解决。1930年,由于对一个吉尔吉斯游牧村进行了专门考察,首次查明了这个游牧民族在革命前存在有封建的社会关系。[2]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史料研究的第一次正面突破,过去说游牧民族永远是野蛮的,永远是氏族制度的理论独霸着史料研究。1933年,贝科夫斯基等人发表了研究游牧民族的封建制度起源问题的专题讨论材料。[3] 次年,弗拉基米尔佐夫院的著作《蒙古的社会制度》一书问世,这本书很快被公认为是一个以蒙古的史实材料为基础的分析深刻的成果。弗拉基米尔佐
25 夫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和语文资料,雄辩地证明,革命前蒙古历史过程的社会经济内容就是封建制度的发展。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成为了史

---

〔1〕例如,参看:伊拉里昂(Иларион):《中国与西藏关系史概略》(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сношений Китая с Тибетом),载《俄罗斯在北京的传教士团著作集》(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第2卷,圣彼得堡,1855年版。

〔2〕波戈列里斯基、巴特拉科夫(П. Погорельский И В. Батраков):《吉尔吉斯斯坦游牧村的经济》(Экономика кочевого аула Киргизстана),莫斯科,1930年版。

〔3〕贝科夫斯基(С. Н. Быковский)等:《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基本问题》(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енезиса и развития феодаль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莫斯科,1934年版。

学研究突出的典范，它当之无愧地获得了世界声誉，并且现在正在被各国进步学者有效地使用着。

不过，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弗拉基米尔佐夫的学术著作没有缺点和错误，但是缺点是个别的，它们丝毫不能动摇作者的基本论点。弗拉基米尔佐夫证明，蒙古人在封建制度时代的历史发展在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是受封建社会历史总规律支配的。

弗拉基米尔佐夫没有专门研究卫拉特的历史，尽管对其个别问题曾发表过许多极重要的意见。这些我们在后面再谈。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及其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导致了卡尔梅克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复兴，对于研究卡尔梅克历史的兴致活跃起来了。1926—1929 年，帕里莫夫的著作《17、18 世纪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历史初探》在阿斯特拉罕发表。这本书中对卡尔梅克和卫拉特历史的共同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对于卡尔梅克人从准噶尔迁移的时间和原因，以及卡尔梅克和卫拉特汗的相互关系等等问题的研究，占有颇大篇幅。帕里莫夫并不是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找到了正确的答案，这应该说是因为他手头掌握的史料很不充分的缘故。

1939 年，在《历史札记》上出现了一篇鲍戈亚夫连斯基的著作——《17 世纪前半叶卡尔梅克历史资料》。作者在对卫拉特历史的某些具体资料进行确切说明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系列总结性的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大多没有用事实和可靠的证据来加以论证。

战后年代，蒙古学在苏联还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些年代里，苏维埃学者和蒙古学者的协作加强了，这点尤其体现在 1954 年出版的一部由他们共同编写的著作——《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上，其中也有相应的篇章谈到卫拉特的历史。苏联出版的国外东方各国中世纪史和近代史教科书中，也有一些篇章专门谈到卫拉特人和准噶尔汗国。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国外，都还没有一部完全的准噶尔汗国史。在东方学这门学科中，对 15 至 18 世纪卫拉特历史的基本问题的看法仍是议论纷纭，分歧很大。这说明：编纂一部有重大价值的、真正科学的蒙古民族史，在一定程度上还

是将来的事情。这项任务的完成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如：搜集蒙、汉、俄、藏等文字的新史料，以及中亚各民族文字的新史料；批判地研究新旧史料：对蒙古历史上个别时期和个别问题进行专题学术研究等等。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充分研究蒙古的历史。这种研究也才能避免唯心主义的歪曲，避免主观主义和公式化。现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历史学者队伍，他们已经认真着手研究自己祖国的过去，并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点使我们深信，有效完成这项重大任务已经为期不远了。

说到本书，其作者所抱目标很有限，即叙述准噶尔汗国存在时期的历史。作者认为，依据上面提到的蒙古和卡尔梅克史料，以及俄国档案资料，可以编纂出一部内容广博、翔实可靠、基本上可以解决这项任务的史料学基础资料。同时作者清楚地认识到，将来学术界采用新的蒙文、汉文、藏文和突厥文史料时，他的著作将需要进行颇大的，甚至可能是很大的补充、扩展和确切说明，只有当这类史料在学术上得到通用
27 时，才可能有效地完成揭开蒙古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的工作。虽然如此，作者仍然认为，今后无论对他所叙述的卫拉特及其汗国的历史做怎样的补充和确切说明，都只能是进一步说明和补充这部历史，而不会推翻本书作者所提出的基本的论点、估价和评述。这种设想的根据是苏联档案馆丰富可靠的文件资料，以及这里使用的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蒙古、卡尔梅克和中国的编年史和史籍。

我们已经谈到过萨囊彻辰的蒙古编年史、《黄金史》、《宝贝念珠》、《黄册》、《咱雅班第达传记》、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著的两本《故事》，依我们看来，这些史料在本书中是被充分利用了的。

从中国的史料文献中，我们首先必须引证至今仍是手稿的《中国皇帝康熙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与厄鲁特民族史》[1]，它已经被罗索兴由满文译成俄文，显微胶卷保存在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关于这部历史，我们后面再详细叙述，同时还必须引证一部已经提

[1]指温达等撰：满文本《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当时应为康熙时的刻本手稿。——译者

到过的历史著作《蒙古游牧记》。

由于希望查清准噶尔汗国形成的历史前提，作者认为，对15—16世纪卫拉特历史上重要而同时又有争论的问题进行一番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作者依据的是：蒙古史料《黄金史》、《黄册》和《蒙古源流》的原文，勃列特史奈德、波科季洛夫、乌斯宾斯基等人复述中的《明史》以及巴托尔德、瓦利汉诺夫和伊勃拉吉莫夫等人的复述和译文中的突厥文史料。

考虑到这些史料彼此间经常有矛盾，作者试图根据所有史料或大部分史料中内容相符的资料，来编一种历史大事记。在作者看来，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研究历史事件时的片面性，并接近真实。作者采用这一方法，并不打算过高估价它的作用。他很清楚，当一种较早期的史料被以后史籍的作者利用时（像利用《黄金史》、《黄册》和《蒙古源流》所出现的情况那样），早期史料的错误和不确切的东西往往可能在后来的史籍中重现。但目前在现有史料局限的条件下，这个方法在我们看来毕竟还是最合适的。

现在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项研究题目本身有多迫切？准噶尔汗国史的问题和苏维埃历史科学当前的任务之间的联系怎样？苏维埃历史科学是否关注对卫拉特及其汗国历史的研究，以及关注到什么程度？

对所有这些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本项研究题目和苏维埃历史科学当前的研究课题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们的历史科学对充分而全面地揭示卫拉特及准噶尔汗国的历史，也像整个蒙古人的历史一样，十分关注，因为中亚，哈萨克斯坦、南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各民族的历史命运，过去不止一次地同蒙古族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只这一点就可以说明问题了。对蒙古和准噶尔历史过程的发展没有正确的了解，就不可能正确了解上述这些民族的历史。

苏联出版专讲十月革命前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布里亚特、哈卡斯和巴什基里亚等历史的所有著作，都没有忽略，也不能忽略有关蒙古和准噶尔历史的事实和现象，这并不是偶然的。同时不能不指出的是，某些著作中的错误就是由不了解蒙古和准噶尔的

历史造成的。拿1950年出版的供中学九年级使用的苏联历史课本为例，书中在讲述哈萨克的历史时，给学生灌输这样一种思想："1758年，哈萨克人民在著名的勇士中玉兹汗阿布赍领导下，借中国军队的帮助，给了准噶尔人以致命打击，并摆脱了准噶尔的桎梏"[1]。这种说法与
29 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留待以后说明。在第2版《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中提到："准噶尔世袭贵族占有最好的牧场所引起的畜牧经济危机，迫使广大人民群众向新的领土迁移，就引起了准噶尔人与邻邦的冲突"[2]，这种论点也同样是与事实真相毫无共同之处的。

这些错误以及诸如此类的错误的根源在于不了解历史事实。如果本书能够排除重复这类错误现象，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中央亚细亚和中亚各民族的历史，有助于研究游牧民族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演变，那么，作者认为自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作者认为应该向所有提供过批评意见和解答疑难，从而帮助了这项艰巨工作的人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在这方面，首先要感谢麦斯基和康拉德院士，感谢1962年过早逝世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基谢略夫、乌斯丘戈夫教授和桑热耶夫教授，并感谢一级科学研究员迪雷可夫和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的其他专家。作者要特别感谢蒙古同事——锡林迪普院士和纳佐克朵尔士院士，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伊然姆兹和图德夫，他们熟悉手稿原著，并提供过许多宝贵的意见。

〔1〕《苏联历史》(История СССР)，第2部，莫斯科，1950年版，第55页。

〔2〕《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第1卷，阿拉木图，1949年版，第147－148页。

目录

修订版出版说明 / 1
修订版译者导读 / 3
中译本序言 / 13
导言 / 23

1 15—16世纪前半叶的西蒙古 / 1
1.1 从元朝被推翻到也先汗国的覆灭 / 1
1.2 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前半叶西蒙古的内外形势 / 22
1.3 15—16世纪卫拉特社会制度的若干问题 / 35
2 准噶尔汗国形成的历史前提 / 54
2.1 16世纪后半叶的西蒙古 / 59
2.2 准噶尔汗国的形成 / 74
2.3 喇嘛教在卫拉特人中的传播 / 105
3 17世纪前半叶末期、后半叶初期的准噶尔汗国 / 114
3.1 巴图尔浑台吉的内外政策 / 117

3.2 17世纪50—60年代的
准噶尔汗国 / 151
4 1688年的喀尔喀—卫拉特战争、准噶尔汗国与
清帝国的战争(1690—1697年) / 174
4.1 噶尔丹执政初期的内外政策
(1688年的战争) / 180
4.2 1690—1697年的战争及其结局 / 205
5 全盛时期的准噶尔汗国(18世纪前半叶) / 237
5.1 内外政策 / 240
5.2 准噶尔汗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 294
6 准噶尔汗国的覆灭 / 324
结束语 / 356
第一版附记 / 360

缩写词表 / 361
人名索引 / 362
地名译名对照表 / 390

1　15—16 世纪前半叶的西蒙古

30

1.1　从元朝被推翻到也先汗国的覆灭

卫拉特的历史有着许多尚未为科学揭开之谜。如:“卫拉特”一词的词源和含义;这个术语和史料中常常遇到的概念“杜尔本·卫拉特”之间的联系;后者是否意味着“四卫拉特联盟”?如果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联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什么原因引起的?它的组成情况和目的怎样?东蒙古人和卫拉特人长期内讧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释15 世纪中期开始的卫拉特人军事和政治活跃的衰落,以及 16 世纪后半叶重新活跃等问题。

上面列举的这些问题,在历史文献中已讨论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了,但至今还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大部分俄国和外国的蒙古学学者都赞同 19 世纪初列缪兹和施米特说过的意见:“卫拉特”一词在其词根中含有蒙古语“卫拉”——“亲近”的意思,因此应该把它理解为“亲近的人”、“同盟者”。当它跟另一个含义为“四”的蒙古词——“杜尔本”连接时,就形成了“杜尔本·卫拉特”这个说法,也就是“四卫拉特联盟”。

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任务在于弄清“四卫拉特联盟”形成的时间和原因,确定其参加者的组成情况,并详细考察其历史。

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同意这个观点的。首先反对这个观点的是多尔日·班扎罗夫。他断言“卫拉特”这个词“绝不是来自‘卫拉’,而是由‘卫·阿拉特’组成的,这跟拉施德的‘оинирген’,即‘森林中百姓’相

符"[1]。

31 库库淖尔[2]历史的研究者乌斯宾斯基则走得更远。他确信"杜尔本"这个词在"杜尔本·卫拉特"这个说法中不表示"四",而是拉施特多次提到过的一个部落的名字[3]。乌斯宾斯基的观点得到了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积极支持,格鲁姆把卫拉特和杜尔本都看做是在13世纪的历史事件中起过显著作用的特殊蒙古部落。[4] 拉姆斯杰特也认为,"卫拉特"这个词可能根本就没有实际的含义,据此,他拒绝翻译这个词。[5]

关于"卫拉特"这个词的起源和意义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从我们这方面只能说,"卫拉特"表示"联盟",而"杜尔本·卫拉特"表示"四卫拉特联盟"的这个论点,在实际的历史事实中还没有找到证明,这点我们后面再说明。

这一论点的支持者多数认为,元朝被推翻和蒙古征服者被驱逐出中国之后,即14世纪末,紧接着形成了卫拉特联盟。比丘林坚持这一观点。按他的意见,14世纪末,在准噶尔游牧的有卫拉特三大部——绰罗斯、和硕特和土尔扈特。[6] 他们这3个部组成了联盟,并让绰罗斯部的代表马哈木当首领。[7] 后来当杜尔伯特从绰罗斯部分离出来

---

〔1〕班扎罗夫(Д. Банзаров):《关于卫拉特人和维吾尔人》(Об ойратах и уйгурах),第1卷,喀山,1849年版,第26页。

〔2〕库库淖尔(Кукунор)即青海。——译者

〔3〕乌斯宾斯基(В. Успенский):《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附《卫拉特及蒙古简史》(Страна Кукэ-нор или Цзи-хай с прибавлением краткой истории ойратов и монголов),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第6卷,1880年,第140-141页。

〔4〕"卫拉特"这个部落的名字在成吉思汗时代渐渐为人所知,也就在那时形成了杜尔本和卫拉特的联盟,后来这个联盟就给蒙古和中国史学家们写"四卫拉特(杜尔本·卫拉特)"提供了理由。见: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第561页。

〔5〕拉姆斯杰特(Г. И. Рамстедт):《"卫拉特"一名的词源》(Этимология имени ойрат),载《波塔宁七十寿辰纪念文集》,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549-550页。

〔6〕比丘林把蒙古人的"部"(Поколение)同"族"(род)严格区分开来:"游牧民族的'部'是指领主家族(дом)和领地而言,这个家族依赖民族的最高首领——汗来统治领地。领主的旁系亲属以及作为其赡养费而分出来的那部分领地叫'族'。这样,蒙古民族分为'部','部'又分为'族'。"见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2页。

〔7〕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4页。

之后，卫拉特联盟就成了4个部的联盟，其成员已经不是3个而是4个部了。正是从这时候起，即从15世纪中期起，联盟开始自称为“杜尔本·卫拉特”。[1] 32

巴托尔德也认为，卫拉特联盟形成于14世纪末，但是，和比丘林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个联盟从一开始就不是3个参加者而是4个——绰罗斯、和硕特、土尔扈特以及辉特。[2] 梁赞诺夫斯基同意巴托尔德的意见，可是又和巴托尔德以及比丘林有所区别：他把卫拉特联盟不看做是“部”的联合，而看做是绰罗斯、和硕特、土尔扈特以及其他“部落”的联盟。[3] 在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中生活多年，并研究过其历史的科斯坚科夫也认为，卫拉特联盟形成于14世纪末，但对其组成情况和参加者设想的又不一样。他认为，最初进入联盟的是绰罗斯，辉特以及和硕特3个部落，后来土尔扈特加入，因此就形成了“四卫拉特联盟”——“杜尔本·卫拉特”。[4] 柯津院士跟所有上面提到的学者们不同，他认为可能是，卫拉特联盟在成吉思汗时期已经作为“四个联合汗国”而存在了，因此联盟也正是以这个形式参加成吉思汗帝国的。[5] 英国蒙古学学者霍沃思也认为，“杜尔本·卫拉特”是中世纪时代产生的“四个同盟者”的联合，即联盟，认为“杜尔本·卫拉特”这个词就跟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俄国人所知道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是“同盟者”这个词一样。[6]

可见，我们提到的这些学者在理解“杜尔本·卫拉特”的词义方面没有分歧，他们全都认为这个词表示实际存在过的“四卫拉特联盟”。但是，他们在确定联盟的组成方面，以及在有关其参加者的社会经济性质问题上分歧颇大。按有些人的意见，绰罗斯、和硕特、土尔扈特是封 33

〔1〕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2页；雅金夫：《蒙古志》（Заииски о Монголии），圣彼得堡，1828年版，第129页。

〔2〕巴托尔德：《谢米列契史略》，第72页。

〔3〕里亚赞诺夫斯基：《蒙古法律，主要是习惯法》，哈尔滨，1931年版，第33页。

〔4〕科斯坚科夫（К. Костенков）：《游牧于阿斯特拉罕省的卡尔梅克人历史统计资料》（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статистигеские свебения о калмыках，кочующих в Астраханркой щбернии.），圣彼得堡，1817年版，第2页。

〔5〕柯津：《江格尔传》（Джангариаба），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3页。

〔6〕霍沃思：《蒙古史》，第1卷，第558页。

建的领地，而另一些人则把它们看做是各种蒙古部落的名称。

班扎罗夫、乌斯宾斯基、勃列特史奈德、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对卫拉特早期的历史则另有看法。按班扎罗夫的意见，“杜尔本·卫拉特”这个名称出现在成吉思汗时期。当时，所有蒙古居民被分成许多“万户”（土绵），而且卫拉特人组成了4个这样的“万户”。根据这一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班扎罗夫认为，“杜尔本·卫拉特”这个名称所指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4个卫拉特“万户”。他写道：“因此蒙古人还用‘杜尔本’、‘杜尔本·土绵’和‘杜尔本·土锦·卫拉特’……来代替‘杜尔本·卫拉特’。这就是四卫拉特的起源，而不是目前形式上拼凑成的4个部的联盟。”[1]

乌斯宾斯基在熟悉了一系列中国的史料和史籍之后，确定这些文献中有不少矛盾和分歧之处。根据有些资料的说法，卫拉特人在明朝统治初期分成4个“族”或是4个“部”——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他们各有独立的汗。除了上述4个族之外，还存在一个不大的属于杜尔伯特的辉特族。[2] 在17世纪，当土尔扈特迁往俄国时，它的地盘就被辉特所占，辉特就成了“四卫拉特”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样，根据这些中国史料提供的资料，从14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组成卫拉特联盟的是：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从17世纪初期到准噶尔汗国存在末期则是：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和辉特。[3] 而从18世纪末，当土尔扈特从伏尔加河返回新疆（在原准噶尔汗国领土上形成的一个省）时，卫拉特则已成了6个部——和硕特、辉特、绰罗斯、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厄鲁特的联盟。[4]

---

〔1〕班扎罗夫：《关于卫拉特人和维吾尔人》，第25页。

〔2〕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27－128页。

〔3〕这种认为土尔扈特迁往伏尔加河流域后，其地位由辉特取代的说法，似无根据。其实土尔扈特迁往伏尔加河后，它与其他各部尤其是与准噶尔部的联系并未中断，这在俄蒙关系档案中也有其活动的史实记载，而辉特作为四部之一的活动或代表人物，我们未见有关记载，此说不可信。——译者

〔4〕此看法出自《蒙古游牧记》卷11注，但本书作者对原观点表述很不完整。原注说乾隆平定准噶尔后对卫拉特的称呼有6种，并非认为卫拉特分成了6部分。原注者还明确指出：“其名则有六种……核其实，不过三……要其种，则自明及今止一，曰额鲁特蒙古而已。”——译者

根据另外一些中国作者的资料，卫拉特只是在明朝统治初期才定居在准噶尔汗国的领土上，而他们的某一部分则居住在长城以北的归化城和鄂尔多斯两地区之间。

乌斯宾斯基很有理由地指出了上述史料和著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矛盾。他们把“杜尔本·卫拉特”这个概念解释成4个卫拉特“部”或“族”的联合，与此同时，一会儿说有3个这样的族或部，一会儿又说有6个。并且，他们把“准噶尔”这个词当做卫拉特的一个部的名称，这是与事实相矛盾的。“准噶尔”从来就不是一个族名，它一向都表示“左方”、“左则”。当时也有人用它标志成吉思汗部队的左翼，后来每块蒙古领地都有自己的“准噶尔”，即自己的“左侧”。 34

勃列特史奈德也像乌斯宾斯基一样，原则上不接受大约在14世纪末形成了“四卫拉特联盟”的想法。他的一些论断主要来源于《明史》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在蒙古征服者被驱逐出中国之后，准噶尔地区的卫拉特人是一个统一的民族，[1]由元朝的一个统帅猛可帖木儿管理。只是在猛可帖木儿死后，卫拉特才分成3个部落。一个部落的首领是马哈木，另一个部落的首领是太平，第三个部落的首领是把秃孛罗。他们3人都作为自己领地的独立执政者而与明朝保持着关系。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将各种文献和史料中有关卫拉特联盟的成员及其形成时间方面的资料进行了一番对比，着重指出，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众说不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按照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本人的意见，卫拉特与杜尔本的联盟还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形成了。他把杜尔本和杜尔伯特看做同一个东西，并且根据这点肯定，在卫拉特联盟中树立了杜尔伯特的盟主权[2]，说卫拉特联盟延续到16世纪中期，当时从杜尔本（杜尔伯特）家族中分出了保留准噶尔这个名称的左侧部分。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认为，和硕特、土尔扈特、辉特归并于杜尔本·卫拉特联盟的时间尚未查明，但是他推测，这可能要晚得多，可能是在反对

〔1〕勃列特史奈德：《东亚史料中的中古史研究》，第2卷，第161页。

〔2〕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第566页。

东蒙古人的斗争尖锐的时期，当时，联盟的首领由杜尔本·卫拉特系的
35 王公担任。按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意见，辉特和绰罗斯与杜尔本（格尔伯特）具有同一族系，分离以后他们才形成了独立的部。

帕拉斯在这些问题上持有独特的意见。他肯定蒙古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曾经分成两个主系——蒙古族本身和杜尔本·卫拉特，而后者“……又分化成四个部，通称为厄鲁特、辉特、帖木儿和巴加比拉特。上述厄鲁特中有一支为亚洲西部和欧洲所熟知的名叫卡尔梅克的后裔……厄鲁特人或叫卡尔梅克人……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至少是从蒙古君主国崩溃的时候起，就逐步分化成通称为和硕特、杜尔伯特、准噶尔和土尔扈特的4个主要后裔，他们从蒙古人中分出之后，就在不同王公的管辖下各自为政”。[1]

可以看出，有关卫拉特联盟的组成及其形成的时间问题始终是模糊不清、端绪紊乱的。

关于卫拉特联盟形成的原因及其宗旨问题，在史学家中引起的分歧较少。所有研究者一般都认为这些原因是企图联合卫拉特的各种力量来反对东蒙古人，以争取统治全蒙古，恢复成吉思汗系的帝国。例如，比丘林肯定，组成开始有3个部、后来是4个部的卫拉特联盟的主要原因，是要同东蒙古人竞争，是因为单个部没有可能取得胜利。结盟并推出了妥懽（1418—1440）和也先（1440—1455[2]），这两个出身于绰罗斯家族的天才执政者之后，卫拉特就战胜了自己的敌人而统率了整个蒙古族。可是，随着也先的死去，卫拉特的威力也随之消亡，就此结束了它历史上虽然短暂，但却辉煌灿烂的时期。[3]

36 多尔日·班扎罗夫也队为，对东蒙古人的“仇恨”是卫拉特结合成联盟的主要刺激因素。[4]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拉姆斯杰特。他写道，从

---

〔1〕帕拉斯（П. С. Паллас）：《蒙古族历史资料汇编》（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звестий о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народах，сочиненное господином П. С. Палласом），圣彼得堡，1776年版，第68－70页。

〔2〕按另一些材料为1456。

〔3〕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16－21页。

〔4〕班扎罗夫：《关于卫拉特人和维吾尔人》，第23页。

蒙古政权削弱时起，特别是在元朝被推翻之后，“卫拉特这个名字变得越来越出名了。卫拉特或叫杜尔本·卫拉特（四卫拉特），作为东蒙古人的敌人出现，一心向往摆脱‘四十个’蒙古人而获得独立自主”[1]。

柯津断言，卫拉特作为成吉思汗系建立的联盟中的一员，认为自己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帝国的关系不过是一般的臣属关系。因此，当成吉思汗的后代被赶出中国之后，卫拉特就不再承认东蒙古执政者的盟主权。他们组织的不仅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而且还追求在蒙古部落及蒙古民族中建立盟主权。[2]

我们已经说过，乌斯宾斯基和勃列特史奈德原则上不接受有关卫拉特联盟的想法，因而也不考虑它形成的原因问题。

至于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由于按他的意见，杜尔本和卫拉特的联盟早在成吉思汗在世时就存在了，所以他企图弄清楚的不是14世纪末这一联盟形成的原因，而是由于蒙古征服者被赶出中国，在蒙古形成的变化多端的形势给联盟带来了什么新的内容。按照他的意见，这一形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东、西蒙古人之间斗争的加剧，这使卫拉特联盟生机勃勃，吸引了新的成员加入联盟的行列，并且巩固了使他们结合起来的关系。[3]

可见，所有研究者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东、西蒙古人之间斗争的激烈加剧，是这一地区历史上一件意义重大、后果严重的事实。可是，这场斗争的原因是什么？进行这场斗争是为了什么？这是历史科学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关于这点谈了些什么呢？

从帕拉斯开始，到波兹德涅耶夫为止，他们全都试图用游牧社会“天赋”的特性来解释东、西蒙古人之间的斗争，似乎由于游牧民族的这种特性，没有掠夺战争，不入侵邻邦的土地，游牧民族便不能生存，这种解释是徒然的。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多半认为，卫拉特人反对其东蒙

〔1〕拉姆斯杰特：《卫拉特一名的词源》，第548页。

〔2〕柯津：《江格尔传》，第5页。

〔3〕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第569页。

古同胞，仅仅是企图建立起卫拉特对全蒙古的统治，而最终的目的是准备对中国发动新的总进攻，并在卫拉特控制下恢复成吉思汗系帝国。[1]

乌斯宾斯基对这一斗争的解释略有不同。他认为，这场斗争的基础是代表旧草原贵族利益的卫拉特人和汉化的东蒙古人之 间的矛盾，前者忠于先辈的传统，后者则抛弃了这些传统。[2]

必须指出，在苏维埃历史文献中，偶尔也出现一些著作，它们继承着，而有时还是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学派的传统。这些著作的作者同他们的老前辈一样，不是在具体历史环境的特点中，也不是在东蒙古和卫拉特统治阶级的政策中去寻找蒙古与卫拉特斗争的原因，却是在游牧民族的心理和天赋的特性中寻找这些原因。鲍戈亚夫连斯基的一本专讲17世纪卡尔梅克历史的著作[3]，以及柯津的关于卡尔梅克史诗传说的著作——《江格尔传》[4]，就是例子。

在研究蒙古族的历史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于蒙古与卫拉特斗争原因的解释独具一格。按他的见解，15世纪和16世纪前半叶蒙古历史上的基本动力是两个蒙古贵族阶层的斗争：以称作“台吉”的成吉思汗嫡系后裔为一方，以官宦贵族、万户、千户、百户和其他大臣，以及草原贵族出身的人为另一方。在这场斗争中，东蒙古封建主是作为成吉思汗嫡系的代表人物——“台吉”出现的，而卫拉特

---

〔1〕帕拉斯：《蒙古族历史资料汇编》，第73页；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32、63页；科瓦列夫斯基（О. Ковалевский）：《中国在17世纪将近半个世纪的变革》（Пересорот в Кигае около половины XVII В.），载《国民教育部杂志》第25部，1840年，第134页；科斯坚科夫：《游牧于阿斯特拉罕省的卡尔梅克人历史统计资料》，第36－37页；波兹德涅耶夫：《本世纪初以前的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及其与俄国的关系》，载《国民教育部杂志》第244部，1886年，第142页；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原文附有译文及说明，说明中列入了1636到1736年的喀尔喀历史资料），圣彼得堡，1833年版，第103页；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20页及结论；拉德洛夫：《关于维吾尔人问题》（К вопросу об уйгурах），载《皇家科学院丛刊》，圣彼得堡，第72卷，1893年，第1册，第73－76页；维谢洛夫斯基：《蒙古史讲义》（Лекции по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ов），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76、97页。

〔2〕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46－147页。

〔3〕鲍戈亚夫连斯基：《卡尔梅克人历史资料》，第87页。

〔4〕柯津：《江格尔传》，第54－55页。

封建主则代表了称作萨伊特的官宦贵族的利益。[1] 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个解释也并不是理由充足、详尽无遗的,尽管比弗拉基米尔佐夫前辈的唯心主义学说体系前进了一大步。

意见分歧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分歧涉及卫拉特早期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我们又如何能查明真相呢?让我们看看史料吧。

《黄金史》——我们搜集到的第一部后元[2]时期的编年史说到,有一天,额勒伯克汗(1392—1399 在位)的心腹——卫拉特大臣浩海达裕陪同汗去打猎。他叫汗注意哈尔克楚克都古楞洪台吉的妻子、汗的儿媳妇鄂勒哲依图鸿郭斡。她"肤色白如雪,面颊红晕"[3],汗沉迷于这个儿媳妇的美色,不久竟杀死了亲生儿子,把儿媳妇霸占为妻。浩海达裕期望从额勒伯克汗那里得到相当的报酬、封号和职位。可是过了不久,年轻的王妃出于报仇,害死了他,王妃诬告浩海达裕企图强奸她。 39
勃然大怒的额勒伯克汗杀死了浩海达裕。鄂勒哲依图鸿郭斡很快又向汗承认了其所做之事。额勒伯克汗确信被杀者无罪,并感到后悔,就把浩海达裕的两个儿子巴图拉丞相和格齐哈什哈召来,委派他们当卫拉特 4 个万户的执政者。但是他们两人"在蛇年,即额勒伯克汗统治的第六年杀掉汗,占据卫拉特四个万户,并分离了出去,双方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样一来,蒙古的政权转到了卫拉特方面"[4]。

《黄册》和《蒙古源流》大体上证实了《黄金史》中所叙述的资料。《黄册》省略了某些细节,而《蒙古源流》称浩海达裕是千户[5],说额勒伯克汗答应奖赏浩海达裕帮他搞到美女鄂勒哲依图鸿郭斡的功劳,答

---

〔1〕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 147 - 148 页。

〔2〕后元是指明朝推翻元朝后,蒙古贵族在蒙古地区建立的以元为称号的一个时期的割据政权。——译者

〔3〕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55 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 69 页。应当注意,人名"浩海达裕"在我们的史料中写法各不相同:在《黄金史》中写成 Xudxai tafu,在《黄册》中为 Xudxai tayiu,而在《蒙古源流》中写成 Xudxai tayixu。

〔4〕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57 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 70 - 71 页。

〔5〕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 120 页。

应赏他宰桑封号，并让他当全卫拉特的执政者。[1]《蒙古源流》在提供这些新资料的同时，在一个问题上纠正了《黄金史》作者的说法，提出鄂勒哲依图鸿郭斡的丈夫哈尔克楚克都古楞洪台吉不是额勒伯克汗的儿子，而是他的弟弟。在另一处，《蒙古源流》根据《黄册》的说法，对《黄金史》的一个记载作了准确的说明，指出额勒伯克汗杀死浩海达裕之后召来的不是后者的两个儿子，而是一个，叫巴图拉，赏给了他丞相的封号，并把自己的女儿萨穆尔公主嫁给了他，并委派他当所有卫拉特万户的执政者。同时，《黄册》直截了当地指出，浩海达裕出身于绰罗斯族。其他方面，这3本蒙古史料的记载都相互吻合。

由于这3部蒙古编年史在这些资料上相互吻合，所以我们可以断定下列一点：在后元时期，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妥懽帖睦儿的曾孙——额勒伯克汗执政年代[2]的史料，才第一次提到卫拉特活动家。在整个这一时期内，也可能更早一些，在元朝掌政时期，卫拉特贵族跟东蒙古贵族，尤其是跟元朝皇帝的后裔，曾经有过多方面的紧密合作，卫拉特封建主跟皇帝后裔的关系是潘臣同君主的关系。卫拉特封建主第一个公开反对东蒙古封建主的行动就是1399年[3]杀死额勒伯克汗。此后，卫拉特就摆脱了全蒙古大汗的统治。在这个时期，正如我们的蒙古史料所一致指出的，除了当时蒙古通行的分成万户、千户等等之外，卫拉特还不知道其他行政划分。他们在民族上和政治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一个联合起来的封建领地的居民，这个封建领地的首领是独裁的执政者，有时是称作“济农”的副王。

40

还有一点可以证实这些结论是有充分根据的：《黄金史》和《黄册》的无名作者无疑是出身于东蒙古贵族，他们不可能有亲卫拉特的观点；《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囊彻辰是个大封建主——鄂尔多斯的领主，更不可能是亲卫拉特者。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对他们的记载深信不疑。

---

〔1〕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20页。

〔2〕即在蒙古征服者被赶出中国以后又过了1/4世纪的时候。

〔3〕卫拉特千户浩海达裕死后6年。

必须指出，就连明朝的官方史书《明史》[1]也证实了上述蒙古史料中的某些重要记载。例如，根据《明史》的资料，元朝将领之一猛可帖木儿还在元朝被推翻以前（或者被推翻以后不久）就宣布自己是卫拉特的执政者，并且一直任职到死。此后，他的领地分成了3部分，每部分各有一个执政者，即由马哈木、太平和把秃孛罗管辖。《明史》记载，这些执政者是谋求与中国和平相处并为此遣使到北京进贡的第一批蒙古王公。

1409年，朱棣帝给卫拉特这三位执政者赏赐了封号。准噶尔的使者一个接一个源源不断地派往中国。只是在卫拉特征服全蒙古之后[2]，这种和平友好关系才中断了，而代之以卫拉特武装入侵中国内地的情况。因此，明朝这部史书证实了蒙古史料的下述记载：即第一任卫拉特执政者是一个曾在元朝皇帝后裔那里供过职的将领。他在世时，卫拉特曾经是一个统一的封建领地，只是在他死后，这个领地才被分割开来，而卫拉特反对东蒙古人的斗争，远不是在元朝被推翻后就立刻开始的。

从东蒙古分出之后，也就是拒绝从属于全蒙古大汗之后，卫拉特人就在蒙古西部扎根定居下来，在那里受自己卫拉特王公们的管理，从15世纪初开始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蒙古史料对这个政策只字未提，但《明史》的资料证明，卫拉特执政者在这些年代力求与明朝建立睦邻关系。这种政策是迫于当时西蒙古的内外形势而采取的。这一形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蒙古与中国传统贸易关系的中断，这是蒙古征服者被驱逐以及明朝跟蒙古诸汗之间多次战争造成的结果。恢复与中国的贸易，是卫拉特执政者们的迫切需要。他们要达到这一目的，或者通过和平方式，或者通过战争。他们认为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比较好。《明史》中有许多地方提到来过明廷的卫拉特外交代表团。毋庸置疑，这

〔1〕原文如此。实际上，《明史》是其后的朝代——清朝修编的，为清代的官方史书，而非明代当代编的。以后遇到这种提法，均应作此理解。——译者

〔2〕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31－35页；勃列特史奈德：《东亚史料中的中古史研究》，第161页。名为猛可帖木儿的这个人究竟指的是哪个卫拉特活动家，无论哪部蒙古史料都还全然不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未列入我们的任务。

些代表团不单是，更可能主要的不是外交代表团，而是商队。我们得提前说说，不仅15世纪初曾经是这样，更晚一些，直到18世纪也还是这样。商队的派遣证明，跟定居的农业邻邦进行有组织的贸易交流，对卫拉特人也像对东蒙古人以及所有不定居的一般游牧民族一样，有着客
42 观的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同时必须指出，对卫拉特王公们来说，在15世纪初，要用战争途径解决这一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在其领地的西部边境，已经展开了反对蒙兀儿斯坦[1]可汗的斗争，而后者从14世纪末起就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伊犁河、博洛尔和昆仑一带加强了防御。这个时期卫拉特封建主的领地分布在一块不太大的疆土上：东起杭爱山脉的西麓，南止戈壁沙漠，西接蒙兀儿斯坦，北到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可见，当时卫拉特的领地被不定居的、从事畜牧业的汗国和公国团团环抱着。这些汗国和公国的一长条广阔地区把卫拉特领地和定居的、从事农业的国家和民族分隔开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确是唯一可能推销卫拉特剩余畜牧产品的市场和供给农业及手工业产品的来源地。《明史》证实，跟中国比较容易达成和平交易还有另一个原因：15世纪初，明朝皇帝鉴于朱元璋死后（1399年）开始的夺位斗争，力求牵制卫拉特，并企图利用卫拉特来反对东蒙古诸汗，后者当时对年轻的明朝来说是主要的威胁。

我们看到，在卫拉特西边，当时通往中亚各定居农业民族的市场之路被蒙兀儿斯坦的领土所截断。[2]

卫拉特封建主反对蒙兀儿斯坦的武装斗争，无疑比反对中国的斗争开始得更早。突厥文史料记载说，早在14世纪末就发生了卫拉特进攻蒙兀儿斯坦的事件，不过那时候他们显然没有取胜，因为当时恰好蒙兀儿斯坦执政者都赫卢克帖木儿汗完全控制了从伊犁河到博洛尔和昆

---

〔1〕蒙兀儿斯坦在中亚东部地区，14世纪由察哈台领地分裂而成。这一名称指称的是保持蒙古传统文化和游牧生活方式而未接受伊斯兰化的那部分蒙古人地区，其名称一直存在到17世纪末。——译者

〔2〕在我们叙述的这段时间里，蒙兀儿斯坦的领土包括整个东土耳其斯坦，以及从额尔齐斯河和额敏河到天山，从巴里坤到巴尔喀什湖和费尔干纳这片领土，卫拉特牧地的西部边界当时甚至还未达到伊犁河岸。

仑的整个领土。不错，1408 年卫拉特占领了别失八里[1]。但是，这还远没有结束蒙兀儿斯坦与卫拉特的斗争，相反，在整个 15 世纪到 16 世 43
纪初这一时期内，斗争一直胜负变化无常地延续着。[2] 卫拉特与蒙兀儿斯坦封建主之间武装冲突的经济基础就是争夺贸易通道，争夺卫拉特通往推销市场和供应品产地的出路。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像双方封建主力求增加他们统治的领土和臣民的数量来扩大封建剥削的范围、力求攫取战利品等等这样一些因素。蒙古的、中国的、突厥文的以及 17 世纪初以来的俄国史料中，有许多资料证明，这些因素在后元时期蒙古封建领地的战争史上，在其内讧中，在其发起的对中、俄边区的进攻等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可是，许多事实仍令人信服地证明，在蒙古封建主的对外政策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争夺通向推销市场和供应品产地的道路，是争取在游牧、畜牧民族及定居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交易。

在歪思汗统治的年代（1418—1429 年），卫拉特和蒙兀儿斯坦之间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武装斗争。1422 年，歪思汗占领了分布在卫拉特牧区迤南的吐鲁番绿洲，并将蒙兀儿斯坦的京都迁往吐鲁番。就在蒙兀儿斯坦人占领吐鲁番的同年，发生了卫拉特人进攻哈密的事件，指出这点很有意思。这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卫拉特和蒙兀儿斯坦封建主之间为控制贸易通道所进行的斗争。[3] 巴托尔德引证《拉失德史》的话，说歪思汗在他统治蒙兀儿斯坦那些年跟卫垃特交战61 次，只打胜过 1 次。1425 年，著名的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伯克从北边 44
侵入蒙兀儿斯坦，冬季他带兵在裕勒都斯一带的山地——直接与卫拉特牧区的南部和西部交界的地方驻扎了几个月[4]。

---

〔1〕别夫八里也称亦力巴力，是 14 世纪 70 年代察哈台后裔在我国新疆西北部建立的一个封建地方割据政权。——译者

〔2〕巴托尔德：《谢米列契史略》，第 72 页及结论。

〔3〕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在记载卫拉特向伊犁河流域推进的初次尝试时，直截了当地写道："什么东西迫使他们这样做我们不清楚。"见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 2 卷，第 626 页。他不理解销售市场和供应品产地跟游牧民族的经济利益是休戚相关的，这个销售市场和供应品产地就是发达的农业国。

〔4〕巴托尔德：《谢米列契史略》，第 73 页及结论。

在上述这段时间里，卫拉特执政者与其近邻——东蒙古王公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可惜，我们所知道的蒙古史料中，能据以详细研究额勒伯克汗被杀后，东、西蒙古各事件的进程以及这一地区两部分执政者之间相互关系发展情况的实际资料是很有限的。

《黄金史》的作者第一次提到卫拉特的情况时，只描述了额勒伯克汗的第5代后裔阿台执政的那些年代。阿台汗从1435年到1449年曾管理这一地区。[1]《黄金史》中说："怀着对卫拉特由来已久的积仇，阿台汗聚积起自己的蒙古人，并开始向卫拉特进军"。[2] 交战前双方各挑一名勇士进行对射。巴图鲁锡古苏特诺颜代表阿台汗兵营，而从卫拉特方面出来的是巴图鲁珪林齐。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史料指出，两位勇士原是交往已久的朋友、结义兄弟。他们两人早在交战之前就商量好，万一卫拉特与东蒙古人作战，就在对射中见面。对射之后进行交战，结果卫拉特战败，浩海达裕之子巴图拉丞相战死，他的妻子和儿子妥懽均被俘虏。在结束有关这场战役的故事时，《黄金史》作了这样一个结语："卫拉特的统治权就这样转到了东蒙古人之手"[3]。但是过了不久，阿台汗依照已经成了他妻子的妥懽的母亲的请求，尊敬地释放妥懽这位贵族俘虏回去，并由两名特使伴送他。"妥懽台吉刚一到达，就

〔1〕应该指出：蒙古史料在列举汗的名单及注明他们执政年代方面，明显地不一致。下面的表格可以使我们对这些不一致的现象有个清晰的概念。

汗名	《黄金史》	《黄册》	《蒙古源流》
额勒伯克	1394—1401	1392—1399	1393—1399
妥懽	1401—1405	未提及	未提及
奥洛依帖木儿	1405—1418	未提及	未提及
坤帖木儿	未提及	1399—1407	1400—1402
额勒锤帖木儿	未提及	1407—1415	1404—1410
德勒伯克汗	1419—1424	1415—1420	1423—1428
卫拉台汗	1424—1435	未提及	未提及
阿台汗	1435—1449	紧接德勒伯克汗之后执政12年	1426—1438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58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71页。

〔3〕萨囊彻辰：《黄金史》，第59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72页。

召集了卫拉特、乌古列特、巴噶图特以及霍哈特这四个万户"[1]。很快,妥懽台吉杀死了阿台汗。《黄金史》收尾说:"卫拉特就这样夺得了对蒙古人的统治权"[2]。

《黄册》所叙述的事件过程略有不同。这部史料的作者说,巴图拉丞相——浩海达裕的儿子不是在跟阿台汗率领的东蒙古人打仗时战死的,而是德勒伯克汗死的那年,即1420年,被他的亲兄弟格齐哈什哈害死的。格齐哈什哈本人在同年逝世。不久阿台汗就出兵攻打爆发内乱的卫拉特人,击败卫拉特,俘虏了巴图拉丞相的儿子巴噶穆,并给他取名妥懽。过了些时候,妥懽被俘后获释,带领自己的"四卫拉特"袭击阿台汗,并把他杀死。[3] 上面描述过的东蒙古与卫拉特二勇士的对射,按《黄册》的记载,不是发生在那个场合,而是晚得多,在岱总汗时期。

至于《蒙古源流》这部编年史的作者,则几乎是全部的,有时是逐字逐句地转述《黄册》的故事。不过,他很有趣地谈到了阿台汗和两个卫拉特少年——赛穆沁和萨勒穆沁有过亲密友谊的事实。阿台汗对这两个少年给予了极端的信任。[4]

总之,我们的3部蒙古史料再一次谈到有关卫拉特的论题,仅仅是由于1425—1438年的一些事件,当时在东蒙古人与卫拉特人之间发生过战斗。正如《黄金史》所叙述的,这场战斗之前有一场"骑士般的"对射。这种对射是东、西蒙古人有过紧密联系的新证据。顺便说说,结义兄弟的风尚也证实了这一点。应当指出,《黄金史》在这里第一次说出卫拉特万户的名称[5]。有关政权从卫拉特方面转落到东蒙古方面以及反过来的情况,《黄金史》的作者总是把它跟他们双方之间某次战斗的结局直接联系起来。

---

〔1〕萨囊彻辰:《黄金史》,第61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73页。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63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74页。

〔3〕《黄册——17世纪的蒙古编年史》,沙斯季娜译,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版,第62页。

〔4〕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27页。

〔5〕按贡布耶夫的原文为卫拉特、乌古列特、巴噶图特以及霍哈特;按巴乌登的文章,则仅仅是巴噶图特。

《明史》对1400—1425年间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记载，有的场合明确和补充了蒙古史料，而有的却有分歧。根据《明史》记载，1400年额勒伯克汗的长子坤帖木儿在东蒙古登汗位，1402年鬼力赤替换了他，统治到1408年，这时登位的汗是本雅失里。还在鬼力赤汗在位时，即1402—1408年间，就开始了卫拉特[1]和东蒙古人之间的武装冲突。1409年朱棣皇帝赏给3位卫拉特执政者以尊荣封号和贵重礼品，其中特别重视马哈木。不久，卫拉特又一次侵犯了东蒙古人，而在1412年杀死本雅失里，立德勒伯克为汗。在1413年，卫拉特总执政者马哈木对东蒙古人和明朝之间建立和平关系心怀不满，又开始了反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可是1414年就遭到失败。1413—1414年事件后很快发生的卫拉特同东蒙古人的交战，也以卫拉特的失败而告终。在这些情况下，马哈木向北京遣使进贡，开始和平谈判。谈判拖延了下来，而马哈木也就在那时死去，1418年来到北京的使者，已经是马哈木的儿子妥
47 懽所派。妥懽要求中国皇帝将授予他先父的那些封号赏赐给他。北京满足了妥懽的要求，直到1422年他没有扰乱过中国边界。[2]

在我们看来，《明史》与蒙古史料的记载最重大的分歧是在卫拉特与东蒙古人武装斗争开始的时间方面。《明史》认为，他们之间的交战开始于鬼力赤执政的年代，即15世纪头10年，而我们看到的蒙古史料则一致认为，交战开始于15世纪30年代。我们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蒙古史料似乎比较接近事实真相。不然很难想象，这3部蒙古编年史的出身于东蒙古贵族的作者，对他们的祖先同卫拉特之间延续将近20年的无数次交战竟会只字不提，如果这些交战的确发生过的话。应该指出，明朝当局初次接触卫拉特人并同他们熟悉也只是在额勒伯克汗死后，即不会早于15世纪头10年初期。十分可能，他们最初有关卫拉特的记载是不准确的。

---

〔1〕顺便说一下，此处《明史》中才第一次提到卫拉特。

〔2〕"那时的蒙古分裂成两个独立的部——马哈木为首的卫拉特部为西部；阿鲁台率领下的为东部……东西两部之间及卫拉特人之间，一个劲儿地进行着连绵不断的权利争夺，获得临时领导权的首领立刻忙于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便从元朝皇帝众多的后裔中扶植一个人。"见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37页。

我们发现，在《黄金史》中，当谈到岱总汗接替阿台汗执掌政权时，又一次提到了卫拉特。《黄金史》讲到，岱总汗和他的兄弟阿噶巴尔济济农跟卫拉特人约定在明安·哈拉图地方会战。当东蒙古人来到指定地点时，看见卫拉特人已经在等候着他们。卫拉特军队由妥懽的儿子也先台吉率领。卫拉特人向东蒙古人进攻，不过东蒙古人却愿意跟他们开始讲和。[1] 大概，讲和成功了，因为《黄金史》的作者明确肯定，卫拉特人离开了战场，并肯定以后的事件已经是他们撤离之后又展开的。[2] 紧跟着上述冲突之后，在岱总汗和他的兄弟阿噶巴尔济济农之间，闹起了一场争端。原因是济农拒绝将一个从汗那里全副武装、携马逃来的臣民归还给汗。此后，济农认为受了委屈，决定同哥哥分离而同卫拉特联合。他遣使去卫拉特通知这一决定。[3] 卫拉特王公们听了使者的话之后，举行了会议，会议决定可以让济农当汗，但济农本人的职务，即副王职务，则要交给他们卫拉特人。在这个条件下，卫拉特同意跟济农联合。[4] 济农接受了卫拉特人提出的条件，离开了东蒙古，而跟卫拉特结合在一起。过了不久，卫拉特与济农的联军发动了对岱总汗的进攻，后者没有迎战而逃到克鲁伦河。济农执政的第15年在那里为他的岳父所杀。

过了一些时候，卫拉特王公们开始提醒济农，不要忘记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济农应该登汗位，而济农的职务和封号则应当传给妥懽的儿子也先台吉。[5] 阿噶巴尔济济农对卫拉特王公们的这个提示是怎样对待的，我们并不完全清楚。《黄金史》说到卫拉特人设过一次盛宴，宴会时阿噶巴尔济以及所有跟他同来赴宴的东蒙古大臣全被杀害。《黄册》和《蒙古源流》也像《黄金史》一样，讲到阿噶巴尔

〔1〕萨囊彻辰：《黄金史》，第63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74页。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64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75页。

〔3〕萨囊彻辰：《黄金史》，第65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75页。

〔4〕萨囊彻辰：《黄金史》，第65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76页。Oyiradun tayisi-nar noyad ügülerün ǰinong eye nigedüye gekü bolosa jinong či garan bd. öber-ün ǰinong čolaban man-dur ög; ene ügendür min-ü bolqu bolosa eye nigedkebesü nigedüye gebe.

〔5〕萨囊彻辰：《黄金史》，第68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78页。

49 济济农跟他哥哥岱总汗的冲突，讲到前者跟岱总汗分离，跟卫拉特结合，他们合力进攻岱总汗的情况，讲到岱总汗的被杀害和阿噶巴尔济本人之死。[1] 不过，两部史料都在这场冲突中插入了二勇士对射的情节，我们前面已说到，《黄金史》认为这段情节属于更早的时期——卫拉特对阿台汗的战争时期。

在《明史》中岱总汗（1439 年上台执政）名叫脱脱不花。这部史料中，有关目前所研究的这段时间的卫拉特历史事件的资料寥寥无几。书中只记载说，1422 年卫拉特人第一次武装侵袭中国边界，将哈密地区洗劫一空。不过，此事之后，他们立即派遣特别使团到北京为哈密事件赔情道歉。过了一年，即 1423 年，他们在妥懽领导下打败了阿鲁台指挥的东蒙古人，后者在 1434 年为卫拉特人所杀。[2]

将我们现有的几种史料中有关 15 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事件的资料加以对比，可以有把握地肯定，就是在这个时期，卫拉特与东蒙古人的相互关系也绝不只是武装斗争，在各次武装冲突的间隙时间里，他们也发展了各方面的，有时是极密切的联系——通婚、结义、军事和政治上的合作等。《黄金史》的作者指出，在单独决斗中打败了卫拉特人巴图鲁珪林齐的东蒙古勇士巴图鲁锡古苏特，后来却供职于卫拉特的执政者那里，[3] 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至于卫拉特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发展和平贸易的倾向在这段时间里也是继续占主要地位，只不过偶然地而且是短时间内发生过类似卫拉特人侵袭哈密这类局部冲突。15 世
50 纪三四十年代卫拉特武装斗争的主要路线不是在东方指向东蒙古和中国，而是在西边指向蒙兀儿斯坦。

妥懽的儿子——也先执政的年代，在 15 世纪中叶卫拉特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所有史料对他都很注意。也先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卫拉特各领地首席执政者的职位之后，继续贯彻其父巩固集权的政策，力求使各地方领主无保留地服从他的意志。《黄金史》所记载的事实证

---

〔1〕例如，《黄册》第 64－65 页。

〔2〕勃列特史奈德：《东亚史料中的中古史研究》，第 165 页。

〔3〕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73 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 81 页。

明，也先渴望把权力扩张到卫拉特领地以外去，进而成为全蒙古的执政者。为此，他在采取纯军事性质措施的同时，还有步骤地消灭那些反对过或者可能反对他实现独揽大权计划的东蒙古贵族代表人物。譬如，根据《黄金史》的记载，他杀了巴图鲁锡古苏特，又企图杀掉哈尔固楚克台吉[1]以及哈尔固楚克的新生儿，还杀了蒙古汗蒙哥以及其他人。在叙述完蒙哥被杀以后，《黄金史》的结语说："这就是蒙古人的统治权如何转到卫拉特方面的情况。"[2]

后来，也先进而兴兵攻打中国。《黄金史》继续说："也先制服了蒙古人和卫拉特人之后，就出征乌孙朱契特的3个万户，又战胜了他们……正当也先台吉征服朱契特回家时，中国的正德帝[3]正带兵向蒙古进发，遇到了也先……也先台吉向中国军队进攻，并打了胜仗。"[4]众所周知，由于这场战役的结果，明朝的中国皇帝朱祁镇（1436—1450年在位）落入也先之手。

此后，名声显赫的两个卫拉特人——西准噶尔的阿拉克帖木儿宰桑和东准噶尔的哈冬帖木尔随即建议也先登位称汗，而把台吉称号让给他们两人。也先借口已经把台吉称号传给了儿子而拒绝了这一建议。这两位卫拉特大臣对此回答心怀不满，密谋串通攻打也先。也先战败，被迫逃跑。《黄金史》中说，他很快也被捕并被杀死。

《黄册》还十分详细地描写了从蒙古逃生的哈尔固楚克台吉的流浪情况，他定居在托克玛克的阿克蒙哥伯颜家里，最后就在那里被杀害。《黄册》的作者也详细地叙述了人们如何按也先的命令企图害死哈尔固楚克的新生儿，婴儿的母亲——也先的女儿彻辰拜济又如何拯救了孩子。她招来许多人参加这件事，其中还有卫拉特的披甲兵格特依太保。但是，《黄册》却只字未提也先的军事措施，未提他对托克玛克和朱契特的进军、同中国的战争、朱祁镇的被俘等等。《黄册》最后

〔1〕前面提到过的阿噶巴尔济济农的战友之一。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76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83页。

〔3〕应为"正统"帝，系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译者

〔4〕萨囊彻辰：《黄金史》，第76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83页。

以卫拉特右侧的阿拉克和庆桑进攻也先，迫使他逃跑的情节结束了也先的故事，并记载说，也先是被一个叫巴郭的东蒙古人杀死的。[1]

与《黄金史》一书相比，《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囊彻辰在叙述也先的故事方面没有添入任何新的东西。他丝毫不差地复述了《黄金史》中有关也先军事远征的故事。从《黄册》中萨囊彻辰则摘取了拯救哈尔固楚克台吉幼儿的历史叙述[2]。

但是，《明史》却告诉了我们许多重要而有趣的东西。这部史料对权利集中到妥懽手中，特别是集中到其子也先手中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们两人虽然不是正式的汗，而只是汗——成吉思汗后裔的一个首相，但实际上却越来越把汗排挤到次要地位，使他们变成有名无实的蒙古执政者，实际执掌政权的已经是妥懽，而更大程度上是也先。

《明史》以较大篇幅叙述也先俘虏中国皇帝的那次进军。这次进
52 军的前几年，这个卫拉特执政者对北京政府的苛求日益增大。“在对待中国朝廷方面，也先的行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一向不太有礼貌，不过从前他至少还遵守某些礼节的形式。比如：只是到一定的期限他的使臣才来进贡，而且使臣人数只限于80人，可是现在他们却开始以大批成群的人出场了，人数竟达两千多。”[3]

这样的使团使中国明朝及其政府感到不安。使团在不同时期从蒙古四面八方来到北京，而且成群结队，赶着牲畜以求换取相应的礼品。其中，《明史》的作者们诉说到兀良哈蒙古人的情况，他们在一个时间里开始派出如此频繁而众多的使团，致使皇帝不得不专颁诏令，要求“凡遇时节庆贺，许遣头目三五人”[4]。可是，这类限制使中国的游牧邻邦，特别是其豪富而显贵的上层分子深为不满，结果促使他们走上了武装入侵的道路。

---

〔1〕《黄册》，第65－68页。

〔2〕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39－145页。

〔3〕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64页。译者按：引证与原文不甚一致。原文为：“故事瓦使不过五十人。利朝廷爵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屡敕不奉约束，往来多行杀掠。”见《明史·瓦剌传》。

〔4〕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62页。

也先也就是这么干的，而且他对中国的要求随着他的势力的增大而日益增加。《明史》说："也先借口转牧各地甚需积粮，遣使向中国边防守备当局乞粮。"[1]1448 年，也先派出 3000 人的使团到北京，中国当局未予接待。为此，也先于 1449 年出师进犯中国。[2]

重要的是，如果相信《明史》的话，那么，脱脱不花（岱总汗）是反对 53
这次进军的。按中国的编年史作者的记载，岱总汗曾向也先表示："吾侪服用多资大明，彼何负于汝而忍如此。"[3]我们认为，这些话是蒙古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这一事实的自白，同中国作战，只能使蒙古封建领地的经济状况恶化。

1450 年，在也先的倡议下，蒙、中政府开始议和。谈判的过程在《明史》中叙述得很有意思，揭示了战争的真实内幕。中国使臣杨善对也先说："太上皇帝朝，太师遣贡使必三千人，岁必再赍，金币载途，乃背盟见攻何也？"也先回答说："奈何削我马价，予帛多剪裂，前后使人往，多不归，又减岁赐。"中国使臣杨善辩护说："非削也，太师马岁增，价难继，而不忍拒，故微损之，太师自度价比前孰多也。帛剪裂者，通事为之，事露诛矣。即太师贡马有劣弱。貂或敝，亦岂太师意耶。"[4]

我们所引的这段对话，一目了然地介绍了中国与其游牧邻邦组织 54
贸易的情况，介绍了贸易交流在中、蒙相互关系中的决定性意义以及买卖双方间的关系。从杨善的话中可以断定，当时的中国市场已无法容

〔1〕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 64 页。译者按：原文为"十一年冬，也先攻兀良哈，遣使抵大同乞粮"。

〔2〕维谢洛夫斯基把原因和结果混为一谈，他写道："当游牧民族对中国蓄意谋叛时，他们变得极为吹毛求疵。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们看到中国政府需要他们的帮助，便把进贡的使臣人数从 80 人增加到 2000 人。这不仅对中国政府，而且对人民压力同样沉重，因为这两千人沿途抢劫。1448 年，来进贡的也先使团达 3000 人……官员们拒绝发给赡养费……也先对此大发雷霆并调兵出征。"见维谢洛夫斯基：《蒙古史讲义》，第 79 页。

〔3〕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 65 页。

〔4〕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 76 页。

纳从蒙古赶来中国的数量与日俱增的牲口。[1] 而由于中国在当时是蒙古独一无二的市场，这点我们已经说过，所以市场容量的不足就不能不对卫拉特社会的内部生活及其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

1.2 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前半叶西蒙古的内外形势

也先汗执政时期是蒙古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卫拉特领地统一在他的权力之下，他凭借这些领地的势力，镇压了敌人的反抗，起到了全国统一者的作用。自然，他的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维护他周围的封建上层分子自私的利益，他们力求扩大封建剥削的范围，攻掠近邻以增加自己的财富，并力求创造同中国和其他农业国通商的最有利的条件。但是，不论也先汗主观的计划和愿望如何，客观上他的活动是与蒙古发展的
55 利益相符合的，因为克服封建割据，建立一个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蒙古强国，是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前提。也先汗在某段时间里倒是建立起了这样的统一国家，但只是昙花一现，它的寿命没有比自己的缔造者长多少，也先一死，这个国家也立刻分崩离析了。

在也先汗执政时期，蒙古的政治中心从东方移到了西方卫拉特王公们牙帐的驻地，这个时期风起云涌的事件，吸引了俄国和外国研究者的注意力。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学者中的大部分人认为，也先汗渴望重建成吉思汗型的帝国，而且他们不是在卫拉特和东蒙古封建上层分子的经济、政治利益的矛盾中去寻找二者斗争的原因，却是在他们二者的心理差别中找寻这个原因，把这一斗争看做是无休止的、不可调和的斗

---

〔1〕雅金夫写道："中国为求得其北疆的安定，历来向蒙古人交付着报酬。不过，这种保证和平的报酬不是以贡品的形式交付，而是在不降低帝国尊严的其他名义下交付的。当时，中蒙保持和平的基础是市马，即中国朝廷必须按照和约规定的价格，每年接收蒙古人一定数量的马匹。蒙古的这种臣属方式积结着中国方面的巨额亏损和极大不便。蒙古人赶来的是虚弱劣马，而且数量比合同协议的更大，尽管如此，还粗齿无理地要求按原价偿付……中国政府从自己方面压低了马价……由此双方孕育着的不满情绪年复一年地增长，最后终于达到了只有动武才能使之终了的程度。"见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18－19页。雅金夫看到了蒙、中贸易及蒙、中战争间的外在联系，但是未能洞察这些现象的本质。

争，排除任何合作、妥协与和解的可能。[1] 在我们看来，前面引过的一些资料和史料记载已经令人信服地驳倒了这些论点。

大部分俄国和外国研究者一般都认为，随着也先的死去，卫拉特在蒙古称霸的时期也就结束了，卫拉特本身也不再有其历史的生涯，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例如，比丘林写道，随着这位卫拉特活动家的逝世，卫拉特的威力也随之消亡，结束了“准噶尔卫拉特国家虽然短暂，却光辉灿烂的第一个时期。随着也先的死去，卫拉特就再也保持不住自己对蒙古的影响，他们不得不放弃参加整个民族的共同事务，而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原有领地的范围内。由于这个原因，从也先到哈喇忽喇这 150 年期间，卫拉特内部的事情很少为人所知”[2]。按比丘林的意见，这 150 年的时间，“卫拉特人是在声威远震之后，休养生息中度过的。因此，从 15 世纪中期到 17 世纪，在他们的历史中除了某些汗和各部领主的名字以外几乎没有保存任何东西，甚至连他们在位年限也没指明”[3]。

著名的俄国东方学学家格里戈里耶夫断言，在也先的辉煌时期之后，卫拉特人[4]在 150 年内，即直到 16 世纪末为止，没有参与其余蒙古地区的事务。[5]

乌斯宾斯基也像比丘林一样，把 15 世纪前半期称作是卫拉特历史上的英雄时期，它随着也先的逝世而告终。此后，全蒙古整个生活的中心就转到了南部察哈尔地区，蒙古汗的牙帐也迁移到了那里。[6]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在概括也先死后时期东蒙古和卫拉特的历史时写道：“汗位的这种不巩固情况，伴随着地方分权的过程，引起各部领主权力的加大和蒙古部落的分裂。甚至卫拉特也未能避免这种分

---

〔1〕波兹德涅耶夫写道：“在整个明朝时期，准噶尔人简直没有一年不是在跟蒙古人的斗争中度过的。”见波兹德涅耶夫：《答维谢洛夫斯基》，第 284 页。

〔2〕雅金夫：《从 15 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 21－22 页。

〔3〕雅金夫：《从 15 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 23 页。

〔4〕他称之为卡尔梅克人。

〔5〕格里戈里耶夫：《巴图浑台吉》，载《百科辞典》，圣彼得堡，1836 年版，第 5 卷，第 76 页。

〔6〕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 153 页。

裂:一部分卫拉特人以也先的儿子火儿忽答为首领,迁居干赶河,而另一部分则游牧于哈密一带。"[1]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在另一处指出:"随着也先去世,卫拉特的政治威力也就暂时中止了。东蒙古人又重新登上舞台,他们挣脱了妥懽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2]

研究卡尔梅克历史和民族志学的学者波波夫的意见也与此类似。他写道:"准噶尔人还在15世纪中期绰罗斯家族衰落之后,就跟东蒙古人分离,而开始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内部生活,不管东蒙古同族人了。
57 准噶尔人当时没有参加中国和喀尔喀之间的任何战争,他们需要的是剧烈震荡之后的休整。这些震荡一个接一个地接踵而来,而最后,随着也先去世(1453年)[3]使他们的威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在这个延续了150年左右的间歇时间里,准噶尔人躲开了战争的纷扰,开始跟隶属于他们的东土耳其斯坦人进行贸易来往。"[4]

波兹德涅耶夫也写道:"15世纪中叶,在卫拉特人中出现精明能干、积极进取的也先以前,他们处于成吉思汗系的控制之下,是微不足道的。……随着也先的去世,卫拉特生活中这一短暂而辉煌的时期也随之告终:卫拉特重新分裂成许多单独的部,又变得无所作为、无关紧要。这样过了150年,直到17世纪初他们中出现新首领为止。"[5]

霍沃思跟俄国旧学派的东方学学者一样,也断言也先之死,结束了西蒙古历史上的英雄时期。[6]

可见,旧的俄国和外国文献对15世纪后半期到16世纪前半期这段卫拉特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共同看法的态度非常明确,即过分夸大也先汗的个人作用,认为似乎是他一个人创造了那个时期的卫拉特历史。同时也过分夸大了卫拉特人与东蒙古人之间武装斗争的作用和意

---

〔1〕格鲁姆·格尔日麦洛:《中国西部游记》,第2卷,第79页。干赶河,按乌斯宾斯基的意见是克穆河,而按波科季洛夫的意见则是鄂尔浑河。

〔2〕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第588页。

〔3〕按《明史》记载,也先被杀是在景泰六年,即1455年。——译者

〔4〕波波夫:《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简评》,第42页。

〔5〕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人》,第142页。

〔6〕霍沃思:《蒙古史》,第1部,第609页。

义，把这个斗争描绘成似乎是以建立前者对后者的统治为主旨的不可调和的连续斗争，把卫拉特历史上的也先时期和也先以后的时期没有根据地对立起来。他们认为第一个时期具有英雄时代的特征，而第二个时期的特征则是在历史上空洞无物，是第一个时期的急剧事变之后“休养生息”的时期。他们对事实作了肤浅的分析和概括，没有揭开真正的因果关系。

那么，也先汗国崩溃之后，卫拉特封建领地的历史实际上是怎样发 58
展的呢？

《黄金史》说，也先死后岱总汗 7 岁的儿子摩伦嗣汗位，他又被满都古勒[1]接替。满都古勒死于猪年(1467)，于是汗位传给了巴延蒙克博勒呼济农，他的母亲是满都古勒的妻子之一，是卫拉特拜盖尔赛台什的女儿。但是这个汗很快也死了，于是赫赫有名的满都海赛音哈屯[2]当了蒙古的摄政女王。她从反对卫拉特的斗争开始，毅然着手重新统一蒙古的领土。在这场反卫拉特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7 岁的巴图蒙克就被拥立为汗，历史上称作达延汗。达延汗在其执政的年代里，完成了满都海赛音哈屯开创的统一全蒙古的事业，从而成了全蒙古的首领。他不仅使东蒙古王公，而且也使卫拉特王公们臣服于自己。达延汗执政的整个时期里，卫拉特王公们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力。《黄金史》的作者在谈到达延汗出征土默特时记载说，汗的部队里有威望的军事首领中，有一个卫拉特统帅谢古思，对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为面临的战役选择了战场，并且说服汗确信这一战场的有利地形。[3] 战役以达延汗的大胜而告终，达延汗慷慨地奖赏参加征战的人员，其中也包括谢古思，颁布了豁免谢古思及其后裔纳税和服役的命

〔1〕《明史》作“满都鲁”。——译者

〔2〕“哈屯”又译为“可敦”，突厥语“夫人”之意。——译者

〔3〕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104 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 102 页；dayan qaran eyimü či medem-ja qeju qarač reg-ün arlarč i oyirad-un següse eče asarbai. Següsen kelebei. Eyimü nom-un tülkigür-tü buqa sayin sečikül bile gejü.

令。[1]

《黄金史》中所记载的有关卫拉特历史上也先死后时期的资料就是这些，它对这段历史仔细研究到16世纪后半叶初期。对于以后卫拉特历史上的事件，《黄金史》默无所述。这部编年史只是含混不清地说到土默特的俺答汗征服过卫拉特人，既未指明时间，也未提到地点，更未涉及这一事件的其他情况。

59

《黄册》对事件的叙述略有不同。根据这部文献中的资料，也先死后，岱总汗的儿子蒙尔古斯[2]被他母亲萨睦尔太后立为蒙古汗，称作乌珂克图汗。他即位以前，曾出征卫拉特，这次出征是他那位好战的母亲所组织的，使卫拉特遭到惨败。远征归来之后，萨睦尔太后就让自己年幼的儿子登位称汗。但是，蒙尔古斯称汗为时不久，过了一年就被杀害，由摩伦汗继位。过了两年，他也被杀。继摩伦汗登位的是他的舅舅满都古勒。满都古勒的母亲是卫拉特的亲王夫人、东蒙古阿寨台吉的妻子。满都古勒的副王就是他侄儿巴延蒙克博勒呼济农。前面说过，博勒呼还在幼年时，也先汗就打算杀死他。由于4位大臣的帮助，把孩子送到东蒙古满都古勒那里，巴延蒙克博勒呼济农才幸免于死。满都古勒慷慨嘉奖了孩子的救命恩人，其中包括卫拉特的格特依太保，赏赐给他们最高的特权。

巴图蒙克就是巴延蒙克博勒呼济农的儿子，他生于木年，即猴年(1464)。巴图蒙克刚满7岁时，满都海赛音哈屯就当了他的妻子。到虎年(1470)，她扶植丈夫登上汗位，随后便远征卫拉特，使卫拉特臣服于巴图蒙克达延汗的政权，同时强定了许多法规和条令，其中一再强调卫拉特从属于全蒙古汗的不平等地位。[3] 达延汗死于兔年(1543)，他连续控制这一地区达74年。他的妻子中还有一个女亲王古实哈屯，是卫拉特大臣凯里呼济盖尔的女儿。

---

〔1〕萨囊彻辰：《黄金史》，第105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103页；oyiradun siguse arlarcī ene qoyarnu üre doluyan üye boltala alba üqei bolturai qejü darqalaba.

〔2〕应为蒙古勒呼青吉斯。——译者

〔3〕《黄册》，第72页。

我们看到,《黄册》的作者没有印证《黄金史》中关于卫拉特统率谢古思的业绩的记载,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提及。但比较详尽地叙述了达延汗登位前的一些事件。至于《蒙古源流》,它的作者复述了《黄册》 60
所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东西,对 15 世纪后半叶卫拉特历史的叙述,没有增添任何独到的新内容。

蒙古史料中,对也先死后时期卫拉特情况的记载就是这些。尽管史料寥寥无几,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卫拉特与东蒙古封建主的相互关系,在上述时期与 15 世纪头几十年没有什么本质的和原则的区别。在也先死后近整整 100 年的时间里也跟他在位前一样,东、西蒙古之间的联系密切而多种多样。也同以往一样,武装冲突与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友谊、合作以及通婚等等关系是互相交替的。顺便说说,最后一个被公认的全蒙古大汗——达延汗,就是也先这个卫拉特汗的曾孙。某些研究者认为 15 世纪后半叶,东、西蒙古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像前半叶一样,只不过是相互间的深仇大恨之类而已[1],而我们所研究过的蒙古史料中却没有什么记载足以证实他们的这种观点。

明朝的编年史使我们有可能更清楚地想象也先死后在蒙古所形成的总形势。《明史》指出,从 15 世纪 60 年代起,蒙古出现了封建领地的执政者互不依赖、各自为政的局面。[2] 从这一记载中不能不看到这一地区发生过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动。首先不能不看到地方领主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进一步加强,这些领主变成了自己土地的唯一的世袭所有主。在这一基础上,他们对大汗中央集权的意图竭力反抗,封建割据日益加深。原来只有一个由全蒙古大汗来执行的统一的内外政策,这时却出现了许多蒙古政策,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些政策的倡导人和执行人 61
就是地方领主。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正是《明史》所说的互不隶属的蒙古地方执政者各自为政的新现象。

〔1〕"这两个族之间又燃起了炽烈的仇恨之火,其实这种仇恨就没有终止过,而只是由于也先的辉煌战绩暂时沉寂了一阵。而卫拉特首领对中国后来软弱无能的政策所引起的自然后果,就是东蒙古人的不满,他们又跃跃欲试地燃起了摆脱其西部邻居的可憎桎梏的渴望。"见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 80 - 81 页。

〔2〕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 69 页。

不过，所有蒙古王公对中国的政策中最重要的共同问题，仍然是通商条件和整个市场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像过去一样，遇到了中国市场容量有限的困难，市场的销路不能容纳蒙古人供应的与日俱增的大量牲口和畜产品。波科季洛夫在评述《明史》的相应记载时写道，还在更早，即15世纪初，就在军屯区一带开市，当地蒙古人可以赶着马群来赴市，并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他们所必需的用品，例如："粮食、衣服和各种器具。这种通市不是自愿的，对中国人来说带有屈辱的性质，因为中国人必须按预定的某种价格收购马匹，而价格定得很高，比实际马价要贵二三倍……中华帝国的执政者每次开设这种市场都是出于被迫的，因为蒙古人把开市作为必需的媾和条件"。在这方面，波科季洛夫还记载了1429年颁布的朱瞻基皇帝的圣旨，其中直说："在东蒙古开市，纯为慈善，为使游牧民族不致在日用必需品方面感到缺乏"[1]。

据《明史》记载，也先死后，蒙古派出了大臣孛来与中国政府议和，中国政府承认蒙古王公有权定期派遣一定人数的代表团，依循有利于蒙古人的某一路线去北京。[2] 至于卫拉特，按照《明史》的说法，它在也先死后的某段时间内继续独立地与中国保持联系，派去代表团和商队。"可是，随着孛来势力的增强，东蒙古像一堵城墙切断了卫拉特与中国的联系，于是卫拉特与东蒙古之间便接二连三地发生冲突。"[3]

很可能，《明史》作者所指的这些冲突，就是发生在也先死后到达延汗的统治得到巩固的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冲突，蒙古史料中也提到了。大家知道，正是在这些年代，蒙古政治生活的中心开始从土拉河、鄂尔浑河以及克鲁伦河一带移向南部的察哈尔地区，蒙古大汗的牙帐也迁到了那里。与此同时，东蒙古人开始向鄂尔多斯和库库淖尔的

〔1〕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108－109页。

〔2〕波科季洛夫不了解蒙古要求开市的客观经济意义，所以他对中国同意孛来提出的条件，作了这样的评论："孛来取得了这一决议的优惠权，决议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无疑由成群结队的侍从人员陪送的蒙古使臣，这样一来便有权根据合法的理由通过大片中国领土。这就使他们有可能为所欲为地在中国的、大概是整个北部边境进行掠夺。"见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88页。

〔3〕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91页。

草原地区渗透，以后这一带成了他们常住的地方。[1] 结果，西蒙古人跟中国市场的通路就完全被切断了。这点不能不引起西蒙古方面进行突破包围的尝试，以保证自由通往东方。可是，在这场斗争中，卫拉特人遭到了失败。在整整 150 年到 200 年期间内，他们与中国的联系完全中断。这就是中国明朝时期的史料对卫拉特的历史只考察到 15 世纪 70 年代的原因。有关 16 世纪和 1600—1675 年的历史事件，我们在明朝的史料中，以及在清朝初期的史料中，都没有发现任何记载。

首先，我们看到，蒙古的编年史编纂家们中断了有关卫拉特的叙述，而后，中国编者们也沉默不语了。我们手头便只剩下了突厥文的史料。对于 15 世纪后半叶到 16 世纪前半叶这 100 年历史来说，这些史料是独一无二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卫拉特历史的脱节现象。脱节的原因在于，对卫拉特历史事件的记载，旧的中、蒙史料中断，而蒙古、中国、卫拉特、卡尔梅克、俄国等新史料还没有出现。我们在后面将谈到，突厥文史籍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比丘林以及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断言，在也先死后的时期里卫拉特退出了历史舞台，不再在历史上起积极作用，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卫拉特对外政策的积极性只是在方向上有所改变。由于跟中国隔绝，在争夺东方通道中遭到失败，卫拉特成了活跃在西部和北部、东土尔其斯坦、希布察克草原和中亚草原的一支生机勃勃的力量，对这一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都与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民族的形成过程有关，这两个民族为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国家，为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些过程同反对察哈台系王朝的斗争联系着，因为它当时还控制着玛维兰纳赫尔[2]和蒙兀儿斯坦，而在那些地区，从事古老农业耕耘的绿洲和草原的游牧经济并存。上述历史过程的外在表

〔1〕根据施拉姆引自西宁地方志的资料看，蒙古人是在 1457 年第一次占领鄂尔多斯的。此后不久他们又占领了库库淖尔。参看施拉姆：《甘肃与西藏边区的蒙古人，他们的起源、历史和社会制度》，费拉德菲亚，1954 年版。

〔2〕玛维兰纳赫尔是阿拉伯语，指中世纪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中文史料则称这一地区为“河中”。——译者

现则是执政者和王室统治集团的频繁更迭，以及为争夺控制贸易通道和争占重要经济、文化中心等而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

15 世纪中期，希布察克草原的宫廷斗争加剧。败者逃奔东北蒙兀儿斯坦边境，那儿的执政者支持了他们，并让他们占用楚河塔拉斯河一带的谷地。15 世纪 60 年代，历史上第一个哈萨克封建国家就是在这一带奠定基础的。因为逐渐形成的乌兹别克国家的巩固对蒙兀儿斯坦诸汗没有利害关系，他们便对哈萨克贵族给予了一些援助。在 15、16 世纪之交，乌兹别克封建主们占有了中亚的定居地区，后来在这里形成了各乌兹别克封建汗国，并日益发展。乌兹别克与哈萨克的斗争在整个 15 世纪后半叶和 16 世纪，一直延续不断。在这场斗争中，作用重大的因素是双方竭力攫取和企图占有锡尔河沿岸的城市瑟格纳克、赛拉姆、土尔克斯坦等，因为这些城市是中亚游牧民族与定居的庄稼人和手工业者进行易货贸易的中心。哈萨克贵族迫切需要保障剩余畜牧产品畅通无阻地交换农产品和城市手工业产品，这就激发了他们侵占这些城市的欲望。可是，他们的努力遇到了乌兹别克封建主们的对抗，后者不愿让哈萨克人进入上述城市的市场。[1]

哈萨克封建主们为了反击乌兹别克的阿布尔海尔汗，而后反击昔班尼和昔班尼的后裔，必须集中一切人力和物力。这点也说明一个事实：他们当时和其他近邻保持了和平睦邻关系，与卫拉特的关系也是如此，整整 100 年中，双方的关系没有被武装冲突的阴影所笼罩。

不过，我们说在 15 世纪后半叶和 16 世纪前三十几年内保持着睦邻关系，这一方面是指哈萨克封建主与蒙兀儿斯坦，另一方面是指哈萨克封建主与卫拉特，而对于卫拉特和蒙兀儿斯坦的相互关系却不能这么说。蒙兀儿斯坦在 15 世纪中期，分裂成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东部和以

---

〔1〕有关乌兹别克昔班尼汗和哈萨克执政者间的相互贸易关系，编年史作家鲁兹别罕（Рузбехан）写道："希布察克草原诸汗得知，太阳汗陛下的政权得到了稳定，而蒙古人和察哈台系的政权和国家已经不再存在之后，便开始嫉妒起来。实际上他们很清楚，由于极端缺乏以棉织物为基础的各种衣着……他们应该入侵这位汗陛下的领地，因为圣旨规定土尔克斯坦的居民不准与哈萨克商人进行任何交易，而且规定他们之间不准交往，也不准商人到他们土地上的居民中去。"引自《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1 卷，阿拉木图，1957 年版，第 144－145 页。

喀什噶尔为中心的西部两个部分。两部分实际上已彼此独立，经常敌对，只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逐渐形成的乌兹别克国才联合一阵。 65
在这种情况下，卫拉特成了蒙兀儿斯坦内部争斗的集团常来求援的一支力量，这有助于卫拉特封建主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外乎是靠损害邻邦而占有贸易通道和攫取战利品。

若干史料一致指出，在15世纪中期，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东蒙兀儿斯坦开始强大，吐鲁番执政者与卫拉特王公之间展开了伴随着频繁战争的长期斗争。1452年，也先还在世时，卫拉特就兴兵大规模远征蒙兀儿斯坦。在这次结束于1455年也先死后的远征中，卫拉特军队踏遍蒙兀儿斯坦国土，并侵入谢米列契地区，从那儿折向南方。当他们在锡尔河谷地行进时，到达玛维兰纳赫尔边境，洗劫了塔什干绿洲和另一些绿洲，然后返回。这时期东蒙兀儿斯坦的执政者是爱辛·布哈（1446—1461年），他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歪思汗的儿子。有些史料提到1459年曾有卫拉特代表团去赫拉特拜见阿布·赛伊德苏丹。[1] 这一记载值得注意。

卫拉特和蒙兀儿斯坦争夺的一个重要对象是哈密州，蒙兀儿斯坦、卫拉特封建主和中国3股势力都力争占有这块地方。哈密位于连接中国和西方各国的主要贸易的通道上，扼守着进出中国的门户。哈密的特殊作用曾经是作为中国自古以来多次进行战争的根源，因为牢固占有这一地区对中国有着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哈密州一向为东土耳其斯坦的游牧民族和定居居民所注意。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哈密的执政者是元朝皇帝的嫡裔。到了15世纪20年代，如上所述，哈密州被卫拉特人所占。随后，卫拉特人又为吐鲁番人 66
所取代。15世纪中期，中国曾出师讨伐吐鲁番。3方面争夺哈密的斗争持续了很久，互有胜负地延续了整个15世纪。[2]

1470年，蒙兀儿斯坦汗的部众又一次占领哈密，并袭击卫拉特牧

〔1〕巴托尔德：《谢米列契史略》，第74页。

〔2〕乌斯宾斯基：《简说哈密州》（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б округе Хами），第2、3、14页及结论。

区，俘虏卫拉特人近万名。为了报复，卫拉特于1472年入侵蒙兀儿斯坦，在伊犁河畔击溃了尤努思汗（1466—1496年）的军队，渡河并追击敌方到锡尔河彼岸。[1]

尤努思的儿子阿黑麻汗（1496—1504年）继续进行反卫拉特的斗争，由于跟卫拉特人多次交战和接触，人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阿拉吉汗”[2]。阿黑麻的继承人满速儿汗（1504—1544年）也努力继续进行成为惯例的争夺哈密和反对卫拉特的斗争。1513年，他再次侵占哈密州。但是过了5年，卫拉特发动了反对满速儿汗的战争。战争以讲和告终，和解的结果是共同进攻中国的肃州城[3]。不过这场和平为时不久。到16世纪30年代，蒙兀儿斯坦的军队大败卫拉特人，迫使其中许多卫拉特人离开故乡牧地，向南方库库淖尔草原地带逃窜。在这以前，东蒙古的亦不剌台吉和他的盟友已经在这里定居，他们是1509年谋叛达延汗未遂之后逃来库库淖尔的。

将近16世纪中期，蒙兀儿斯坦日趋衰落。反对它的新势力——乌兹别克人崛起，他们开始收复中亚的绿洲和城市，使之摆脱蒙兀儿斯坦和帖木儿系的全权代理人和驻防军的控制，并且着手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国家。在蒙兀儿斯坦内部，矛盾开始加剧，内乱频繁爆发，相互争斗的集团还邀请卫拉特王公参加这种内讧。突厥文的编年史中充满着对这类情况的记述。例如，大家知道的，蒙兀儿斯坦可汗满速儿的儿子和
67 继承人沙赫汗（1545—1570年）就死在与卫拉特人的一次战斗中。[4]

卫拉特封建主们对于蒙兀儿斯坦敌对封建集团双方的请援要求，通常都予以满足，因为这使他们有可能依靠蒙兀儿斯坦贵族的财富，而主要是靠这个四分五裂的汗国的人民群众，不费很大气力就能发财致富。[5]

《拉失德史》中关于吐鲁番执政者阿勃特·阿尔·拉希姆反抗喀

---

〔1〕巴托尔德：《谢米列契史略》，第75页。

〔2〕“阿拉呼”——“杀人”，“阿拉吉”——“杀人者”。这里的含义是“卫拉特人的歼灭者”。

〔3〕即今甘肃酒泉。——译者

〔4〕巴托尔德：《出使土耳其斯坦的报告》，第240页。

〔5〕巴托尔德：《出使土耳其斯坦的报告》，第244－248页。

什噶尔汗穆罕默德的记述很值得注意。一个卫拉特王公被邀来镇压这次起义，他率领部众逼近吐鲁番城下，洗劫了吐鲁番四郊，然后就跟阿勃特·阿尔·拉希姆缔结了协定，还把女儿嫁给了他。婚后生了个儿子叫阿勃达拉赫，他后来就当了喀什噶尔的执政者（1570—1598年）[1]。

我们已经指出过，哈萨克和卫拉特的相互关系，在几乎整整100年间是和睦而友善的。[2] 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是在16世纪30年代。从那时起，卫拉特和哈萨克封建主之间进行了两个世纪的斗争。哪些情况决定了和平关系转化为武装斗争呢？什么是卫拉特与哈萨克敌对的基础呢？我们对这些问题还不太清楚。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史料没有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只能揣测，可能是双方都力求靠牺牲邻邦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牧地，也可能是卫拉特封建主力求攫取锡尔河沿岸的城市和通向这些城市的通路等等情况起了重大的，并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著名的英国商人和旅行家捷金松的经历，对这一揣想很有帮助。他在1557年想要通过中亚去中国，但是由于哈萨克和卫拉特之间 68
的战争而未能去成。据这位旅行家说，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占有塔什干而引起的纠纷。[3] 我们只知道，在16世纪的中期和后半叶，哈萨克汗在反对卫拉特王公的斗争中占了上风。那时卫拉特王公则由于屡败于蒙兀儿斯坦汗以及内部纷争而受到削弱。伊凡四世在16世纪70年代派往诺盖兀鲁思的俄国大使丹尼拉·古宾曾向莫斯科报告说，据所获资料得悉哈萨克势力强大，而且已经将卫拉特置于其管辖之下。[4]

---

〔1〕巴托尔德：《出使土耳其斯坦的报告》，第239页。

〔2〕"应当指出，从伊沙·布吉汗到拉失德汗时期，蒙古人和哈萨克人一直彼此过着和平生活。"见维里亚米诺夫·泽尔诺夫（В. В. Вельяминоз-Зерноз）：《关于卡西莫王和王子的研究》（Исслебование о касимозских чарях и оаревигах），第2部，圣彼得堡，1864年版，第140页。

〔3〕《安索奈·捷金松和其他英国人旅游俄国和波斯》（Early Voyages and Travels to Russia and Persia by Anthony Jənkinson and Other Englischmen），伦敦，1886年版，第90－91页。

〔4〕丹尼拉·古宾记载说："鞑靼贵族希赫麻马伊从尤尔干王子那里得到消息，听说哈萨克人要全力以赴地跟诺盖人打仗。又听说哈萨克人很强大，卡尔梅克人投降了他们……希赫麻马伊、伊苏泼和另一些与他们一起游牧的鞑靼贵族在雅依克河附近也姆河上守卫了一冬，以防哈萨克玉兹的侵犯。"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国同诺盖鞑靼人的关系》，第1册，第62－63页；也可参看维尔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关于卡西莫王和王子的研究》，第2卷，第326页。

《拉失德史》的作者曾经写过："应该把870年(1465/6)看做是哈萨克苏丹政权本身开始的时期，不过，还是上帝更了解。"[1]可能作者在这里与上述情况一样，都是指哈萨克对卫拉特的胜利。

至于16世纪中期和后半叶卫拉特与东蒙古诸汗和王公的相互关系，只能根据中国西北各省汉文地方志中的少量资料来判断。乌斯宾斯基、勃列特史奈德和施拉姆都曾利用过这些地方志。在16世纪后半叶，东蒙古的居民加紧向南部和西部迁徙，主要是迁往鄂尔多斯和库库淖尔。据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引证中国史料时说，其原因是"为了找水和找好牧场"[2]。这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土默特的俺答汗，他曾
69 屡犯中国边境，并大肆洗劫，直到其领地同明帝国之间达成合法贸易和开市时为止。[3] 俺答汗指派自己的儿子充当鄂尔多斯和库库淖尔的执政者。[4]

就在这个时期，卫拉特人被蒙兀儿斯坦和哈萨克的对手排挤出自己的牧地，也开始深入库库淖尔。卫拉特执政者频频攻掠肃州和甘州[5]地区，威胁到库库淖尔和鄂尔多斯的东蒙古汗和王公的地位，这就引起了东、西蒙古人之间新的武装冲突。他们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552年，当时俺答汗率众出击卫拉特。中国史料和《蒙古源流》的作者对这次冲突的结局说法不一。前者断言，卫拉特战胜了俺答汗，并迫使他从甘肃退却到库库淖尔湖[6]，而后者却说，俺答击败了卫拉特人，俘获了辉特执政者玛尼·明阿图的兀鲁思以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迫

〔1〕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39页。

〔2〕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第591页。

〔3〕这样的市场开了两个。参看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60页；也可参看瑟利斯：《1570—1571年中蒙关系的4个文件》，引自《瑟利斯著作集》，1960年版，第2、4、12页。

〔4〕说说下面这点很有意思：当俺答汗的一个儿子破坏与中国所订的和约而攻掠了四川时，中国当局要求俺答对违约者给予适当的劝导。俺答回答说："宾兔这么做实属无可奈何，没有任何生活资料，因为在甘肃附近没有为他开辟贸易市场。去宁夏则太远，而且也不方便。"中国人不得不同意，在朱翊钧(1574年)执政的第2年，允许在甘肃为宾兔开市。见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62页。

〔5〕甘州即甘肃张掖。——译者

〔6〕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63页。

使该卫拉特集团的残余部众逃往斋桑泊和巴尔喀什湖。[1] 很难说两种说法到底哪种正确。但是,考虑到当时蒙古的总形势和1552年战役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应该承认《蒙古源流》的说法可能性更大些。《黄金史》的作者含糊提到过的几句话,也对这一揣想有所帮助。这位作者说俺答汗征服过卫拉特,说他这样一来大概就为额勒伯克汗、阿台汗和岱总汗报了仇。可是俺答汗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征服卫拉特的,《黄金史》的作者却只字未提。[2]

1562年,鄂尔多斯执政者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率兵反对卫拉特, 70
在额尔齐斯河摧毁了土尔扈特牧区。[3] 10年后,即1572年,也是这位洪台吉得悉他叔伯兄弟巴延巴图尔洪台吉出兵攻打卫拉特,便与之联合起来,共同击溃并且征服了辉特、巴图特和绰罗斯。[4]

16世纪中期和后半叶初期是卫拉特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期。

1.3 15—16世纪卫拉特社会制度的若干问题

《黄金史》、《黄册》和《蒙古源流》以及中国王朝编年史《明史》所提供的资料都使我们有根据断定,如前所述,14世纪末到15世纪前半叶,卫拉特不仅在民族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蒙古民族的西部分支、统一的卫拉特封建领地的基本居民。在这一时期,卫拉特人同所有蒙古人一样,分成万户、千户、百户和十户。它恰当地把组成蒙古封建社会的军事行政体制和社会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每个万户和千户既是一定的军事单位,又是典型的封建领地。指挥一个军事单位的人,同时也就是封建统治者。直接生产者经济上从属于

〔1〕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73页。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111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106页。tegün-ü qoyina elbeg qaran, adai qaran, tayisung qaran-i ös-i köqečü arabarčin jinong-yi arabr qoruruba qeju, erten-ü tede bügü-de ös-ten-i duradju, kitad oyirad koyar-i dayilan yabuba qelü... oyirad dobtaiju...

〔3〕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74页。

〔4〕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74页。

他，为了他的利益而承担着一系列苛捐杂税、封建徭役，并且像士兵对统帅那样服从于他，而统帅又听命于最高统帅（通常是最高执政者——大汗），他们的关系就像藩臣跟宗主的关系一样，卫拉特社会的氏族部落组织阶段早已成为过去了。

71 15世纪后半叶，卫拉特创立了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万户和千户的位置被一些特殊的卫拉特集团所代替，史籍中称这些集团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辉特、土尔扈特以及诸如此类的“部”、“族”或“部落”。这些崭新的组织形式在卫拉特社会政治生活中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而把旧有的万户和千户排挤到次要地位。

可是，这些组织形式究竟是些什么呢？关于它们的社会经济性质又能说些什么呢？像大部分俄国的和外国的研究者那样，认为它们属于部落型或氏族型的联合体是否恰当呢？

这是首先必须加以研究的问题。所有蒙古史料，从《元朝秘史》和拉施特的《史集》开始，都始终把卫拉特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来讲述。《元朝秘史》也像拉施特一样，既没有一次提到和硕特、辉特，也没有一次提到卫拉特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如果不把万户算作一种划分的话。他们完全按照“准噶尔”这个词的含义，不是用它来指某种固定的民族集团，而是指任何一个处于左侧的蒙古人的联合体。这种“准噶尔”在《元朝秘史》和拉施特的史书中出现得相当多。至于杜尔伯特，我们在《元朝秘史》里遇到过一个独立的族或部落——斡孛黑叫“杜尔伯特”[1]。它的始祖是神奇的都蛙锁豁儿的4个儿子。很难说这个“杜尔伯特”和15世纪后半叶在西蒙古卫拉特人中出现的同名杜尔伯特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继承性的联系。我们所了解的蒙古史料和卡尔梅克史料中，都没有足以证实这种继承性的资料。有些史料使我们有理由揣想，13世纪的杜尔伯特和后元时代的杜尔伯特之间可能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例如，加班沙拉勃说，杜尔伯特和绰罗斯具有共同的祖

[1]亦有译作“朵儿边”的。——译者

先。[1] 另一位编纂家——巴图尔乌巴什丘缅的意见也是这样。[2] 从 72
这些作者所引用的世谱表中可以得出结论:杜尔伯特只是在也先的儿子博罗纳哈勒时期,才从绰罗斯家族分离出去的,即不会早于15世纪后半叶初期。必须指出,中国史料也认为杜尔伯特人和准噶尔人(即绰罗斯人)是绰罗斯系(按另一种说法为斡孛黑)出身的人。[3] 想断定土尔扈特是否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兄弟或他的另一些伙伴的尝试,也同样是缺乏证据的。蒙古史料第一次提到土尔扈特是在1567年。加班沙拉勃这位出身于土尔扈特贵族的编年史作家态度比较认真,由于缺乏可靠的资料,他只是含糊其辞地谈了谈自己祖先的起源,这绝不是偶然的。可是这个问题还不能算完全弄清楚了。

不过,如果说在15世纪中期以前,组成卫拉特社会最普遍的原则是把它分成万户和千户,那么并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万户和千户再不能被分为更小的单位。关于这种较小社会单位,《黄册》中很明确地谈到过,其中两次提到卫拉特活动家浩海达裕属于绰罗斯族的事实,这点前面已经说过。《黄册》的作者写道:"额勒伯克汗吩咐卫拉特绰罗斯族的浩海达裕杀死汗的弟弟。"[4] 我们这位编年史作家在另一处又指明:"浩海达裕出身于绰罗斯斡孛黑。"[5]

因此,可以完全肯定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在某一个卫拉特万户中,有个名叫绰罗斯的独特的斡孛黑,这个斡孛黑的人中出现了一批名声煊赫的卫拉特活动家,包括浩海达裕、妥懽、也先到哈喇忽喇、巴图尔浑台吉以及他的继承人等等。[6]

---

〔1〕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3、8、9页。

〔2〕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于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60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59年,第47期。

〔3〕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27页。

〔4〕《黄册》,第96页。

〔5〕《黄册》,第100页。

〔6〕这样就揭示了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错误,他没有充分的根据地把元以后的杜尔伯特和《元朝秘史》中的"社尔伯特"混为一谈,并且认为,这里所提到的历史活动家都是杜尔伯特家族出身的人。

73 但是，绰罗斯斡孛黑的存在使我们有充分根据认为，卫拉特还有过类似于绰罗斯这样的其他斡孛黑。实际上，《黄册》的作者也谈到过，在他那个时期，即17世纪初，卫拉特分作6个斡孛黑。他说，达赖台什领导杜尔伯特斡孛黑，拜巴噶斯任乌济叶特斡孛黑的副王，呼海图占有绰罗斯斡孛黑，朱丞相管理巴噶图特斡孛黑，而希墨尔根台门奈则管理客列亦惕斡孛黑。[1] 这样，这些史料就证实了，将近17世纪初，斡孛黑完全排挤了蒙古传统的万户、千户和百户。

斡孛黑是什么？它的社会经济意义怎样？它在15—17世纪以及更晚一些时候，在卫拉特社会制度方面起过什么作用呢？

蒙古史料使我们确信，最初这个词意味着氏族、氏族公社、血缘亲属的公社，这些有血缘关系的人集体占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牧场，并受一个德高望重的宗亲的领导。《元朝秘史》在讲述12—13世纪蒙古人的历史时，在谈到创立当时存在的氏族公社的始祖时，常常使用“斡孛黑”[2]这个词。[3] 关于这点，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蒙古的氏族——斡孛黑是相当典型的血缘亲属的结合体，它以父权原则和同族禁婚为基础。这种父系制的结合体多少带有以往血缘亲属关系的残余特征，经营个体经济，但有公共的牧地……这种结合体还为复仇制和特殊的祭祀制所联系。”[4] 不过。这是蒙古古代的斡孛黑氏族。到成吉思汗时代，这类氏族公社在颇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传统的特征而逐渐瓦解，让位于另一些更复杂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为13世纪初蒙
74 古早期封建国家形成作了准备。蒙古史料，主要是《元朝秘史》中所记载的大量资料使弗拉基米尔佐夫能得出下述结论：“12—13世纪时，被称作斡孛黑氏族的是一个复合的统一体。斡孛黑起先是由血缘亲属——领主们组成，后来有了牧奴制的封臣——‘兀纳罕孛斡儿’，随

---

〔1〕《黄册》，第122页。

〔2〕原书对这类专有名词有时用斜体字标出，我们均用引号代替。——译者

〔3〕柯津：《元朝秘史——1240年的蒙古编年史》（Сокровенное сказание. Монгольская хроника 1240 г.），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版，第80、82－84、111、112、115、116、140、141、144、189页和结论。

〔4〕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58页。

后又产生了‘平民’奴仆——‘兀帖里·孛斡儿’和‘扎剌兀’。可见，氏族是由若干社会集团组成的。甚至可以说有两个阶级：领主兀鲁哈和显贵豪富的‘兀纳罕·孛斡儿’属于上等阶级，低级的牧奴和奴仆则属于下等阶级。一些人是‘诺颜’——‘老爷’；另一些人则是‘哈喇抽’——‘黑骨’，是‘孛斡儿抽惕’——‘奴隶’。”[1]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查明弗拉基米尔佐尔所描绘的斡孛黑内部生活的情景与12—13世纪的现实状况符合到什么程度。由于弗拉基米尔佐夫夸大了12—13世纪蒙古封建关系成熟的程度，在苏联历史文献中受到多次批评。可能这种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看来，弗拉基米尔佐夫所指的斡孛黑内部生活的某些特征，不应该像他那样归到12—13世纪，而应归到13—14世纪，或者甚至归到14—15世纪。不过，丝毫不能因此而怀疑弗拉基米尔佐夫对蒙古人的封建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作出的总评述的正确性。

我们尤其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编写《元朝秘史》和拉施特的编年史时，蒙古的斡孛黑已经很少近似于它古代的形象了，到了这时，它已经丧失了许多最初的特征。弗拉基米尔佐夫举出了大量足资证实这点的根据。《元朝秘史》的作者很随便地使用斡孛黑这个词来指称不一样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现象，我们认为这倒是说明斡孛黑内部发生过重大变化的补充佐证。例如，这位作者常常把同样的种族集团一会儿叫斡孛黑，一会儿叫爱马克，有时叫亦儿坚和斡孛黑。[2] 曾经服役于成吉思汗的花拉子模著名商人摩诃末所属的牙喇哇赤家族也被用蒙古词斡孛黑来表示。[3] 只有在缺乏决定这个词内涵的固定标准和特征的情况下，才可能这样随意地使用它。我们所举的这些例子证

〔1〕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70页。

〔2〕其中例如，在称呼把鲁剌思、那牙罕、别速惕、斡罗纳儿、阿鲁剌惕、绰诺斯、速勒都思、亦乞列思、杜尔伯特等种族集团时，就是这样对待的。

〔3〕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189页；也可参看达木丁苏隆（Д. Дамдинсурэн）：《元朝秘史》，乌兰巴托，1947年版，第259页。顺便指出，对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事件起过巨大作用的泰亦赤乌惕部，在《元朝秘史》中不称为斡孛黑，而称作爱马克（卫拉特部也是如此）；克列亦惕部有一次被称为兀鲁思，两次被称为亦儿坚，一次被称为爱马克；乃蛮部既被称作兀鲁思，又被称作爱马克；梅勒吉特部曾被称作兀鲁思、亦儿坚、爱马克等等。

明，这一时期的斡孛黑已经不是确切意义的斡孛黑了，它已经不像古代那样包含着血缘家族公社的涵义了，这种公社已具有当时卫拉特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内部管理方面一切固有的特征和标志。

现在，我们来看看17—19世纪蒙古和卡尔梅克的史料——《黄金史》、《黄册》、《蒙古源流》、《咱雅班第达传》，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的两本《故事》，从中搜寻一下足以判断蒙古斡孛黑进一步演变情况的资料。这些史料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据查证，所有这些史料，除《咱雅班第达传》外，都不同程度地详细复述了《元朝秘史》中有关蒙古历史上古代斡孛黑形成的故事。不过除了《元朝秘史》谈到的那些斡孛黑之外，哪本史料也没提到有形成任何新斡孛黑的情况。根据这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对蒙古人，其中包括卫拉特人的氏族形成过程记忆犹新，但这一过程基本上在成吉思汗以前就已经结束了，这在《元朝秘史》的相应篇章中和拉施特的编年史中得到了反映。后来，到了元帝国时期，蒙古民族的聚集过程
76 完成，把以往氏族部落社会组织的残余都吞噬溶化掉了，就更谈不到任何原始意义的斡孛黑了。17—19世纪蒙古和卡尔梅克史籍的作者们对斡孛黑简直就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已经不存在这种斡孛黑，而且它在人民心中的记忆也已经模糊不清，实则恐怕是完全消失了。

如果说《元朝秘史》的作者是为了确定某个种族集团或者社会集团的作用和意义而采用“斡孛黑”、“亦儿坚”、“爱马克”、“兀鲁思”、“兀鲁克”、“牙孙”这些词，并经常将它们混为一谈，那么在17—19世纪的史料中，我们已经见不到这样大量的近似的词了。这些史料的作者通常使用“兀鲁思”——民族一词。“斡孛黑”这个词在这里很少遇见，有时则是用于崭新的含义。例如《黄册》和《黄金史》的作者都谈到，孛儿帖赤那是蒙古斡孛黑的始祖。[1]《黄册》在另一处谈到，成吉

---

〔1〕《黄册》，第93页；也可参看萨囊彻辰：《黄金史》，第4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36页。《黄金史》把这句话译作“became of the Mongol clan”。

思汗的一个岳父属于中国姓吴的斡孛黑。[1] 这本史料还说到，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出身于中国姓朱的斡孛黑。[2] 可见，《黄册》的作者给“斡孛黑”这个概念放进了全新的含义。他把只有狭隘的单个词义的家庭称作斡孛黑，中国家庭的姓——“吴”和“朱”被他当作了斡孛黑的名称。可能，孛儿帖赤那也被《黄册》和《黄金史》的作者们当作了“蒙古人”这个名字的第一个代称，并在这个意义上被当作了蒙古斡孛黑的始祖。

上述这些例子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17世纪，斡孛黑一词已经不是指集体经营的血缘亲属公社，也不是指原有词义的氏族，而是指单个的家庭或者指若干个家庭的组合，他们因相近的血缘亲属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并经营单独的经济。

我们不能肯定，在17世纪以前，斡孛黑氏族向斡孛黑家庭的转化过程在全蒙古范围内就已经完成。但毫无疑问，这一过程的发展趋向正是如此，而且在17世纪以前，它的发展已经突飞猛进了。[3]

那么，据《黄册》的作者说，他那个时候的卫拉特人中有杜尔伯特、乌济叶特、绰罗斯、巴噶图特等6个斡孛黑，这些斡孛黑又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当时的这些斡孛黑是几个为数不多的具有相应族系名称的单个血缘家庭的组合，当然，这6个斡孛黑不是平民的家庭，不是阿

---

〔1〕《黄册》，第34页。

〔2〕《黄册》，第56页。

〔3〕我们在波塔宁的著作中发现了有关斡孛黑进一步演变的有趣资料。他记载说，在鄂尔多斯一个蒙古旗里，19世纪末，共有18个斡孛黑和4个小斡孛黑（подомок），在另一个同样的旗中，有15个斡孛黑。不同的旗里往往有同名的斡孛黑。喀尔喀的居民在上述时期已经不记得他们祖先所属的那些斡孛黑的名称了，尽管他们对波塔宁说过，在喀尔喀的达赖卓音和儿王的旗里，还继续存在着15个“牙孙”（骨头）。由于我们对波塔宁有关这个旗的“牙孙”的记载十分感兴趣，便请求这个旗出身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锡林迪布把有关情况告诉我们，他热忱地答复了我们的要求。锡林迪布在1961年5月20日的来信中指出，关于斡孛黑的演变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他从父母和地方长老的口述中了解到，该旗的居民计算出他们祖先所属的斡孛黑共有30个左右，但到上个世纪末期，这些斡孛黑实际上几乎都消失了，只剩下点滴痕迹。锡林迪布所作的初步结论归结如下：“（1）斡孛黑是指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团体，内部禁止相互通婚；（2）斡孛黑成员间的相互关系，以小辈尊敬长辈的原则为基础，例如，小辈在新年那天应当去给长辈拜年；（3）斡孛黑的成员是一些经营个体经济的单个家庭。”

借此机会，我们对锡林迪布教授的热情答复及其提供的珍贵资料表示由衷的谢意。

拉特的家庭，而是贵族家庭、封建执政者的家庭的组合，它们属于立有
78 严密而精确的家谱的汗和王公的族系。不过，如果确有这样的贵族斡孛黑家庭，那么就不可能没有其他较小的这种贵族家庭。看来，《黄册》的作者在谈到“哈里亚特”的巴图鲁珪林奇、“特凌古特”的阿勃杜拉彻辰[1]以及“鄂尔郭特”、“翁吉剌惕”等部时，想必指的就是这类小贵族的斡孛黑家庭。至于阿拉特的斡孛黑家庭，关于他们这些平民奴仆、直接生产者、封建剥削的对象、封建老爷们积蓄财富和加强实力的源泉，《黄册》的作者却无话可说。他看不到他们的活动中有什么杰出的东西，因为他们光是干活，为自己统治者的利益去远征、打仗，同时肩负着苛捐杂税、各种徭役、封建战争和连年内讧的重担。平民阿拉特家庭这种斡孛黑，根本没有名字，没有专门的称号，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说晚一个世纪的加班沙拉勃在写自己的《故事》时，还作出结论说，甚至在厄鲁特、辉特、巴图特等等这样一些斡孛黑的事务和生活中，“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因为这些事情都微不足道”，那么，在阿拉特斡孛黑的生活中还会有哪些事件能引起《黄册》作者的注意呢？也因此，我们在《黄册》中没有找到有关阿拉特斡孛黑的记载。

至于其他蒙古的以及卡尔梅克的史料，都只就总的和主要的方面复述和证实了《黄册》的记载。但是，我们发现，《黄金史》把“牙孙”和“斡孛黑”这两个概念作了明确区分，把前者看做是后者的一部分。例如，这部书以不同的说法3次提到成吉思汗的出身，并肯定成吉思汗的父亲属于奇渥特“牙孙”，它是孛儿只斤[2]“斡孛黑”的一部分。可见，对这条资料的含义应该理解为，在12世纪后半叶，“牙孙”的含义在颇大程度上已经是从血缘亲属公社独立出来了的单个家庭的组合（其姓氏为奇渥特），但是它还是氏族公社，即“斡孛黑”（称为孛儿只斤族）的组成部分。后来，由于作为血缘亲属公社的斡孛黑的日益分化，“牙孙”和“斡孛黑”的概念便越来越接近，并逐渐成了内容相同的东西。

---

〔1〕《黄册》，第63、64页。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9页。在这一页上这样重复了两次，第3次提到它是在13页。

在我们看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7—19世纪的蒙古和卡尔梅克史 79
料中，“斡孛黑”这个词出现得越来越少，以至最终完全消失。例如，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在他们的两部《故事》中，谈到古代的和跟他们同时代的蒙古和卡尔梅克汗以及王公们的族系以及血缘关系时，只用过两个词——“牙孙”和“鄂克”。《咱雅班第达传》的作者谈到的一条资料很有意义，他说咱雅班第达出身于和硕特“牙孙”以及古鲁青鄂拓克，而在这个鄂拓克中，他又属于桑噶斯家庭。[1] 可见在这段对17世纪前半叶准噶尔杰出活动家族系的详细叙述中，没有出现“斡孛黑”这个词。它被“鄂拓克”取代了。大家知道，“鄂拓克”的基础不是血缘亲属关系，而是地域关系。就其性质而言，鄂拓克是封建领地，是汗或王公的封地，它到清代称为“旗”，尽管在其内部就其实质而言，旗和鄂拓克毫无区别。显然，鄂拓克（或旗）只有在封建制度比较发达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因此，在11、12，甚至13世纪当然还不可能有鄂拓克，也因此，《元朝秘史》的作者对它一无所知，这也是我们在这部古代文献中没有发现这个词的原因。但是，快到17世纪时，情况有了重大变化。鄂拓克在蒙古（尤其是在卫拉特）的社会结构中占据了牢固的地位，这在《黄金史》、《黄册》以及其他蒙古和卡尔梅克的史料中得到了反映。这些史籍中经常详尽地谈到鄂拓克的情况。很有意思的是，《元朝秘史》中提到的许多“斡孛黑”，到了晚期的史料中都成了“鄂拓克”。例如，索伦古特、汪古惕、你吉古惕、忽儿朋等“斡孛黑”的遭遇就是这样，在《元朝秘史》中是“斡孛黑”，而在《黄金史》中却成了“鄂拓克”。不能不同意弗拉基米尔佐夫的意见，他把蒙古社会制度中的鄂拓克得到巩固归入15世纪，并认为：“由于占有游牧站附近某块领土而联合在一起的游牧家庭（阿寅勒）的组合是由兀鲁思或万户分裂出来的，这种家庭组合称作鄂拓克。鄂拓克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 80
期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蒙古的（其中当然包括卫拉特的。——

〔1〕拉特纳勒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3页。

兹拉特金）鄂拓克正是以这种地域单位为基础的。[1] 弗拉基米尔佐夫在另一处写道："蒙古鄂拓克绝不是血缘亲属的结合体，而且它的首领、台什等等也根本不是族长……可以把鄂拓克（以及爱马克）看做是游牧封地、游牧领地、一个基本的封建领地单位。"[2] 前面提出的问题：15—17 世纪组成卫拉特社会的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土尔扈特、巴噶图特等联合体是什么？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了。

综观全部已阐述的内容，显而易见，这些联合体既不是氏族的联合体，也不是部落的联合体。他们联合的基础不是血缘亲属关系，而仅仅是地域关系。我们可以肯定，所有这些联合体都是庞大的封建汗国——兀鲁思，它们被分成更小的公国——鄂拓克，鄂拓克又分成农民的阿寅勒（单个家庭的组合）和一些单个的家庭。这样，我们可以说，咱雅班第达出身于和硕特汗国、古鲁青鄂拓克、桑噶斯阿寅勒。除了兀鲁思、鄂拓克和阿寅勒之外，卫拉特领土上的居民还熟悉像爱马克的豁团这样一些组织。不过，关于这些我们准备在准噶尔汗国形成以后的章节里再论述。

卫拉特封建领地按其人口数量、组成领地的鄂拓克和阿寅勒的数目、领地所占土地面积的大小以及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强弱，而有所区别。我们已经看到，加班沙拉勃非常轻视巴噶图特、辉特以及其他卫拉特领地，它们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这只能说是由于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软弱无力造成的。在 16—17 世纪的历史事件中曾起过主要作用的是和硕特、绰罗斯、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这几个兀鲁思。
81 至于巴噶图特、辉特等等，大概被更强大的鄂拓克和兀鲁思吞并了，因此，除辉特以外，其他在以后的史籍中就全都不再被提到了。

兀鲁思和鄂拓克的首领是世袭执政者，他们出身于上等贵族家庭，是（或者自认为是）成吉思汗的兄弟和挚友的嫡裔。实际上他们是王朝的统治阶层，控制着西蒙古所有的鄂拓克和阿寅勒。追求发财致富

〔1〕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 132 页。

〔2〕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 139－140 页。

的贪欲促使他们发动反对邻邦的掠夺战争，以及为优胜于其他兀鲁思，为侵占最好的牧地、增加附属阿寅勒的数量、控制贸易通道等等而挑起内讧。我们可以同意《黄册》作者的意见，把这些王朝家庭称为斡孛黑，但附有一点保留说明：这些斡孛黑联合的只是汗或王公们的家庭成员，他们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全面统治着大量的直接生产者，后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依附于斡孛黑的成员，本身不包括在斡孛黑之内。

例如，加班沙拉勃在叙述准噶尔（即绰罗斯）和杜尔伯特诸颜是天神后裔的神话时，肯定说，阿芒内的10个儿子和朵蒙内的4个儿子是准噶尔和杜尔伯特兀鲁思的奠基人，他们在很久以前跟自己的臣民一起建立了这些兀鲁思。[1]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兀鲁思所包括的不是同等的具有血缘关系的远近亲属，而是老爷和仆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并且前者是进行统治的斡孛黑的成员，后者则不属于斡孛黑，他们是平民“哈剌抽”。加班沙拉勃在另一处说到，卫拉特诸颜们如何增加从属于他们的阿寅勒的数目。据他所说，土尔扈特的岱青最初总共有160家阿勒巴图[2]，后来增加到了10万个；准噶尔的卓里克图洪台吉 82
的，则由7000个增加到4万个；土尔扈特罗布藏的，由7000增加到8000个等等。[3] 这类家庭的数量可以增加好多倍。上述例子证明，处于统治地位的斡孛黑的成员及其统治的继承性是固定不变的，而他们的兀鲁思的人数和工作人员，即从属于斡孛黑成员的阿寅勒的数目却是变化不定的。斡孛黑成员同兀鲁思其他成员的关系是西部地区的地主同被压迫农民的关系，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同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是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同被剥夺了这种生产资料的人的关系，是封建主同依附农民的关系。斡孛黑的成员和兀鲁思其余成员不是被血缘亲属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而是被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斡孛黑的成员是兀鲁思全部土地、全部牧场的垄断者和支配者，这些牧地起着游牧、畜牧民族主要生产资料

〔1〕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7页。

〔2〕阿勒巴指劳役，阿勒巴图指服劳役的、纳税的、从属的。

〔3〕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24页。

的作用。[1]

弗拉基米尔佐夫以第一流的蒙古史料和拉施特的编年史所提供的无可争辩的证据作为自己结论的根据，说明了封建制度时代蒙古人的土地和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主要特征。弗拉基米尔佐夫也证明了还在11—12世纪，蒙古人已经在严格限定的土地范围（嫩秃黑）内放牧，
83 按照完全确定的路线由一个牧场迁到另一个牧场，以季节、草层、供水情况为转移准则从一个地方游牧到另一个地方。与古代牧地为氏族公社即斡孛黑成员集体所有不同，在快到13世纪时，这些公社对牧场的所有权被剥夺的过程基本完成。封建化的贵族渐渐成了这些土地唯一的实际所有主。在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人统治时期，大汗是土地、牧场的最高所有主，他们把土地、牧场作为“忽必”（封地），连同在这块土地上放牧的人，分配给自己的心腹，称为“临时采邑”或“领地”，终生占用。

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成吉思汗创造了一种封地，把某个‘族’、某个‘部’分给某人作领地，作为对他忠实效劳的奖赏[2]……古蒙古的‘那可儿’（亲兵）由于为军事首领冲锋陷阵，而得到首领赐给的一定数量的游牧阿寅勒作为封地，变成了这些阿寅勒的主人和统治者。与此同时，还得到了颇大数量的领土，供他们带着自己的人游牧和狩猎……把一批人分给他（指‘那可儿’——兹拉特金）指挥，这附有一项义务：他必须连同一定数额的士兵，在军事方面和其他方面继续为首领服务，士兵可以从供他指挥的阿寅勒中抽派……作为封地的‘忽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定数量的游牧家庭（兀鲁思），另一部分是足够用来赡养他们的一定面积的牧地和狩猎地（嫩秃黑）。游牧民族的注意

---

〔1〕美国学者贝康的观点是对斡孛黑演变问题采取反历史态度的例证。根据他的意见，15—16世纪在蒙古出现了两种发展倾向的斗争：一种是要彻底消灭社会上的封建组织，而使社会分裂成独立的部落组合；另一种倾向则力求建立各种部落联盟，以便恢复昔日的大蒙古帝国。按贝康的意见，如果蒙古人有可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如果外部因素（喇嘛教和清朝的统治）不影响他们，他们就很容易恢复部落系统的灵活制度。参看贝康（E. E. Bacon）：《斡孛黑：欧洲的社会结构研究》（Obok：a study of social struture in Eurasia），纽约，1958年版，第81－82页。

〔2〕成吉思汗的这类奖赏是不论出身门第的，如他从世袭奴隶部中分封了军功卓著的木华黎为“万户”，即部、族中万户人的统治者。随着大批为成吉思汗冲锋献身的奴隶变为新统治者，当时奴隶制的基础开始动摇，促使进入封建社会。——译者

力当然集中在人上，因为别的‘嫩秃黑’还可能找得到，因此，‘兀鲁思’这个词就开始表示划分给某个人的封地本身了。”[1]

弗拉基米尔佐夫研究蒙古社会制度的这部著作已发表将近30年了。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许多著作对游牧民族，包括已加入原俄罗斯帝国的和未加入的游牧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进行了专门研究，这些新著作大大充实了苏维埃的学术研究。研究哈萨克斯坦、布里亚特、亚库 84
梯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的著作饶有兴趣，因为这些共和国的民族在不久以前，还主要是，或者完全是游牧、畜牧民族。这些著作中所介绍的丰富的具体历史材料和大量的实际数据，使人毫不怀疑弗拉基米尔佐夫的主要的、基本的论点不仅符合于蒙古的历史事实，而且也符合于一切游牧民族封建（或封建化）社会的历史事实，从而为阐明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规律开辟了一条可靠的途径。

弗拉基米尔佐夫肯定，蒙古在13世纪已经形成了封建主对土地、牧地所有权的垄断，对他的这一论点似乎再无必要引用新的证据来加以证实。但是，不能不指出有些研究者至今还很少注意到的某些事实。例如，《元朝秘史》谈到成吉思汗在其亲友间分配封地时说，汗向豁儿赤命令：“顺额儿的失河水[2]林木内百姓地面，从你自在下营”[3]。这样的命令只有土地所有主才能颁布，他有权根据一定的条件，把自己对该领土的所有权转让给另一个人。重要的还在于，得到这份奖赏的人也有权“不受阻碍地”占用所赐的领土，在奖赏有效的全部时间内是领土的所有主。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可能提供另外的解释。

再从《元朝秘史》中引用一个例子。成吉思汗问锁儿罕失剌：“你要何赏赐？”后者回答：“能否赐给俺自在下营地面，俺欲要蔑儿乞的薛凉格[4]地面自在下营。”成吉思汗命令说：“依著你，那地面内自在下

---

〔1〕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97、102－103、111页。

〔2〕额儿的失河即苏联境内的额尔齐斯河。——译者

〔3〕柯津：《元朝秘史》，第161页；也可参看达木丁苏隆：《元朝秘史》，第202页。

〔4〕薛凉格即今色楞格河。——译者

85 营。再教你子孙行……"[1]这里,汗对他所统治的全部土地拥有所有权的观念表现得更为清晰、更有说服力,正如他有权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转让给另一个人一样,这样,这个人本身就获得了赐给他的那块土地所有者的身份。

我们还提醒大家注意该史料关于成吉思汗给他亲友多次奖赏不同的兀鲁思、万户、千户等等作为封地的叙述。同时,每份这样的奖赏不仅包括组成这些兀鲁思、万户等封地的人和阿寅勒,而且还包括他们生产活动所必需的土地、牧地、他们赖以生存的游牧区,这被看做是不言而喻的事。如果成吉思汗不是这些阿寅勒放牧的牧地和土地的所有主,他就不可能把人、把阿寅勒的居民拿来赏赐。

最后,我们再引一个《元朝秘史》中的例子,它跟正在研究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成吉思汗的第一个继承人窝阔台颁布了一道命令,其中规定划分牧地和水域地区。命令中说:"其分派之人,可于各千户内,选人教做。"[2]从命令的原文中可见,土地和牧地已经在什么时候被划分过了,命令中所谈的已经是重新分配牧地的问题,是再一次划出
86 游牧区,再一次把它分给使用者的问题。如果汗不是土地的最高所有主,如果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或者属于游牧者本人所有,属于他们的"阿寅勒"、"斡孛黑"所有,那么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措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命令的内容证明,土地是别人的财产,是受汗和诺颜支配管理的东西,这是与使用者的利益对立的。

如果说在帝国时代,土地是帝国君主本人——大汗的财产,那么到了后来,它却变成了占有封地的地方执政者的财产了。封地在经济上

---

〔1〕柯津:《元朝秘史》,第167页;达木丁苏隆:《元朝秘史》,第215、216页。哈萨克民族史中有一段完全相似的情况,谈一谈也很有意思。1812年内盟,即布克汗国(Внутренняя орда)的汗布克颁赐给伊塞泰·泰马诺夫一份特权书状,其中称:"我赐给伊塞泰·泰马诺夫的这份诏书,允许他和他所管辖的吉尔吉斯人,驻牧在里海一带……(略哨所名称——兹拉特金)等哨所间的冬季牧区。这一地区,无论对于他自己,或者对于从属于他的吉尔吉斯人,都将是最好的地方。这样的牧区……我现在交给泰马诺夫看管和处理。除了他和从属于他的吉尔吉斯人以外,不准其他人在他的牧地游牧",引自沙赫马托夫(В. Ф. Шахматов):《布克汗国和伊塞泰·泰马诺夫起义》(Внутреняя орда и восстание Исетая Тайманова),阿拉木图,1946年版,第45页。

〔2〕柯津:《元朝秘史》,第197页;达木丁苏隆:《元朝秘史》,第277页。

和政治上的巩固过程为封建割据的产生和增长创造了客观基础，封建割据取代了蒙古诺颜所统治的统一的早期封建汗国。另一方面，战争失败、起义谋叛以及其他情况使得汗的中央政权削弱，这对割据局面的形成也起了促进作用。至于地方执政者，他们凭借自己与日俱增的实力，并且利用中央政权的削弱，力求把赏赐给他们的土地、牧地变成他们全权所有的世袭财产。

根据这点，我们来考察一下赏赐型的封地“忽必”，即有条件的终身享用的领地变成当地汗国和公国执政者的世袭财产的情况。这方面，很重要的是指出，在《元朝秘史》中多次出现“忽必”这个词都是用来表示汗的赏赐，它包括牧地和在牧地上游牧的牧民。到17世纪时，这个词消失不见了，让位给史料中的另一个词“乌木齐”，它表示世袭财产的概念。例如，《黄册》的作者在复述《元朝秘史》所讲的成吉思汗给他的兄弟们分发封地的故事时，不把这些封地称作“忽必”，而称作他和他的同代人都了解的“乌木齐”这个词。[1]《黄册》也用这个词指称西藏的阿勒坦·桑达里图汗划分给他的兄弟们的封地。[2] 加班沙拉勃《故事》中有一个篇章的标题是：“关于卫拉特诺频怎样把封地分发给儿子们的故事”，在这里，封地的概念也是用乌木齐一词表达的。[3]《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囊彻辰记载，达延汗的一个孙子必里克墨尔根（1506 — 1550年）有9个儿子，他们继承了父亲的一个兀鲁思后，把它分成了9部分。这时，萨囊彻辰在讲这个兀鲁思，讲遗产，讲把兀鲁思分成9部分时，也使用了乌木齐这个词。[4] 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凡谈到卫拉特和卡尔梅克的汗和王公把领地当遗产传给自己的儿子时，也都是使用这个词。[5]

16—17世纪全蒙古的封建领地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斡孛黑的世袭

87

〔1〕《黄册》，第95页。

〔2〕《黄册》，第95页。

〔3〕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24页。

〔4〕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70页。

〔5〕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75－78页和结束语。

财产，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人所共知的，不需要再多引证据。可是，忽必转化为乌木齐的过程是如何发展的，在蒙古的主要地区，尤其在西蒙古卫拉特人中完成这一转化过程应当归属于哪个时期？回答这个问题倒是困难得多。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史料都没有提供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料。我们只能说说自己的看法：这个过程可能是与成吉思汗后裔帝国的瓦解同时开始和进而发展的，蒙古封建主被赶出中国可能大大推动了它的加速发展，这一转化过程在蒙古中部和西部地区全部完成大约是在15与16世纪之交。

前面我们曾引用《明史》的证据，它使我们得出结论：在15世纪后半叶，东、西蒙古领主们的独立性显得与日俱增。我们认为这个证据反映了蒙古（其中也包括卫拉特）的地方执政者，从汗的一块土地和在其上游牧的阿寅勒的终身拥有者转变成这块土地的世袭全权所有主的情况。

土地和牧场变成封建统治阶级的垄断财产所引起的自然结果就是把直接生产者——从事游牧、畜牧的劳动者变成了经济上的依附阶级，变成了封建剥削的对象。还在《元朝秘史》那个时代，像“纳赋者”、“服役者”、“世袭臣民”、“世袭牧奴”、“牧奴”、“臣民”、“苦役”等等这样一些概念，就已经广泛流传。《元朝秘史》谈到，成吉思汗在击溃主儿乞兀鲁思之后，把主儿乞人及其臣民都变成了他私有的世袭牧奴[1]，又说被乃蛮人打败的王罕曾请求成吉思汗帮他收回“属民和财富。”[2]《元朝秘史》还说到有“家仆”、“家人”这样一个社会阶层。[3]

蒙古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从属于处在统治地位的斡孛黑，为自己主人和封建国家的利益履行形形色色的义务。除了兵役以外，史料很少谈到这些义务的性质和范围。学术界所了解的第一个旨在调整人民赋役的法令是与窝阔台汗的名字联系着的。《元朝秘史》叙述了这一法令的内容，从中可见，压在人民身上的苛捐杂税和各种赋役的

〔1〕柯津：《元朝秘史》，第126、140、143页。

〔2〕柯津：《元朝秘史》，第115页。

〔3〕柯津：《元朝秘史》，第126页。

负担是多么沉重！窝阔台的法令说："如今教百姓每安宁快活，休教他辛苦……"[1]从后面的条文中看出，汗对人民福利的"关怀"可归结如下：(1)每户阿拉特必须每年交纳一头两岁绵羊供汗食用，并按羊群的1%纳税以赡养贫苦无产的人；(2)各千户务必拨出一定数量的母马作为官房的马群，抽出若干挤奶工为官马挤奶，指派一些管理官方牧场和牧区的管理人员以及守护官库的卫兵，为每个驿站各拨20名驿站人 89
员——马车夫和驿夫。找出若干马匹、壮绵羊作过路人之食品，按规定数量为各站提供若干奶马、拉车犍牛和马车等等。

如果这些算是窝阔台汗的"恩典"，那么可以想见，这项法令颁布以前，国家的苛捐杂税是如何繁重。况且还应该注意到，窝阔台的法令所调整的只是阿拉特牧户对国家的义务，而根本没有过问阿拉特及其直接统治者诺颜——阿拉特从事游牧的土地的主人之间的互相关系。我们还考虑到，服兵役和参加远征并没有豁免士兵的家庭所担负的一般赋税和各项义务。综观这一切，我们可以清楚地想象出当时蒙古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和人民群众受高度封建剥削的情况。[2] 当然，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也曾一度有所缓和，这一方面是由于氏族关系的残余在13—14世纪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侵略战争的胜利，蒙古封建主可以剥削被征服民族，而且他们有可能为普通士兵和他们的家庭分出一部分战利品和贡品。可是，这样"分摊"俘获物没有消灭，也不可能消灭阶级不平等现象和阶级矛盾。

蒙古社会进一步阶级分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帝国的覆灭，它使蒙古封建主的军事、政治地位急剧下降，这也就导致了阶级斗争的加剧。《明史》记载，15世纪中期，有个蒙古领主向朱祁镇皇帝控诉隶属于他 90
的阿勒特中有1500户擅自离开领地，成群迁徙。这位领主没有可能用

〔1〕柯津：《元朝秘史》，第197页。

〔2〕某些苏联研究人员否认13世纪蒙古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例如，托雷别科夫(С. Е. Толыбеков)写道："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国家所具有的剥削形式基本上是对被征服的落后游牧民族和文化先进的定居务农民族的集体(重点号是我们加的——兹拉特金)宗法封建剥削形式。"见《17—19世纪哈萨克社会经济制度》(Общ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казахов в XVII－XIX веках)，阿拉木图，1959年版，第176页。

自己的力量追回逃跑的人而请求皇帝援助。皇帝援助了他，逃脱的人又被送还给他们“合法的”主人。据我们所知，这件事是我们在史料中所发现的第一次直接指出关于阶级斗争的资料，后来则常常见到这类资料。它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封建从属的阿拉特牧户脱离其主人擅自“非法”迁徙，是蒙古封建社会中最早、最流行的阶级斗争形式。无须怀疑，《明史》中引用的这件事不仅不是第一次发生的，而且也不是阿拉特反对封建统治者的阶级斗争的唯一表现形式。

整个蒙古的情况大致如此，卫拉特的主要情况也大致如此。东、西蒙古在社会制度方面无疑存在着某些特点和差别。这主要涉及土地的使用形式。有关这些情况我们后面再谈。

总之，17 世纪的 3 部蒙古编年史和《明史》不是证实、而是推翻了某些史籍中存在过的下述观点：似乎蒙古征服者被赶出中国之后，在蒙古西部立刻或者很快就形成了“四卫拉特联盟”的国家，仿佛其锋芒指向东蒙古，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类似元朝那样的卫拉特帝国。

上述史料一再证实，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头 25 年在蒙古西部地区游牧的卫拉特居民是一个民族的和政治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首领是 卫拉特封建主，他们认为自己是全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嫡裔的藩
91 臣，这些嫡裔与东蒙古封建主保持着政治上、经济上和日常生活上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封建制度时代所固有的特征。

蒙古和中国的史料没有揭示 15—16 世纪西蒙古及其基本居民——卫拉特人各个方面历史发展的情况。只有依据突厥文的中亚和中央亚细亚的史料，才有可能全面研究这个时期卫拉特人和准噶尔的历史。这些突厥文史料所记载的资料可以使我们肯定，15—16 世纪卫拉特封建主斗争的主要方向，不是在东方反对中国和东蒙古，而是在西方反对蒙兀儿斯坦的汗和王公们。

造成东、西蒙古封建主之间的传统联系中断和前者拒绝作为藩臣效劳于成吉思汗系全蒙古汗的基本矛盾，是争夺通往中国的贸易通道和争夺中国市场上的贸易特权。上述矛盾是这两部分蒙古汗和王公之

间进行战争的主要经济基础。

这些史料不是证实，而是推翻了某些史籍中存在过的下述说法：似乎两部分蒙古封建主之间的斗争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无休止的总体战争。实际上，这种斗争具有封建时代战争的一切典型特征，有时武装冲突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作关系所取代，或者王朝间通婚、结盟、由一个阵营随意转到另一个阵营、频繁地由同盟者变为敌人、由敌人变为同盟者等等。[1]

无论在东蒙古还是在西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或多或少是相同的。这种发展最重要的特点是普遍地由国家对土地的封建所有制过渡到私人封建所有制，并相应地由终身占有封地（“忽必”）过渡到世袭领地（“乌木齐”）。这个过程决定了成吉思汗所建立的一直存在到元朝末年的军事封地制度的消亡。它促进了地方封建领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巩固，促进了封建割据的发展。

与此同时，古代氏族公社——斡孛黑转变为数量不太大的个体家庭的组合，他们由于相近的血缘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经营个体经济。研究家们忽视这一过程，结果造成了一种极其错误的观点：把16—19世纪的斡孛黑同古代蒙古氏族公社混为一谈，并且根据这一点肯定蒙古人（包括卫拉特人）保存了氏族部落的社会结构，肯定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绰罗斯、辉特以及其他卫拉特斡孛黑都是一种特殊的部落公社。而实际上，这些斡孛黑是由若干统治家族成员所组成的封建王朝。受统治的人民、直接的生产者群众与这些斡孛黑不相干。

这些史料证明，15—16世纪的卫拉特历史是蒙古民族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证明卫拉特的历史命运紧紧地同游牧于这一地区东部的蒙古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影响着蒙古人的命运并决定着这一整个地区的发展。

---

〔1〕1737年卫拉特编年史作家加班沙拉勃有充分根据地写了这一点：“杜尔本·卫拉特的诺颜们感到需要打仗时，就打仗，而和东蒙古人和解时，又互相嫁出自己心爱的女儿。”（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10页）

93

2 准噶尔汗国形成的历史前提

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叶，准噶尔汗国在西蒙古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事件准备决定了准噶尔汗国的形成。准噶尔汗国的产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蒙古社会所孕育的客观过程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所特有的卫拉特封建主抵御外部敌人的长期斗争和激烈的内讧，是上述客观过程的反映。只有同这些过程联系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卫拉特的内、外斗争。

科特维奇就曾指出过，研究者对这一时期的卫拉特历史很感兴趣。不过，他说："阐明这段包括150多年时间的史料，不仅还没有被利用，而且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宣扬。"[1]结果，研究者们在许多与准噶尔汗国形成史有关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有些研究者从当时的历史事件中看到了有关卫拉特执政者原来力图重建成吉思汗帝国并对邻国大肆扩张的反映。这在当时仿佛是可能的，因为那时有一批出身于绰罗斯家族的精明强干的领袖——妥懽和也先的后裔主持着卫拉特。

持这一观点的有比丘林、波兹德涅耶夫、维谢洛夫斯基、柯津等人。其中，比丘林发表过如下论述："这一时期（即从也先时期开始到16世纪末——兹拉特金）过后，卫拉特人终于从长期的无所作为和朦胧状
94 态中苏醒过来了。由于感到自己有新生的活力，他们便又把注意力集中于恢复自己昔日的荣誉。但是，缺乏明智的同心协力，因此就按照个人的打算采取行动并选择方法。哈喇忽喇汗作为卫拉特的首领，希望建立君主专制，可是各部领主却要独自称王。"[2]比丘林在另一处写

---

〔1〕科特维奇：《有关17—18世纪对卫拉特人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第792页。

〔2〕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27页。

道:“仔细考虑一下双方关于土尔扈特从阿尔泰山迁徙到俄罗斯的资料,每个人都会确信这样的真实情况:这次迁徙跟和硕特从阿尔泰山迁往库库淖尔发生在同一时间,它并不是由于诸汗之间互相不满。上述迁移中显示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狡猾阴谋的新步骤。最初,甚至连北京政府也未能发觉这一点。……因此,卫拉特没有经过流血就获得了对亚洲广大地区——从阿尔泰山起,西至里海、南到印度边境的统治权。根据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卫拉特经过从也先到哈喇忽喇这150年的休养生息,增殖人口,现在又开始策划在亚洲重建古代成吉思汗式的帝国。而事情的开端又以这样幸运的结局告终,这不免引起了他们对未来的种种希望。”[1]比丘林就这样描述了这一时期事件的意义及其内幕。

波兹德涅耶夫坚决反对雷奇科夫、列佩欣、格奥尔加、帕拉斯、斯特拉霍夫、涅费季耶夫、比尤列尔、科斯坚科夫等人的观点。他们断言,17世纪初,在准噶尔地区各卫拉特(卡尔梅克)部中,接连出现了一些有作为的王公(例如,哈喇忽喇、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等人),他们力求把分散的诸部联合成一个整体。波兹德涅耶夫写道:“我们对这一传说的内在含义不用特别思考就可以认定,17世纪初的准噶尔王公们力求在自己控制之下建立一个草原君主国。而和鄂尔勒克不愿服从这种控制,于是他聚集自己的5万帐属民,一起迁往俄国境内。”[2]

在反驳上述作者的观点时,波兹德涅耶夫引证了东方史料中若干个他没有提名的传说,也引证了《游牧民族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特征》一书,叙述了他对16、17世纪之交卫拉特社会发展过程的理解。他写道:“大家知道,所有游牧民族都是分单个部生活的,每个部受自己的部主管辖。各游牧部单独行动时,除了单纯的侵袭和抢劫之外,从未感到自己能强大到足以开创某种事业,除非他们中间出现一个能把他们这些零星小部结合成统一联盟的首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对外表

〔1〕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61-63页。

〔2〕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人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第141-142页。

现自己的力量，这在东方历史上是习以为常的事实。"[1]卫拉特人的情况也是这样，一直到"他们中间出现以哈喇忽喇和他的继承人巴图尔浑台吉为代表的新首领为止。这些首领重新开始联合卫拉特诸部。这种联合完全不是追求君主专制，而且既不同于欧洲的征服藩属的领地，也不同于俄国的消灭封地。"[2]波兹德涅耶夫就是这样想象游牧民族的历史动力的。按照他的意见，一切取决于首领个人的气质和才能。"他（指首领。——兹拉特金）如有行政管理才能（像巴图尔浑台吉所具有的），便可使各部通过颁布公民集体决议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结盟。他本身如具有特殊的统帅天赋（像成吉思汗、也先等人），便可通过一次次的战争来表现自己……这就是我们观察游牧民族有史以来的生活所作出的结论。这些结论使我们对卡尔梅克人迁往俄国境内的原因，完全持另一种看法。"[3]

按照波兹德涅耶夫的意见，土尔扈特及和硕特离开准噶尔，不仅没有削弱卫拉特联盟，而且相反，大大加强了这一联盟。"而正是那个时
96 期（即17世纪30年代。——兹拉特金），应该看做是准噶尔人更加强大的最光辉的时期。当时，卫拉特人统治了西起里海沿岸，东到阿拉善[4]和北起乌拉尔，南到印度边境的整个地区。这种实力使他们有可能接着又占领东土耳其斯坦，而到17世纪末，则把自己的征服地扩展到整个蒙古……和鄂尔勒克是在所有卫拉特部的共同知晓和普遍赞同下，率领他的卡尔梅克属民迁往俄国的。"[5]

这就是19世纪末到20吐纪初这位影响最大的蒙古学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可以作为简单化分析历史现象的一例，其结果完全与历史实际相抵触。

维谢洛夫斯基在他的论述蒙古人历史的讲义中，表示同意雅金夫·比丘林对土尔扈特与和硕特迁离准噶尔的原因所表述的观点。他

---

〔1〕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人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第142页。
〔2〕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人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第142页。
〔3〕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人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第143页。
〔4〕阿拉善即贺兰山的转音，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译者
〔5〕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人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第144页。

根据比丘林的权威意见说:“这是一个为了获得新土地和重建成吉思汗帝国而经过周密考虑的计划,而绝不是出于敌意的迁离。”[1]

柯津在研究卡尔梅克史诗故事《江格尔传》的历史根源时也写道:“相当有名的是雅金夫·比丘林的见解,其次是维谢洛夫斯基和波兹德涅耶夫两位教授的观点。他们都认为,卫拉特首领们具有从政治上继承元朝皇帝遗产的念头,同时,在17世纪,也可能更早一些,远在15世纪的也先时期,就有重建元帝国的政治意图和计划。这种观点竟出乎意外地受到我们的长篇史诗这样不寻常的史料的支持。”[2]下面,我们将努力证明,企图借助《江格尔传》来支持比丘林、波兹德涅耶夫及其同道们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应当指出,就连不同意上述观点的弗拉基米尔佐夫也在他的若干著作中,模棱两可地评述了蒙古的,其中包括卫拉特的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总形势。据他说,这个时期“随着某些蒙古汗国和部落联盟的巩固,开始出现蒙古生活普遍复兴的景象……开始产生新的精神上的需要。蒙古人,特别是蒙古贵族不再满足于原始的萨满教”。[3] 关于卫拉特人,弗拉基米尔佐夫则断言:“佛教在蒙古的复兴也影响了卫拉特人。那时,他们恰好处在民族大发展的时期,并且幻想筹建一个强大的游牧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试图在中央亚细亚建立游牧帝国。”[4]可靠的历史事实没有证实弗拉基米尔佐夫关于蒙古佛教复兴的意见,也没有证实他的另一条意见:似乎卫拉特民族的振奋表现于企图在中央亚细亚建立游牧帝国。

另一些俄国东方学者对当时事件的实质设想得有所不同。例如,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把土尔扈特与和硕特迁离准噶尔,同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前三十几年卫拉特抵御外部敌人斗争的失败以及内部斗

97

〔1〕维谢洛夫斯基:《蒙古史讲义》,第97页。

〔2〕柯津:《江格尔传》,第79页。

〔3〕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文献》(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载《东方文献》(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ка),彼得堡,1920年版,第2册,第99页。

〔4〕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文献》(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载《东方文献》(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ка),彼得堡,1920年版,第2册,第112页。

争的加剧联系了起来。他写道:“很明显,受东部喀尔喀人排挤的卡尔梅克人,没有希望占领准噶尔南部,他们一方面沿着额尔齐斯河谷地向西北移动,到达伊希姆河及托博尔河;另一方面则向南移动,绕过南山到库库淖尔。特别是17世纪前半叶,卫拉特人为了寻找未被占用的土地,加紧进行这种迁移。当时引起迁移的另一个原因是,准噶尔兀鲁思的首领——也先的刚毅尚武的后裔呼图克图哈喇忽喇,奋起率领杜尔本·卫拉特,着手把所有卡尔梅克部落统一在他的权力之下。”[1]

98 乌斯宾斯基把卫拉特历史上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叶,划为哈喇忽喇时代和巴图尔浑台吉时代。他指出,在当时中国历史学者的著作中很少提到卫拉特,主要提到的是上述两个执政者为巩固中央集权,也就是为建立统一的卫拉特汗国所作的斗争。[2]

研究这一时期卫拉特历史的主要困难在于,我们没有搜集到卫拉特本身的编年史和其他资料,尽管确实知道每个卫拉特王公家族都立有详细的世谱。到了18世纪准噶尔汗国被击溃之后,某些世谱落到了清朝当局手中。他们把这些资料部分地发表在中国的史地著作里。比丘林就曾利用这些史籍来写他的有关准噶尔和卫拉特的著作。有些卫拉特编年史资料和世谱则落到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手里,大概,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就是在那里见到这些资料的。正如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执政者和王公们对帕拉斯所说的,准噶尔的卫拉特人除了世谱表之外,还整理过若干历史大事记。大家知道,有一部这种大事记就是在巴图尔浑台吉及其继承人的牙帐中整理出来的。可是,所有这些资料我们都没有弄到。科特维奇在讲到卫拉特人时写道:“他们所经历的命运的盛衰兴亡,使得未能保存住他们肯定曾经有过的历史文献。”[3]

我们叙述准噶尔汗国形成的历史,依据的是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的两本《故事》、《咱雅班第达传》,此外还有俄文档案资料。

---

〔1〕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第629页。

〔2〕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66页。

〔3〕科特维奇:《有关17—18世纪对卫拉特人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第792页。

这些史料一起组成了相当可观的基础资料。关于两篇《故事》和《咱雅班第达传》这些论述卫拉特历史的文献的特点，我们在《导言》中已经谈过。至于俄文档案资料的主要内容，已由科特维奇在我们多次提到过的那本专著中说明了。只需要补充一点：1959 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俄蒙关系史资料》专集，其中也搜集了一些经过精选的包括 1607—1636 年间俄国与卫拉特关系方面的文件。因此阐明了准噶尔汗国存在初期的事件。必须指出，在俄国政府的代表们编写出第一个有关卫拉特的官方文件之前，俄国已经出现了论述卫拉特的资料。叶西波夫、斯特罗甘诺夫、列密佐夫和切列潘诺夫的古代西伯利亚各编年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前 3 部编年史已经发表，而且流传甚广。遗憾的是，第 4 部书至今还是手稿，收藏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的存件中。而《切列潘诺夫的编年史》，作为研究西伯利亚各民族和各邻族，其中包括卫拉特人历史的史料，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尤其明显，因为这部史料对卫拉特的历史以及对俄国与卫拉特的关系，一直叙述到准噶尔汗国存在的最末期，并且还记载了这位编者所验证过的若干事实。可以认为，《切列潘诺夫的编年史》中有关卫拉特历史的资料是确实可靠的，因为它们都被其他史料的记载所证实了。[1]

我们凭借上述蒙古史料和俄国史料所得出的结论，与比丘林、波兹德涅耶夫、柯津、维谢洛夫斯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对卫拉特历史上这一时期的看法，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而这个时期紧接在准噶尔汗国形成之前，理所当然地决定了这个汗国的形成。

2.1 16 世纪后半叶的西蒙古

蒙古牧区大量迁移是 16 世纪中期，特别是 16 世纪后半叶的突出

〔1〕《西伯利亚编年史》（Сибир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圣彼得堡，1907 年版。关于《切列潘诺夫编年史》的史料学意义，参看安德列耶夫（А. И. Андреев）：《关于切列潘诺夫的编年史》（ОЧерепановской летописи），载《历史丛刊》，1942 年版，第 13 卷，第 308－323 页。

标志，它导致了牧区的普遍扩大。这种迁移是由前面提到过的东蒙古
100 亦卜喇台吉所开创的。16 世纪初，他奋起反对达延汗，但是遭到失败，于是向西逃到库库淖尔地区。从这时起，蒙古人就长期地定居在戈壁以南的草原。快到 16 世纪中期时，东蒙古封建主成了鄂尔多斯的主人。1559 年土默特的俺答汗从这里潜入库库淖尔和安多，并把这些地区作为领地遗产传给了他的儿子们。[1] 其他东蒙古王公也紧随他们来到这里那些未被占用的牧地上。

引起这些迁移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史料说，这是因为汗和王公们要寻找水草富足的新牧场。可是，他们又为什么要遗弃迁移前曾使他们感到满意的原有牧区、原有饲料资源和水源呢？无论是中国史料还是蒙古史料对这个问题都没有提供直截了当的答案。我们只在其中发现若干间接的资料。这些资料证明，由于畜群增长，原有牧地不够使用，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封建经济中，有限的饲料资源开始限制畜牧业的发展，牲口总数量的增长要求增补饲料牧地。显然，所有史料都提到的蒙古牧区的重大变动，是上述情况的直接结果。

我们可以根据与 16、17 世纪有关的资料，来判断蒙古畜群数量增长的情况。例如，蒙古领主们极力要求中国开市所表现出的倔强而坚定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日益发展的畜牧业的剩余产品迫切要求有组织地换取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只有这种经济上的强烈需求，才能解释土默特俺答汗——当时南蒙古势力最大的封建主对中国明廷的政策。俺答汗屡次向中国当局建议开市，他一再强调，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中、蒙边境才能保持稳定的和平，中国人才能够无阻碍地务
101 农，而蒙古人则可安心放牧。《明史》中有这样一条资料值得注意：将近 16 世纪 30 年代，俺答汗“豪富而强大，拥兵十余万，兼有大量牲口及其他财产。他开始不轻易采取军事行动，并离开西北边境上的蒙古诸

〔1〕施拉姆：《甘肃和西藏边区的蒙古人，他们的起源、历史和社会制度》，第 34 页。

部落而东迁。"[1]在我们看来,俺答汗拥有规模巨大的产业,却离开其他产业而迁到没有被任何人占用的新领土上去,而且他还渴望和平与贸易,这些事情之间无疑是存在着直接联系和依赖关系的。易货贸易问题成为蒙古执政者和中国当局谈判的主要内容。而且,每次谈判失败,蒙古封建主,首先是俺答汗本人,随即恢复对中国边境的武装侵犯。根据《明史》的记载,1571 年,当时蒙古在中国的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在 4 个市场上(大同、西宁、张家口和山西),仅两三周时间蒙古人就售给了官方和私商约 29000 匹马。大家知道,17 世纪初,中国政府单是向俺答汗的继承人每年收购的马就达 52000 匹左右。中国政府还向其他蒙古封建主购买了牲口,也有中国私商购买蒙古牲口的情况。[2]

汗和王公们给喇嘛教寺院的主教们赠送礼品的记载,也证实了蒙古牲畜数量的增长。这些主教们的畜群,在短短的时间内增长到以千、万头计。[3] 牲畜头数的增加不能不引起对牧地需求的增加。

汗国和公国被执政者人数众多的后裔不断地再分配,也导致了同 102
样的结果。而且每个继承人都要求单独的一块领地作为自己分得的一份遗产。广为流传的一个事实是达延汗把蒙古划分给他的 11 个儿子,而儿子长大了,又把分得的领地划分给自己的继承人。领地被不断地分割,必然造成封地日益缩小,其经济和政治作用不断下降。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在他们的两本《故事》中,都引用过一些资料来证明,16—17 世纪时,汗和王公们自己也为封地被分割而忧虑,并且因

---

〔1〕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 151、162 页。专谈俺答汗的贸易政策的,还有一本很有趣的著作,即瑟尔伊斯的《有关 1570—1571 年中蒙议和的 4 个文件》。

译者按:16 世纪 30 年代,俺答汗还未强大起来,而且当时也未向东迁徙。兹拉特金在这里把史实弄错了,他所说的这个情况,显然系指达延汗的孙子卜赤(又称亦克汗,明人称他为小王子)。《明史》记载,嘉靖十一年(1532 年)时,"小王子最逞强,控弦十余万,多畜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土蛮,分诸部落在西北边者甚众,曰吉囊,曰俺答……"——译者

〔2〕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 196 - 197 页;戈尔斯基(В. Горский):《满洲王朝的开创和最初的事业》(Начало и первые дела маньчжурского дома),载《俄罗斯在北京的教士团著作集》,(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第 1 卷,圣彼得堡,1852 年版,第 138 - 139 页。

〔3〕例如,参看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 111 页。

为这个缘故，力求改进继承制度。[1] 但是，因为没有可能改变蒙古人在一般习惯法和成文法中所定下的这个古老传统，于是汗和王公们便寻找新的领土，以此作为制止封地进一步缩小和削弱的手段。

可见，畜群数量的增长和封地的日渐缩小，是16世纪蒙古封建主开始向中国长城外辽阔的西北地区迁移的主要原因，当时这一带是人烟稀少的地区。[2] 在16世纪中期，土默特俺答汗的统治是东蒙古最强大的。因此很自然，正是他首先成了鄂尔多斯、库库淖尔和安多这些土地的实际所有者。我们已经说过，他把这些土地作为遗产分给了自己的儿子们。

东蒙古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地区的西部卫拉特封建主那里的情况也大致相似。15—16世纪时，卫拉特领地所占的面积较小，只限于西部沿斋桑泊到哈喇沙尔城[3]东部到杭爱山脉的西坡，而南部，他们
103 的牧区还没有达到吐鲁番、巴里坤和哈密。至于卫拉特领地的北部疆界，我们在史料中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确切资料。只能肯定，北部疆界没有越出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与叶尼塞河上游的哈萨克、吉尔吉斯以及其他民族的领地的南部边界线。

我们已经说过，卫拉特与哈萨克历次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卫拉特封建主力求突破通向锡尔河一些城市的障碍，经过这些城市可以到达中亚市场。卫拉特人的牲畜总数量愈多，接近中国市场愈困难，对中亚市场的需要就更加迫切。前面已经说过，1557年，捷金松由于卫拉特人和哈萨克人之间进行着激烈战争，未能继续去北京的旅行。后来，当卫拉特执政者直接同俄国当局发生交往之后，他们也像当时要求中国当局开市一样，坚决地争取在俄国市场上有出售牲口和畜牧业原料以换

---

〔1〕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78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60年，第11期；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39页。

〔2〕据史料记载，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居住在库库淖尔地区的总共只有440户中国农民以及2560户官吏和战时移民。参看施拉姆：《甘肃和西藏边区的蒙古人，他们的起源、历史和社会制度》，第34页。

〔3〕哈喇沙尔即现在的新疆焉耆地区。——译者

取俄国商品的权利。如果说俄国与卫拉特的关系大体上是和睦发展的，那么，这首先是由于发展贸易交流对双方都同样有好处。

《咱雅班第达传》的作者所记载的资料，可以使我们大致地想象卫拉特封建主的畜群数量。在1643年，咱雅班第达得到杜尔伯特昆都伦乌巴什5000头牲口的赠品。到1645年，他和其他喇嘛都得到了王公们的厚礼：咱雅本人独得1万匹马，其他高等喇嘛各得1000匹和500匹，普通喇嘛各得100匹、60匹和10匹。[1] 1647年，额尔德尼洪台吉赠给咱雅6000只绵羊。1649年，有个领主献给他100头牡牛，1000只绵羊和40匹马。从所引的这些数字可以推想出送礼人本身，即世俗封建主所拥有的牲口数量之大。据史料记载，1649年鄂齐尔图车臣汗去西藏，他准备了1万匹马作为开支之用[2]，而这位汗的妻子的畜群则有大小牲口2万多头。[3]

有个外国人，17世纪时考察了卫拉特人的生活，写道："他们有许多马匹、牡牛，还有水牛和绵羊……进行大规模交易：例如，赶着8000匹和1万匹马的马群去中国，还不算他们用来换取银子和各种东西的绵羊和公牛数。他们每年也赶着类似的马群去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把它们全换成商品，如软革、铜锅、黄铜杯、铁和水獭（他们认为水獭皮比其他皮好）。"[4]我们可以把这一描述看做是卫拉特封建主拥有大规模畜牧经济的补充证据。不错，不能不估计到，上述数字不是属于16世纪，而是属于17世纪中期的。不过，无论我们对它做任何修改，封建主大畜牧经济存在的事实本身和他们的畜群数量的增长，仍然是

〔1〕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9页。

〔2〕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12－13页。

〔3〕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21页。

〔4〕阿历克赛耶夫（М. П. Алексеев）：《17世纪一个不知名的外国人的西伯利亚游记》（Неизвестное описан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в Сибирь иностранца в XⅦ века），载《历史档案》（Историиеский архив），莫斯科，1936年版，第1卷，第172页。

毫无疑义的，这些畜群提供了超出领主个人需要很多倍的产品。[1]

畜群数量的增长和领地的不断缩小，促使卫拉特汗和王公们走上争夺领土的道路。16 世纪中期以前，决定东、西蒙古汗和王公们内部相互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已经不仅仅是那些自古保存下来的，可以说是传统的因素，如争夺市场、控制贸易通道等等，而且还有新的因素——
105 争夺牧地，这是日益增多的畜群所必需的，也是为了满足领主们的大批继承人的要求所必需的。

据我们看来，上述这些情况对紧接在准噶尔汗国形成以前的事件，对这些决定汗国诞生的事件，提供了明确的根据。

蒙古史料《黄金史》和《蒙古源流》证明，16 世纪中期，在卫拉特封建主和东蒙古封建主之间，开始了一系列新的武装冲突。其中第一次冲突发生在 1552 年，当时，土默特俺答汗出兵进攻卫拉特。[2] 重要的是要指出这样一点：这次武装冲突前，东、西蒙古封建主之间保持了整整 100 年没有发生冲突的和平关系。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达延汗执政年代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两部分封建主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紧密合作，而且卫拉特的汗和王公们像忠实的藩臣对宗主那样，效力于这位全蒙古的执政者。

那么，1552 年的冲突和后来东、西蒙古人之间一系列战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主要是与土地紧张的特殊情况紧密相关的。而土地紧张的情况之所以发生和加剧，则是由于畜群数量增长，且必须满足日益增多的继承者的奢求的结果，这也是卫拉特封建主在反对蒙兀儿斯坦和其他敌人的斗争中战败的结果。

---

〔1〕帕拉斯对 18 世纪后半叶初伏尔加河一带卡尔梅克人的生活进行了考察，亲自证实：一个游牧者，有 10 头母牛和公牛、8 匹牝马和公马，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参看帕拉斯：《历史学报汇编》，第 222 页。为了进行比较，我们提一下，根据 1878 年斯洛夫佐夫收集的资料，在哈萨克的科克契塔夫和彼得罗巴甫洛夫两个县的牧区，5 口人之家维持生活需要 5 匹马、6 头牛和 10 只羊。参看斯洛夫佐夫：《旅行笔记》（Путевые заметки），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部丛刊》（Записки Зап. Сиб. отделения ИРГО），鄂木斯克，1878 年版，第 23 页。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173 页。

中国史料说,1530 年卫拉特封建主被蒙兀儿斯坦的满速儿汗击败之后,越来越频繁地潜入甘肃和库库淖尔的山谷地带。这不能不引起东蒙古汗的担忧,他们已经习惯于把上述地区看做是自己的领土了。卫拉特人渴望在这些地区定居,而东蒙古人则不愿让他们进来,这就是和平关系中断,武装斗争再起的主要原因。

卫拉特人和东蒙古人之间新的又一次冲突发生在 10 年之后,到了黑狗年(1562),达延汗的曾孙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袭击土尔扈特,强迫他们逃窜,并且跟踪追击到额尔齐斯河河岸。[1] 又过了 12 年,到了蓝狗年(1574),鄂尔多斯执政者布延巴图尔洪台吉和统治辉特的卫拉特爱辛别英夏之间展开了军事行动,后者遭到失败而被俘。与此同时,布延巴图尔的堂兄弟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2]跟他的儿子一起打败了巴图特鄂托克和绰罗斯鄂托克。可是不久,爱辛别英夏被俘后获释,他便聚集力量攻打布延巴图尔,击溃其部众,并杀死了布延巴图尔本人。[3]

编年史《宝贝念珠》、两本卫拉特《故事》以及俄国档案资料都讲到了东、西蒙古人之间后来的一些武装冲突,上述史料完全一致地证实,东蒙古方面的库库淖尔、鄂尔多斯以及戈壁南侧其他领地的汗和王公们,已经不再参加这些武装冲突了。戈壁南部封建主的地盘在 16 世纪 70 年代为喀尔喀的汗和王公们所占,在这以前,他们没有参加与卫拉特人的斗争。

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记载,达延汗的曾孙,即格呼森札札赍尔[4](喀尔喀执政王朝的创始人)的孙子阿巴岱(1534—1586)与卫拉特在库勃凯尔格林地区作战,使卫拉特人败北,并强迫他们立其子苏巴

---

〔1〕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174 页。

〔2〕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即《明史》中的切尽黄台吉,是吉囊之子,吉能的从子。——译者

〔3〕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180 - 181 页,也可参看雷特金:《卫拉特历史资料》,载《阿斯特拉罕省报》,1861 年,第 13 期。必须指出,《黄金史》的作者在描述 1552 年事件时,第一次说出卫拉特辉特兀鲁思的名称;而到 1562 年,说出了土尔扈特兀鲁思的名称。

〔4〕格呼森札,明代又译格列山只(Geresenje),为过延汗庶幼子,被分封到喀尔喀万户右翼。这喀尔喀万户右翼的主体由元代五投下之一的札剌亦儿(又写作札赍尔:Jalayir)部的贵族后裔属民组成,故格呼森札亦被称作札赍尔珲台吉,其后裔统治的北喀尔喀成为喀尔喀主力。——译者

哈台为执政者。这一事件的准确日期不太清楚，根据波兹德涅耶夫提供的资料，它不可能晚于1577年。[1] 在这些年代中，反对卫拉特的还有另一个喀尔喀执政者——赛因赉瑚尔汗（札萨克图汗位的奠基人），
107 他在额敏河的出口处与卫拉特作战，但没有取胜。[2] 1586年阿巴岱去世，卫拉特人趁此举行起义，杀死强加于他们的执政者苏巴哈台，恢复了独立。

这里列举的这些冲突的特点是，每次反对卫拉特的东蒙古封建主，他们的领地都直接同某一个卫拉特执政者的牧区相连。所有这些冲突都是局部的边境冲突。参与冲突的多半是某一个东蒙古的封建领地和一个卫拉特的封建领地。这种冲突不仅发生在卫拉特及其东蒙古近邻游牧的边境地带，而且在整个蒙古土地上也经常发生。自然，这些局部的冲突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外是侵占邻近领主的牧地、牲口和牧奴。这段时期内，整个蒙古的内讧十分频繁，其中绝大多数是这类局部内讧，而且也只追求这类局部的、有限的目的。东蒙古、卫拉特、卡尔梅克以及俄国史料的无数记载，使人对于这种情况毫无产生怀疑的余地。但是，当我们研究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卫拉特人和东蒙古人之间这一连串的冲突时，发现其间存在一个共同的倾向——东蒙古封建主极力想把卫拉特的牧区尽可能地向西挤得远些，挤出阿尔泰山一带。根据我们这些史料的记载，16世纪70—80年代时，卫拉特牧区的东侧，紧挨着东蒙古领地的是辉特的牧区，分布在辉特后面的则是土尔扈特，再远一些是绰罗斯、杜尔伯特与和硕特。[3] 后来，由于喀尔
108 喀与卫拉特的关系日趋紧张，又由于一连串的战争，卫拉特牧区分布的状况变动相当频繁。辉特执政者最早受到来自东部的侵犯，随后轮到了土尔扈特和绰罗斯。史料从来没有提到过东蒙古封建主侵犯杜尔伯

---

〔1〕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104页。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219页；也可参看柯津：《关于1587年击溃喀尔喀的硕垒乌巴什洪台吉的卫拉特史诗》（Ойрат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есня о разгроме халхаского Шолой-У 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в 1587 г.），载《苏联东方学》（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47年版，第4卷，第92页；雷特金：《卫拉特历史资料》，载《阿斯特拉罕省报》，1861年，第8期。

〔3〕柯津：《关于1587年击溃喀尔喀的硕垒乌八什洪台吉的卫拉特史诗》，第99页。